

看 见 过 去 知 道 未 来

看历史

EYE ON HISTORY

阅兵 大国崛起

- 60年阅兵简史
- 检阅仪式全解析
- 阅兵村故事
- 阅兵场玫瑰

09

2015/SEP



定RMB 20元
价HK\$ 30元
邮发代号: 62-313

居住空间的现代化

文 | 浦顿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居住在以家族和血缘关系所构建的空间中。1949年后的30多年，城市建设虽然也有很大进步，但人们居住的空间，其实是工作关系的延伸。只有在商品房的时代，人们才开始面临一种更现代、也更有挑战的邻里关系。

今年7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天文学家发现了最像地球的行星开普勒 452b，据说相似度达到了98%，但是在可期待的未来，地球仍是人类所居住的唯一星球。在这个星球上，土地和它的衍生物，在本质上永远是最重要的资源。战争与和平，开发与环保，人类的终极矛盾都和土地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进行过几次土地政策的改革。1981年11月，深圳特区首先开始对部分土地使用征收费用。1987年7月1日，深圳市政府又提出以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为指导思想的改革方案，确定可以将土地使用权作为商品转让、租赁、买卖。9月8日，深圳市以协议形式出让有偿使用的第一块国有土地，这是新中国土地拍卖制度的开始。

从1987年9月8日到现在，还不到30年的时间，土地拍卖制度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房地产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不少嗅觉敏锐的商人成为地产商——这个时代最富有、也是最有争议的群体之一。相比于马云、马化腾这样的科技巨头，王健林和许家印很明显是不同的存在。这一切当然和土地有关，他们购买土地、开发，然后再卖出，靠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创造财富。

土地拍卖制度的变革，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在这个星球上，土地和它的衍生物，在本质上永远是最重要的资源。战争与和平，开发与环保，人类的终极矛盾都和土地有关。

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它改变了人们对财产的观念，单位分房彻底取消，青年必须为购买房屋而奋斗。房屋的产权，又可以出售、继承，而稳定的财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之一。在此基础上，国家又推出了住房贷款制度，人们开始超前消费，用时间换空间，由此，“房奴”一词应运而生，这个词是那么沉重，但又那么幸福。

其中，最重要的变革，我以为是新式社区文化的形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居住在以家族和血缘关系所构建的空间中。1949年后的30多年，城市建设虽然也有很大进步，但人们居住的空间，其实是工作关系的延伸——一个家属院的群体，都是同事，这同样是一个熟人社会。只有在商品房的时代，人们才开始面临一种更现代、也更有挑战的邻里关系：一个小区里所居住的，都是陌生人。大家的共同身份是业主，既没有父权的影响，也没有单位上下级的约束，这是更平等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这种变化定义为居住空间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重点，不是房屋结构和设施的现代化，而是关系的现代化。小区的业主们，将如何共同平等地协商事务，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既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又要兼顾社群的利益，在解决各种纷争的过程中，人们最终会学会尊重契约和规则，成为一个有责任和担当的现代人。①

陈炯明广东禁赌

文 | 梁晓菲

陈炯明下令，全省一律禁赌，违者以军法处置、格杀勿论，不容许以罚款替代。因所定刑罚严苛，不久，粤省的公赌、私赌全面肃清。

晚清的广东，赌博盛行，种类名目繁多，地方官员公开承办赌博。1909年10月，广东省咨议局成立，陈炯明任议员，提出全省限期禁绝一切赌博的议案，却遭两广总督袁树勋以筹抵赌饷、分期减禁为由拒绝。

1910年5月至6月，在咨议局会议上，陈炯明提出整顿粤盐、以盐捐筹抵赌饷的议案，打算通过盐斤加价来弥补禁赌后所损失的巨额赌饷，该议案获得通过，而袁树勋却置之不理。

随后，广州市民自发组织禁赌总会，声援力主禁赌的议员，要求政府定期禁赌。年底，力主禁赌的议员组织创办《可报》，意为在禁赌案上填写“可”字。因舆论集体声讨反禁赌的议员，其人纷纷辞职。1911年3月，两广总督张鸣岐宣布实行禁赌，禁绝全省一切赌博。7月，颁行《广东禁赌条例》。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1911年11月，广东独立，成立军政府，陈炯明任副都督和代理都督，随即发布禁赌命令，命各县严格执行，否则追究地方官的责任。当时曾有人委托政府官员请求暂缓赌禁，但陈炯明坚决禁赌。1912年7月，禁绝危害最大、最流行的麻雀牌赌博，要求警察全程跟踪负责，务必将麻雀牌送往警区烧毁。8月，陈将潮州各县列为重点督查的地区，查封赌场，严惩庇赌、开赌分子，把执行禁赌的责任落实到营、县。而后，陈炯明下令，自9

月1日起，全省一律禁赌，违者以军法处置、格杀勿论，不容许以罚款替代。因所定刑罚严苛，不久，粤省的公赌、私赌全面肃清。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龙济光主政广东长达3年。1914年，龙济光开放赌禁，开办山票、铺票等，以应付军费开支，维持统治。1916年年底，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借讨袁护国之机进入广东。1918年年底，陆荣廷仿效龙济光开放赌禁，而且变本加厉，由军官组成集团公司承包赌饷，造成广东烟苗遍地、赌馆满街的局面。

1920年11月，粤军成功驱逐桂军，重新主政广东，陈炯明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当时不少拒赌会的代表向陈炯明面呈请愿书，要求严厉禁赌。不过，革命政府内部有人主张暂缓赌禁，但陈炯明还是坚决禁赌。同月，陈炯明召集全体军官讨论禁赌的事宜，在群众自发的禁赌大游行中发表演说，表明将公布禁赌命令、禁绝一切赌博和拟定治罪章程细则。12月，陈炯明发出定期禁赌的布告，受到人们的热烈的欢迎，又颁布《广东赌博治罪暂行章程》《县知事实施禁赌办法》及相关的实施细则，由军法处办理赌犯，对不同类型的赌犯作出相应的处罚，并追究禁赌不力的地方官的责任，是为民国年间最严厉的禁赌法令。为了有效地贯彻以上的禁赌章程和办法，陈炯明鼓励军民相互揭发赌博陋习，奖赏举报者。1921年，陈炯明重申禁赌令。此后，粤省的赌博绝迹。①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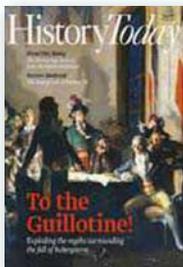
《走向断头台——罗伯斯庇尔的失败》

(英)《今日历史》2015年8月

法国大革命最后的几天在历史上是有着清楚记载的。罗伯斯庇尔曾经是法国革命政府公共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物，他所领导的政权在1794年7月27日即热月9日被推翻。在这一天，法国革命的右翼势力在毗邻卢浮宫的杜伊勒里宫中策划了一场国民大会，发起对罗伯斯庇尔以及他的政治盟友的政变。

会议很快变成了一场骚乱，罗伯斯庇尔被逮捕，这就是所谓的“热月政变”。这场政变改变了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革命政府所奉行的政治激进主义，而将政府的政策倒向宪政主义，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当时的法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局势中，罗伯斯庇尔之所以奉行“恐怖统治”，也有着复杂的原因。只是历史的结果是“罗伯斯庇尔成了他那个时代的矛盾和他自身矛盾的牺牲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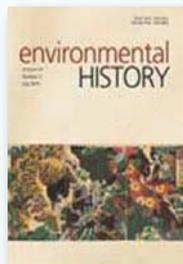
01.



02.



03.



04.

03

《战马》

(美)《考古学》2015年07/08月

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近东和埃及的战争中，马已经开始普遍出现并使用。这个时期，人们对战车的设计与制造方面的技术有了较大进步，使马更普遍地用于战争之中。辐条轮的发明，取代了更为笨重的木轮，大大降低了战车的重量，也让驾驶战车的人能够更好地控制住马。

虽然当时的战车造价昂贵，但其在战场上的作用和有效性使得它成了必不可少的战场装备。根据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两位考古学家研究，青铜时代的战车是战士们移动射箭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国王或将军们督战时的绝佳乘坐工具。而两个轮子的轻型战车也有使用，比如在图坦卡蒙墓中，就发现过只能承载一个射手和驾驶员的战车。

02

《美国史上第一例劫机杀人案》

(美)《史密森学会会刊》2015年8月

美国史上，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例有案可查的劫机并杀人的案件发生在1939年10月27日。

当天，29岁的艾莱斯特·普莱奇同自己的飞行教练、39岁的卡尔·比文思一起坐上一架黄色的小型单发飞机，进行飞行训练。然而，在飞跃密西西比某个城镇时，普莱奇毫无预兆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对准前座的比文思开了两枪，命中其头部和背部，比文思当场死亡。

这个案件即使现在来看也十分诡异。普莱奇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在求学期间为了参加一个旅行节目而中断了学业，去上飞行课也是出于临时的决定，之后又无故谋杀了自己的教练。杀人后的普莱奇自己驾驶着飞机着陆，并在灌木丛里抛尸，然后再次起飞。第二天，他降落在印第安纳州一处牧场时被警方接报抓获。普莱奇被判判处终身监禁，最终死于狱中。

04

《战争、堰塞湖和东部阿尔卑斯山脉的水利史》

(英)《环境史》2015年7月

在20世纪初，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瓦尔兴湖成为将高山湖泊改建成水力发电站的关键点。在当时，许多工程师都建议大力开发阿尔卑斯山中的水源，以扩展水力发电在电力能源中的供应比例，一定程度上实现对煤炭发电的替代。巴伐利亚州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然而社会和政治上的反对意见还是致使该工程在一战前夕停顿下来。

德国战败后，凡尔赛体系建立，领土被重新划分，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德国的储煤量大大减少。能源危机中的巴伐利亚最终重启了水电站的计划。建成的瓦尔兴湖水库确实如其设计者所愿，实现了其能源供给的目的，但却同时带来巨大的环境变化。直到二战后，巴伐利亚人才开始审视这其中涉及到的环境问题。

我和中华民国史研究

文 | 杨天石

我年轻时从未想过自己会研究历史。我最初的理想是当钢铁工程师，因为在我读中学的时期，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建设鞍山等钢铁基地。后来，想当地质学家、数学家；再后来，想当作家，所以我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入校以后，才知道新闻学专业只有四年，于是便改报了双语言文学专业。五年学完，被分配到北京南苑的一所农业机械学校。一年半之后，转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教员。期间我研究过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编注过《近代诗选》，写过《王阳明》《泰州学派》及《朱熹及其哲学》等书。直到1978年，我才正式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从事专业研究工作。

❖ 民国史研究之路

我走上研究民国史的道路，完全出于偶然。

我在研究南社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南社作家在其初期，大多很有创造精神，提倡戏曲革命、诗界革命，写白话文，写新体小说，主张“融欧亚文学于一炉”；然而，到了辛亥革命前夜，正式成立南社时，却大力提倡传统的诗、文、词、骈文，古色古香起来。我研究其中的奥妙，发现是流行一时的国粹主义思潮作祟，于是便写了一篇《论辛亥革命前夜的国粹主义思潮》，



历史反映人类社会已逝的过程，一切必须是曾经发生过的，而且必须是信而有证的。一事不知，则一事缺如。没有可靠的证据，历史学家不能下笔叙述任何一个细节。忠实地再现历史本相是史学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任务。



发表在1964年的《新建设》上。文章发表后十年，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的同志编辑南社资料，发现了我的这篇文章，便将他们的初步选目寄给我，我认真提了意见；他们又约我面谈，并且邀请我参加协作。于是，我便一边教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近代史所从事研究。从1974年到1977年，这期间因王学庄同志介绍，我又得李新教授

同意，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1978年4月，历尽波折后，我终于被正式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得偿多年来想从事学术研究的宿愿。

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后，除和几位研究者合作完成《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下两册外，又于1982年起，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主编并主撰该书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靠了几位年轻合作者的共同努力，该书出版后在海峡两岸均获得好评。

在写作《中华民国史》的同时，我还写了数百篇各种各样的文章。其中，有40篇编为《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第二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了繁体字版。该书获北京93版优秀学术著作奖及国家教委所属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另60余篇，编为《海外访史录》。

此外，关于蒋介石的若干篇，编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关于辛亥革命的若干篇，编为《从帝制走向共和》。以上三书分别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成《近史探幽系列》，于2002年2月、10月陆续出版。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天石近代史文存》，共《晚清史事》《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抗战与战后中国》《哲人与文士》等5卷。

2008年以后，我集中研究和解读蒋介石日记，先后出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三集，被中国图书评论家协会及全国31家媒体、广东南方读书节、《亚洲周刊》《作家文摘》等评为十大好书。2013年再版的《帝制的终结》，获《新京报》年度好书。

❖ 我的历史追求

历史与文学不同，它容不得想象。历史反映人类社会已逝的过程，一切必须是曾经发生过的，而且必须是信而有证的。一事不知，则一事缺如。没有可靠的证据，历史学家不能下笔叙述任何一个细节。忠实地再现历史本相是史学最重要

也是最根本的任务。但是，历史本相并不是一眼可见，一索可得的。它需要历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充分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资料，经过严密的考证与分析，才能比较准确地再现出来。因此，我在国内外访问，所至之处，第一任务都是收集资料，特别是未刊的函电、日记、档案等手稿或未刊稿。当地有什么，我就看什么，从不为自己的研究画地为牢。因此，我的大部分文章都建筑于此类资料之上。经验告诉我：资料浩如烟海，是研究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的困难；但是，也是其方便和幸运所在。只要细心访求，锲而不舍，许多谜团、疑案常常可以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

说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再现历史本相，不意味着历史学可以不要思想，没有观点，纯客观地记录一切。相反，历史学需要说明历史、解释历史，寻找规律，作出价值判断。但是，首先必须弄清、写清史实。对历史的解释可以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但是，历史事实却只有一个。我认为，历史学家笔下的史实要能经受不同立场、不同时期的读者的挑剔和检验，争取做到：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推翻不了我的史实。任何人，要写出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都必须下大功夫，花苦力气，充分地掌握史料，单凭个人聪明，或单凭几条食而不化的理论原则，或者什么新方法之类，都是无济于事的。

民国史充满着政治斗争和党派斗争。当时，没有一个党派不认为自己是真、善、美的化身，不认为政敌是假、恶、丑的典型。今天的历史学家有条件超脱一点，也有条件看到各党、各派、各方留下的资料，因此，看问题要力求全面、公正，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丑说丑，既不盲从前人，也不看风向，不避时忌。既往的观念、认识、结论有的正确，有的则需要根据可靠的史实重新审视，加以修正。民国史上这样的问题很多。当我们只面对史实、面对科学时，我相信民国史的面貌是会有大的变化的。①



杨天石 +

杨天石，著名历史学家、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专家。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帝制的终结》《寻求历史的谜底》等。

理性解剖日本这个特殊的邻居（上）

文 | 章夫

衣带水的说法虽出自距今1400余年的《南史·陈纪下》。今天看来，这个特定的成语，应该是为中日两国量身定做的。

201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和“抗战胜利70周年”为其特殊性增添了异样的砝码。特别是9月的红色中国，如火如荼的纪念声浪一浪盖过一浪。此刻，如果能够带着理性静下来梳理一番，倒是冷静客观认识日本的最佳时机。

❖ 中日交往的“诗歌时代”

作为上天安排给我们的邻居，我们应该是了解日本人的，百年前就有一位中国人对日本的解剖可谓入木三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直取日本文化神韵，在日本的影响力超过了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那就是“被誉为研究日本第一人”的戴季陶和他的《日本论》。戴季陶在百年前这样勾勒日本的精神史——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势力，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动起来，……此时他的范围已经扩大了许多，从前只是在日本岛国里面主张神的权力，到山鹿素行时

代更进一步，居然对于世界主张起日本的神权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

1905年，年仅十四岁的戴季陶赴日留学。四年留学生涯，戴季陶成为孙中山的心腹部下，孙中山与日本政界的交涉，都通过戴季陶的传达执行。

“欲了解世界，先了解邻居”这个道理百年前戴季陶就已经通晓，可他的透彻忠告并没有唤醒当时沉睡的国人。

当代诗人流沙河把中日交往的古代漫长时期形象地称为“诗歌时代”，两千年的漫长交往可谓诗歌般浪漫而友好的历史过往。

中日两国最初的交往要追溯到东汉，那时两国互换国书时，日本称中国“日落国”，中国称日本“日出国”。对古文字有相当研究的流沙河先生妙解，因“本”是树的根，“日本”之意即从扶桑树根部升起——在日本看太阳从西边落下，就落在黄河流域的华夏地区。

最为著名的交往，要数唐开元年间鉴真和尚到日本带去了大量佛经进行文化交流。

唐代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留传至今，说是唐代有一个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国名为晁衡）在长安读书后留在中国做官，李白和他交情不浅。回日本时晁衡在海上淹死了，李白写了一首诗《哭晁卿衡》悼念：“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结果几年后阿倍仲麻吕又回到了长安城，原来他没有上那

Tips

中日两国最初的交往要追溯到东汉，那时两国互换国书时，日本称中国“日落国”，中国称日本“日出国”。

条船。

距离产生美。航海技术把中日之间的距离拉近后，美渐渐失却，摩擦接踵而来。

让日本人铭心刻骨的是，志在征服世界的元人忽必烈，驱赶着他的七万蒙古骁勇之军攻打日本，可快要登陆时，突然而至的龙卷风将七万人马卷入海底，全军覆没。日本人世代代认为那是上天派来保佑他们的风，遂叫做“神风”。因之二战时，日本的空军敢死队就唤名为“神风”。

与近代中国命运类似，自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紧闭的大门后，日本便迅速走向西化。国门洞开，有了后来的明治维新，有了脱亚入欧，有了日本的近代化，有了日本的现代化。

❖ 日本的“兴亚论”与“脱亚论”

流沙河把中日冲突和摩擦不断的近现代称为“散文时代”。果真如此，那可是一篇篇故事不断，写满血腥的纪实散文。

近代以来不幸的战争经历和复杂的利益纠缠大大影响了两国的邦交和国民心理，各种流行的偏见和误解持续妨碍着两国国民的沟通、交流和

理解。这是迄今仍待改变的事实。

与近代日本命运不同的是，“康雍乾盛世”之后的中国同样是被迫打开国门，但却徘徊在近代化的大门之外。面对这睡狮般的近邻，急功近利红了双眼的日本人高扬脱亚入欧大纛，加之军人治国，国将不国，要挟天皇的军国主义复活，肆无忌惮地将野蛮的战车开进了中国的版图。

驱使那辆野蛮战车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做福泽谕吉的人。

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是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日本最大面值的钞票是万元大钞，上面印的头像便是穿和服的福泽谕吉。这样的待遇已经超过了天皇。为什么日本人如此拥戴他？就因为百年前他写了那篇振聋发聩让日本人顶礼膜拜的《脱亚论》。

《脱亚论》为何在日本百年发展史上，有如此重大的作用？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后来的重大影响。

《脱亚论》开宗明义：“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文明犹如麻疹之流行……我辈断乎不具（治愈）其术。有害无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挡其势，何况利害相伴且常以利为主之文明乎！”福泽谕吉认为西洋文明必将征服世界，东洋各国对它绝对没有抵抗能力，就像东京人无法抵御从长崎传来的麻疹；既然无法避免，因此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风气”。

福泽谕吉为什么想起来写这篇文章呢？原来那时在日本舆论界展开了一场思想交锋：日本应该怎样与中国和朝鲜这两个邻国打交道？

直接原因在于，1860年福泽谕吉随幕府官员的一次美国之行。当这些腰佩武士刀、脚踏草鞋的日本使节走进异域饭店时，眼前突然一亮，继而惊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皮鞋奢侈地走在上面走来走去。

两年后，福泽谕吉的灵魂再次被震颤，他随团远赴欧洲，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国。临行前，他听说外国食宿不便，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和几十个铁丝灯笼。可巴黎又给他上了一课，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再考察其医院、银行、邮政、兵制、议会等，日本与之有天壤之别。

两次西方之旅，福泽谕吉失眠了一个月，《脱亚论》呼之而出。

其实日本曾在“兴亚论”与“脱亚论”之间摇摆过。

“兴亚论”认为日本与亚洲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日本的邻国一旦亡国，日本也会遭殃。所以他们提出唤醒亚洲（主要指中国和朝鲜），日本与中国和朝鲜结成同盟国，共同抵抗西洋列强。

日本学者林思云梳理得十分清晰，1880年代的“兴亚论”，主张日本以平等的关系与中国和朝鲜结盟抗击西洋，因为那时日本的国力还很弱，比起当时的大清国还有相当的差距。可到后来“兴亚论”逐渐演变成亚洲在日本领导下，共同抗击西洋列强的理论，比如“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新秩序”等。

对于这种“兴亚论”的思想，受过西方刺激的福泽谕吉似乎没有什么兴趣，他端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脱亚论”。《脱亚论》说得十分明白：“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其理由十分简单：清朝和朝鲜死守陈规旧套，不思改进，不愿革新，所以日本不应该对清朝和朝鲜的醒觉抱有希望。福泽甚至认为，“陈腐守旧的清朝和朝鲜，不但对日本毫无帮助，反而因为他们落后腐败的‘坏名声’，会让西洋人误认为日本也是同样的落后腐败。”

福泽谕吉的观点在当时的日本很有市场。主动打开国门，与欧洲文明同行，与欧洲国家结交，正在演变成日本的不二国策。

福泽谕吉的担心不无道理。日本学者林思云

在《读福泽谕吉〈脱亚论〉有感》中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开始意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主动加入和参与西方文明圈。其实当年日本高速发展的秘诀不过“对外开放”四个字而已。

中国人最应该记住的“1905年”似乎是历史的分水岭。作为日俄战争的结果，像前文所述戴



面对这睡狮般的近邻，急功近利红了双眼的日本人高扬脱亚入欧大纛，加之军人治国，国将不国，要挟天皇的军国主义复活，肆无忌惮地将野蛮的战车开进了中国的版图。驱使那辆野蛮战车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做福泽谕吉的人。



季陶等中国留学生赴日留学成为热潮，而在清政府内部，近代的“国家”概念也正在形成。林思云的分析有一定道理，此时日本在继承了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欧美列强的在华权利之后，导致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兴起，中国人把近代以来所有屈辱的经历找到了一个发泄口，那就是日本。而之后的日本却扮演了一个越来越糟糕的角色。^①

汉唐时期的“另类”选官制度

文 | 唐博

日前发布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对干部“能上不能下”这一老大难问题作出了明确规范。文件一经发布，迅速在社会层面引起广泛关注。

前溯到 2013 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作出了明确规范。

从《决定》到《规定》，干部“能上能下”迈出了一大步。干部的“能进能出”，一个可供操作的《规定》似已呼之欲出。

能进能出，核心在机制灵活。再往历史的深处追溯，帝国时期一些“另类”的选官制度，或许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张大春小说《大唐李白》写李白的同族叔叔李衍，追随其兄、即李白的父亲李客从安西进入中原后，颇倾心于士大夫衣冠，便脱却商籍，谋划起了“流外官”的生计。后来李衍取得了胥吏的任用资格，因干练之才受越州都督府长史褒举，得以出任嘉兴县令，从此“流外入流”，得遂所愿。

李衍其人，历史上未保真有，但唐代“流外入流”的选官制度倒是客观存在。这个选官制度当起于隋末唐初。随着官僚集团的膨胀，朝廷和地方政府要应对繁多的行政事务，赖以九流三十阶以内的 18 万职事之官，显然无能无力。维系官署职事庶务，只能靠“流外”的胥吏。这些“流外”的小吏，经过吏部铨选，被授予职事官或散官，进入“流内”，成为唐代继科举和门荫两个主要选官路径之后，又一入仕途径。

对于“流内”的官员，甚或主宰一方事务的行政长官，他们也常常会为手下无人听差这个问题而困扰，因此，任用胥吏既在职权之内，自能大开方便之门。在科举已然成为唐代主要的选官用人制度的背景下，“流外入流”虽然另类，但它为巩固帝国、征选才干确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到了高宗、武周时期，地方官署任用的诸般胥吏，竟然达到了 35 万之众。

这种“流外入流”的选官制度，用今天的话来理解，就是经

由领导的褒举和人事部门的考核，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一种选官用人制度。唐朝用人制度的开明，或许得益于汉朝的一开风气，而“流外入流”的制度，更多受到了汉朝的“举孝廉”制度的启发。

汉武帝元光元年，皇帝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名为两科，但在两汉时期，孝廉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其科虽属清流之目，但仍然不失为官吏进身的正途。虽然孝子廉吏不尽然都是干才，但对于帝国的官场风气，却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比及唐朝的“流外入流”，“举孝廉”几乎是汉朝帝国主要的选官用人制度。自汉武帝以迄东汉，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可见这一制度对汉代政治的影响深巨。

从思维启发上推，汉代的“举孝廉制度”又可能脱胎于先秦的征辟制。帝国通过自上而下选拔官吏：征，是皇帝征聘；辟，是公府、州郡辟除。秦始皇征叔孙通，是因为叔孙通有文学才华，而王次仲则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得征。后来的汉高帝发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无论是“举孝廉”还是“征辟”，都可看到其制度的开明性和灵活性，由此，也足见此类选官用人制度背后的帝国襟怀。

帝国数千年，人才万万亿。帝国和地方政府从士人中选拔才干进入官僚系统该采取什么方法更为人性和完备，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帝国的组织系统。科举制在明清两朝，已越来越多地显现出弊端，让更多士人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破除体制障碍显然是历史的必然，晚清之后的变革，当是为新中国成立后一新面目的人事制度改革所作的一种有效铺垫。

今天，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更多的体制外人员来处理繁杂的行政事务，为这些体制外的优秀人员提供一个进入体制内的通道，这是今天的开明开放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不妨说，人才的“能进能出”，比起干部的“能上能下”来，似乎显得更急迫和更重要——好的能进去，坏的才能出来。①



史叔下午茶
看历史
EYE ON HISTORY

话题： 民国爱情故事：张兆和与沈从文

/读杂志/ 1928年，沈从文来到中国公学任教，不过26岁。这一年，张兆和18岁，是中国公学校花级的人物。有一天，张兆和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写来的，信中只写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你？”

史叔：民国，从来不缺诗人与爱情。“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如果要评选民国最美情话，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这句话绝对可以名列前茅。但，这样让人动容的爱情故事却让脑洞大开的网友们“玩坏”了……快来看看网友的评论吧！



“博学普识”派

坚持住你的梦想并不远：再美的开始也会在琐事中逐渐磨灭。爱情是一时，亲情才是一辈子。

ZZB I：沈从文也算是一个悲剧人物，人生后40年几乎没留下任何文字，除了遗言“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大棒惹炫酷哦：沈从文和熊希龄聘的家教高青子的事情不是只有林徽因知道，为什么全世界都知道了？

大仙儿_薛：那个年代流行师生恋么？鲁迅与许广平，徐悲鸿与孙多慈。

@我曾掀十方烟笼桃夭：张家姐妹四人的夫君都不是等闲之辈——顾传、周有光、沈从文、傅汉思。

“脑洞大开”派

白子如画桃花干骨：又是一对师生恋，白子画和花千骨也是师生恋。

文化一驿：现在可不允许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迷失在春天的彼岸：放在现在，就不会是爱情故事了，估计成普法故事了。

夙听：做老师的这样真的好吗？为什么男老师这样写给女学生都是佳话，如果是一个18岁的男学生与26岁的女老师，不知道会被多少唾沫星子淹死在历史！





评论最火微信
(2015年7月)



最火微信榜
(2015年7月)

与《少女之心》有关的性与罪

推送时间: 2015-07-28

阅读人数: 1083694

史叔: 经历过“手抄本”年代的读者都知道,《少女之心》手抄本是个年代读者群最多的书籍之一。现在的年轻一代坐享丰富的信息资源,可能难以想象一本书怎会引领时代潮流,又怎会让人犯罪?话说我们的文章一出,这本书可能又要火了。



《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

剑照云天:

当年看《少女之心》手抄本,听邓丽君的歌,就像做贼似的。

枉凝眉:

当年传抄过《少女之心》的读者,现在差不多都是爷爷奶奶级别的人了,是广场舞的主力军。

阳光 68: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是把那个时代少女的青春萌动描写的非常真实。

哥 feelong:

看过《少女之心》手抄本的,年纪都很大了。没想到一本书会带来这么多故事。

寒鸟之夏:

其实看过后就知道,真没啥过分的,比现在的言情小说纯洁多了。

no.1

二战时期移居中国东北的日本人

推送时间: 2015-07-13

阅读人数: 342715

史叔推荐: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出后,强制东北一些地区对日开放,大批日本国民在政府的推进下源源不断来到这些地区,成为“飞地移民”。他们在中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敌国公民,他们的下场又是什么?这段历史鲜为人知。

no.2

苏德之战,寒冷天气到底帮了谁?

推送时间: 2015-07-14

阅读人数: 261122

史叔推荐: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通过“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希特勒100多年后重蹈拿破仑的覆辙,寒冷天气帮助苏联将纳粹德国击败。其实,要说苏联的鬼天气帮了谁,那也是德国,要不是因为“天气”欺骗了苏联,德国人连苏联的大门也未必踹得开。

no.3

帝制终结——清帝退位始末

推送时间: 2015-07-03

阅读人数: 171650

史叔推荐: 1912年2月12日,大清隆裕太后携6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至此,帝制中国2132年的历史打上了一个句号。从1911年10月30日至退位日,各方力量在晚清最后一幅画卷上纵横捭阖、角逐博弈,比宫斗戏精彩多了。

no.4

春秋战国的正确打开方式

推送时间: 2015-07-25

阅读人数: 80429

史叔推荐: 作者告诉你要了解春秋战国的历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别翻开中学教科书背“某某年,某国被某国所灭”。打开本文,保证你笑破肚皮。

* 阅读人数为微信推送一周内的点击量。如您感兴趣,请关注《看历史》微信公众号 EYEONHISTORY 查阅。



微社区：在故乡迎风奔跑

话题 1301 访问 26428



精华



名人堂



相册



分类



更多



主持人 / 史叔



网友评论

/话题/

“对故乡熟悉的人都晓得，真正的台风在乡镇。脱离了城市清一色的水泥路和水泥房，台风在乡镇才算本色。镇上的孩子比城市里的更喜欢台风，狂风暴雨中，赶着一群鸭子下山，山上的溪涨满了水，溪上飘着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名字的白色花瓣。孩子们飞奔着下山，鸭子们也纷纷跃入溪水中，仿佛挣脱了牢笼一般顺流而下，啄理着羽毛，和孩子一起欢叫。”最近东南沿海台风肆虐，对离家的游子而言，台风却也能寄托乡愁。你家乡有什么极端的自然灾害么？”

#话题#故乡，台风

“对故乡熟悉的人都晓得，真正的台风在乡镇。脱离了城市清一色的水泥路和水泥房，台风在乡镇才算本色。镇上的孩子比城市里的更喜欢台风，狂风暴雨中，赶着一群鸭子下山，山上的溪涨满了水，溪上飘着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名字的白色花瓣。孩子们飞奔着下山，鸭子们也纷纷跃入溪水中，仿佛挣脱了牢笼一般顺流而下，啄理着羽毛，和孩子一起欢叫。”最近东南沿海台风肆虐，对离家的游子而言，台风却也能寄托乡愁。你家乡有什么极端的自然灾害么？”



梁静 @olm_130369494733fy_3ag

微博 3 | 评论 0 | 赞 0 | 转发 0 | 关注 0 | 私信 0

家乡的沙尘暴

我是土生土长的包头人，可我却不会说包头当地方言，一直是我的遗憾。不过，我可是很怀念家乡的沙尘暴。可能有人说我傻，那可是污染！可我却是怀念。小时候，一到春天，飞沙走石，昏天暗地，走路不用费劲，当然，那得顺着风走。要是逆风，还是等等吧，除非你想锻炼身体，原地踏步。经常想起老舍先生描写北京的沙尘暴，特有体会。现如今，包头几乎见不着沙尘暴。回想起在沙尘暴中行走、奔跑、藏猫猫，当时确实很快乐。虽然回家后满脸是泥，脸上也是两道白沟，嘴里全是赠品——沙子。沙尘暴过后，天是蓝的，万里无云，阳光洒下来，暖暖的，又是一年！

简单生活：

应该是泥石流，每次都紧急撤离。

雨田：

东南沿海的孩子一说台风都心领神会！

缪：

高温酷热算吗？武汉能把把你热趴下。

筱月：

台风天好凉快呢。

梁静：

我是土生土长的包头人，可我却不会说包头当地方言，这一直是我的遗憾。不过，我可是很怀念家乡的沙尘暴。可能有人说我有病，那可是污染，但我就是想念。小时候，一到春天，飞沙走石，昏天暗地，走路不用费劲，当然，那得顺着风走。要是逆风，还是等等吧，除非你想锻炼身体，原地踏步。经常想起老舍先生描写北京的沙尘暴，特有体会。现如今，包头几乎见不着沙尘暴。回想起在沙尘暴中行走、奔跑、藏猫猫，当时确实很快乐。虽然回家后满脸是泥，脸上也是两道白沟，嘴里全是赠品——沙子。沙尘暴过后，天是蓝的，万里无云，阳光洒下来，暖暖的，又是一年！



看 见 过 去 知 道 未 来



《看历史》微信公众号



《看历史》新浪微博



1949年开国大典，步兵部队通过检阅台前。图/CFP

024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阅兵：大国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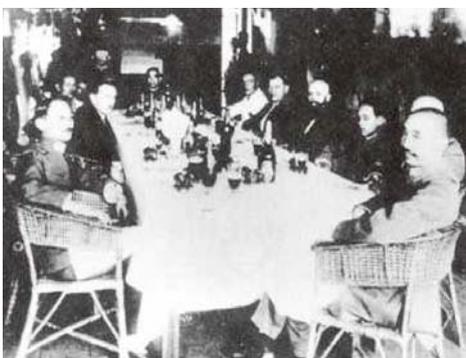
在既有的阅兵时间序列中，2015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不属于“国庆阅兵”，而是“抗日战争胜利大阅兵”，这在我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为了纪念更广阔的历史而检阅自己的军队。换句话说，这一次的阅兵，不再只是着眼于国内的重大意义，而是对世界和平发出的一种呼求，一种强调。

微历史 Microfilm History

- 001 居住空间的现代化
- 002 陈炯明广东禁赌
- 003 新闻
- 004 我和中华民国史研究
- 006 理性解剖日本这个特殊的邻居（上）
- 010 汉唐时期的“另类”选官制度
- 012 微言

91年，黄埔军校的 红色传奇

1924年的6月16日，广州长洲岛，黄埔军校正举行开学典礼。当时步入这所军校的学生们还不知道，之后他们将会在东征、北伐、抗日战争中付出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020

热历史 Hot History



058

80年前 航拍下的中国

80年前，德国飞行员卡斯特尔用相机为当时的中国记录下了珍贵的影像：从北部内蒙地区至南方广东地区，从繁华的城市到人迹罕至的雪山、沙漠、草原，从北京故宫到西夏王陵等自然景观、城市图景和历史古迹。穿越历史，可以不通过时光机。翻看这些旧照似乎就足矣。

- “纸片轰炸”日本 064
- 失落的帝国：谈谈拉美古文明 072
- “刀下留城”：平遥古城护城记 074
- 别时容易见时难
——左权将军的抗战家书 080
- 盛爱颐：中国首桩女权官司 084
- 丁韪良：游历大中华帝国 090

历史的细节： 70年前的红色影像

20世纪上半叶是一段战乱纷扰的岁月，但仍然有一批中国摄影人，经历了红军时期、长征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坚持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着历史的细节，使我们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望那些战火硝烟中的瞬间，感觉那些曾经鲜活真实。



096

- 102 山西票号：
汇通天下，继失天下
- 108 伍廷芳：
中国近代长图法治第一人
- 116 西路军余部在新疆
- 118 美猎杀日军最大航母
- 124 桑奇大塔：
西方佛国的世俗情怀

厚历史
Thick
History

酷历史
Cool
History



128

“真实”的童话 迪士尼乐园60岁

从开园那天起，迪士尼乐园便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即便如此，乐园内仍然定期添加新的景点。华特·迪士尼说，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想象力，迪士尼乐园便永远不会完成。迪士尼乐园是现实世界中“真实”“落地”的童话，无数的梦幻和神奇在这里一一实现。

- 一战的时尚遗产：风衣 134
- 古代那些与官场风波有关的“离婚” 138
- 破除英国人关于鸦片战争的
自我催眠 142
- 将将之才 143
- 诸葛亮为何不用考试 144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095-0853
国内统一刊号
CN51-1732/k
广告经营许可证
5101034000361
邮发代号 62-313

出品人 严光辉

总编辑 苑海辰

采编总监 柯菁

编辑 吴蔚 黄鑫 凌波
蔡丽萍 黄弋

新媒体运营 毛瑞 孙琨

美术编辑 闫星 王珏菲
编务 范若青

运营总监 罗荣敏
发行总监 叶翔
发行经理 陈锐

主管主办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
出版 看历史杂志编辑部

运营机构
成都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局发行
四川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本刊法律顾问
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

印制
四川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图片合作
CFP、东方 IC、人民网、新
华社、FOTOE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
成都日报报业大厦2203室
电话/传真 028-86621481
邮编 610017

本刊声明

本刊所有文字图片的版权，均
归本刊所有。未经本刊书面明
确许可，不得转载。否则本刊
必将追究侵权责任。

凡向本刊投稿并采用，均视为
作者同意授权本刊通过网络、
电子杂志、结集出版等方式使
用该作品，如有例外，请书面
声明。本刊所付稿酬包括刊物
内容及其他使用报酬，不再
另付。未署名图片、文字作者
请与本刊联系，以奉稿酬。

杜绝虚假报道

举报电话：028-86625451

看历史

Eye On History



欢迎联系我们

《封面故事》编辑邮箱：1602651769@qq.com
《微历史》《厚历史》编辑邮箱：2010025743@qq.com
《热历史》《酷历史》编辑邮箱：klsbjhy@163.com
新媒体编辑邮箱：27330889@qq.com

投稿邮箱：klstougao@163.com
《看历史》微信公众号：EYEONHISTORY
《看历史》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uojialishi
《看历史》腾讯微博：http://t.qq.com/history0799

广告热线
028-86621481 (传真)

发行订阅电话：
028-86763285
028-86624841

在以下城市可以买到《看历史》

成都	尚和书店	028-86667805/18908079206
重庆	尚和书店	023-86359611/13883585088
昆明	尚和书店	0871-64122816/13808715581
贵阳	尚和书店	0851-5661974/13078514533
遵义	尚和书店	0852-8715679/13984201585
西安	尚和书店	029-82100992/15902924011
太原	尚和书店	0351-5625806/13934583130
南宁	尚和书店	0771-2624534/13617715181
桂林	尚和书店	0773-2834966/13217732489
南昌	尚和书店	0791-88592700/13576955788
柳州	尚和书店	0772-2176764/13132720066
长沙	尚和书店	0731-2810105/15074927150
武汉	春秋书店	027-85493562
哈尔滨	翔宇书店	0451-88341807
沈阳	小门书报刊发行有限公司	024-62500517
石家庄	兵行天下书店	13633313388
济南	联合书社	0531-82052662
郑州	大河期刊	0371-67647276
苏州	和缘书店	0512-65188163
南京	星与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5-83327129
兰州	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8521092
乌鲁木齐	新疆大漠天马书店	0991-5837665
广州	卓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0-32723429
深圳	新宏博发展有限公司	0755-22203426
温州	华鸿有限公司	0577-81707629
杭州	华鸿有限公司	0571-88256120
北京	北京市报刊零售公司	010-83158388
大连	天天期刊	0411-8522978
天津	新兴书店	022-27694099



《看历史》微信公众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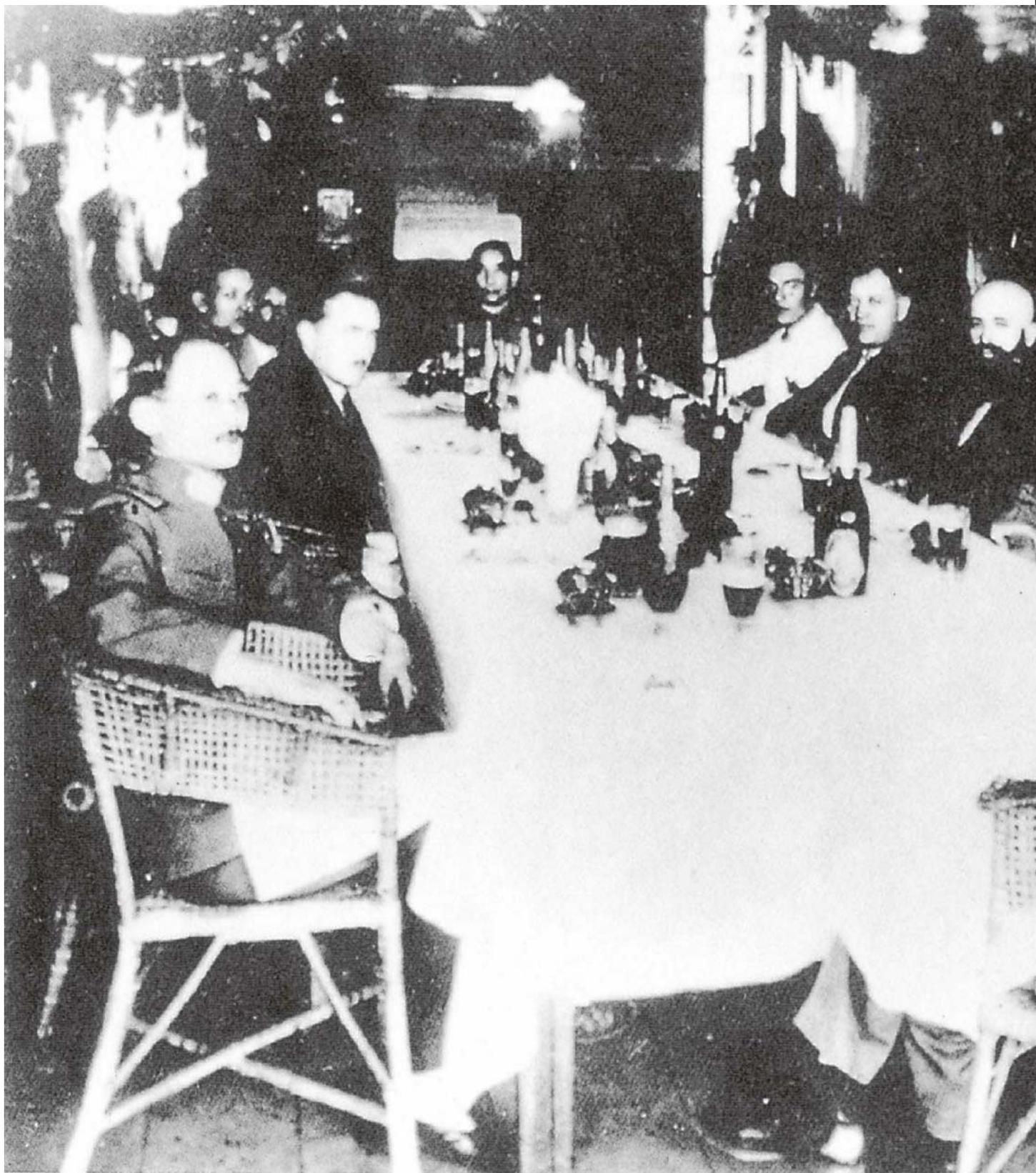
《看历史》淘宝店



《看历史》腾讯微博



《看历史》新浪微博



微历史 Microfilm History

影像纪年

91年,黄埔军校的 红色传奇

文 | 季洁

微历史版块编辑: 蔡丽萍
邮箱: 2010025743@qq.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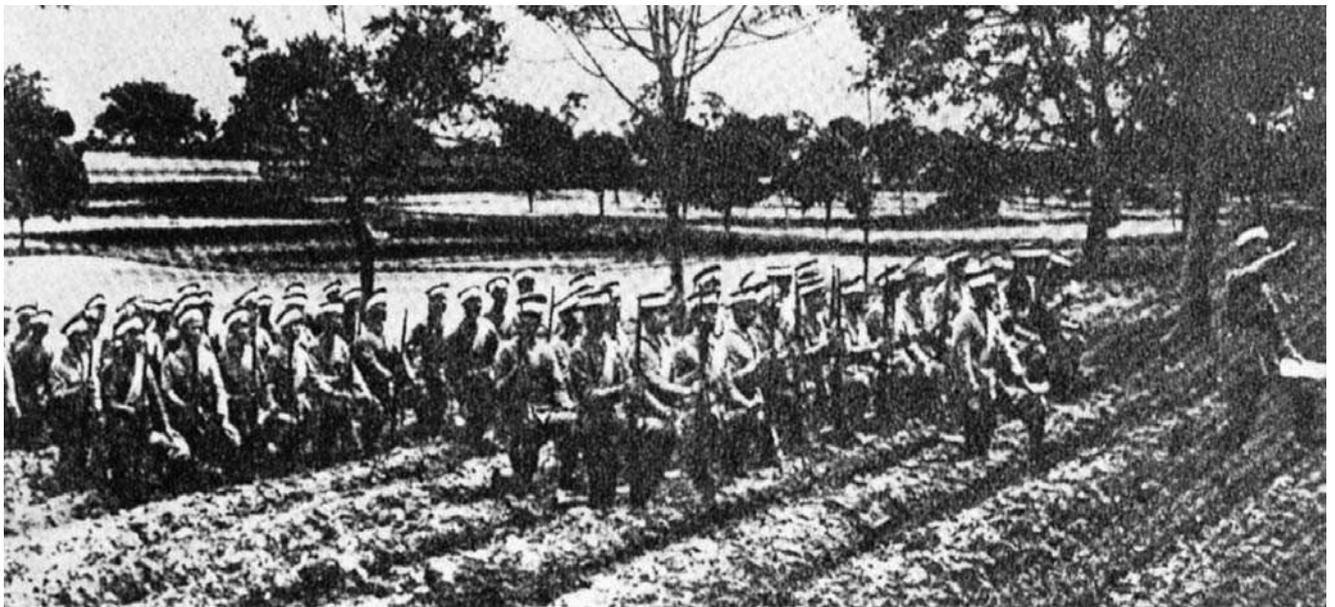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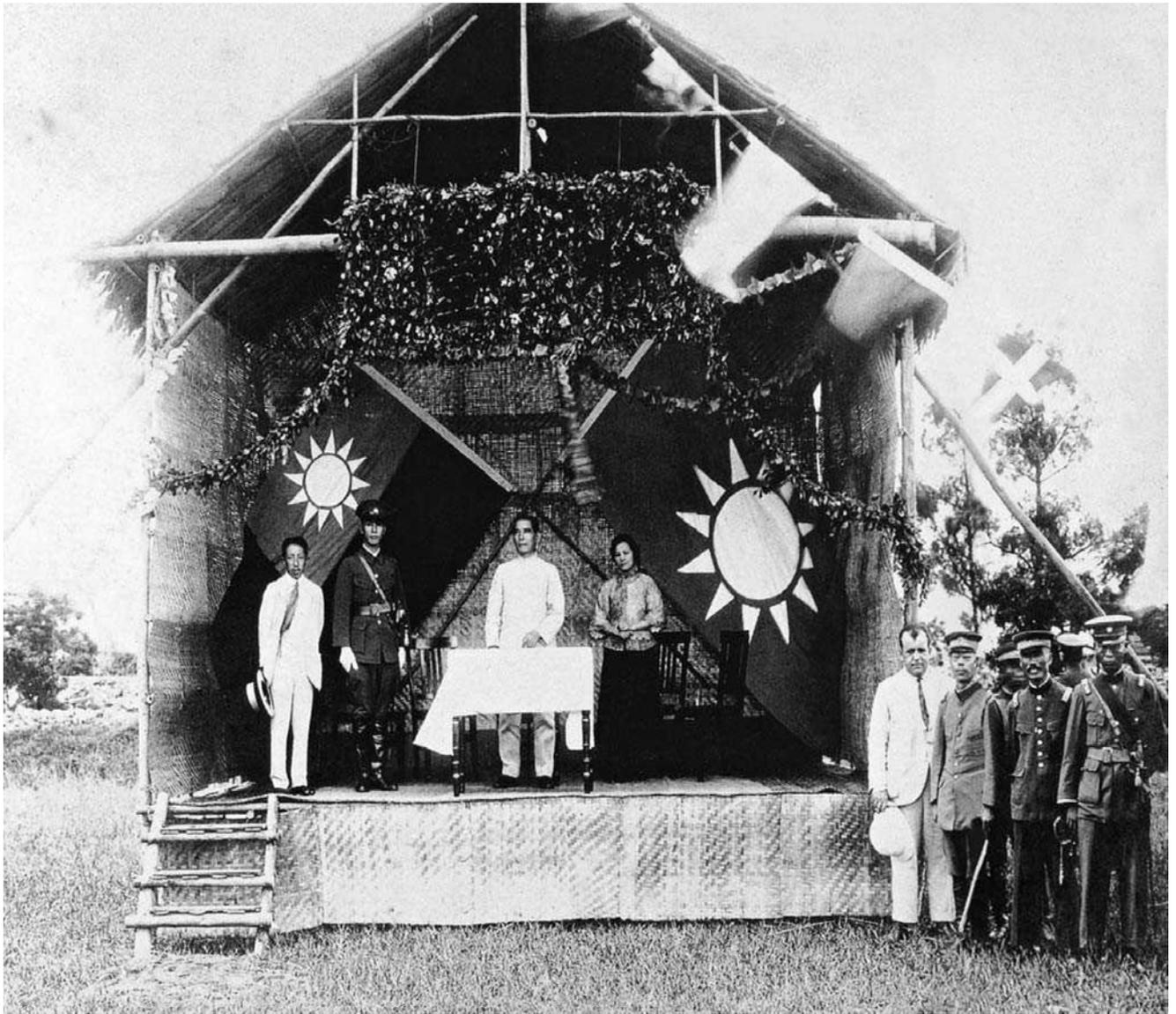
广州长洲岛, 1924年的6月16日, 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军事学校——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校)正在举行开学典礼。当时步入这所军校的学生们还不知道, 之后他们将会在东征、北伐、抗日战争中付出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他们不知道, 这所军校里的同窗会在之后的卫国战争中血染疆场、彪炳史册。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一所军事学校, 不少共产党人也参与了黄埔军校的创建和发展。湖南省负责招生的是共产党员何叔衡, 毛泽东和恽代英曾负责主持黄埔军校一期的复试工作。周恩来、张申府、茅延楨等共产党人也曾在黄埔军校担任教职员, 周恩来还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也吸引了很多共产党人前去报考学习。据统计, 在建校后的两三年里, 有近千名共产党人云集于黄埔军校。

从这里走出的学生先后参与东征、北伐诸役, 又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黄埔一期生中的共产党员曹渊、蒋先云皆在北伐中牺牲。左权将军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他协助彭德怀打响了百团大战, 重创侵华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还有许许多多的黄埔子弟, 他们秉持黄埔精神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冲杀, 指挥士兵前仆后继, 领导百姓组成游击队进行各个敌后战场的抵抗……



20世纪20年代, 孙中山宴请苏联顾问团团员。当时苏联政府大力支持黄埔军校的创建, 派遣顾问团参加军校的创建和教学工作。图/FOTOF





01	03
02	04
	05

01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主席台上自左至右分别为:廖仲愷、蒋介石、孙中山、宋庆龄。图/FOTOE

02 20世纪20年代,广州黄埔军校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图/FOTOE

03 1925年6月23日,沙基惨案中被英法军枪杀的黄埔军校学生。1925年6月23日,参加抗议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游行示威的黄埔军校学生到达沙面租界对面的沙基东桥时,被英法海军陆战队机枪扫射,在现场的李曼华全身溅满烈士的血迹,冒死抢拍下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图/FOTOE

04 1924年11月,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学生潘学吟的毕业证书。图/FOTOE

05 1984年,广州,老人们时隔60年后再次回到黄埔军校(陆军军官学校)时合影。图/FOTOE



大国崛起

阅兵





今

年，2015年的阅兵，和以往有根本的不同。

从时间节奏上看，1949年到1959年，国庆阅兵每年都要举行一次。1960年，国家决定改革国庆典礼制度：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按照这一精神，1964年是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后第一个“小庆”，当年也有人提出要搞国庆阅兵，但是当时国家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恢复，本着节约精神，这一年的国庆没有阅兵。紧接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阅兵也就没有举行。

按1960年的改革精神，1984年也是“小庆”，但是这一时期国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万象更新，即使是短短的几年，社会经济仍有很大进步。这一年的阅兵，也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阅兵之一，并进入了中学历史课本。

1999年，是国庆50周年。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这是一个大日子，并且这十多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最快的时期。1999年的阅兵，武器的现代化程度让世界惊讶。此后的2009年阅兵，则是新世纪后的第一次阅兵。从1999年-2009年，显示出“十年一大庆，逢大庆阅兵”成为一种趋势。

在这样的阅兵时间序列中，2015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不属于“国庆阅兵”，而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这在我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为了纪念更广阔的历史而检阅自己的军队。换句话说，

这一次的阅兵，不再只是着眼于国内的重大意义，而是对世界和平发出的一种吁求，一种强调。

梳理中国的阅兵史，我们可以看出三个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最初的阅兵（1949年-1959年），强调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个新生的国家，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复杂局面，这一时期的阅兵，捍卫自我的色彩浓厚——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空军甚至是实弹受检，因为那时还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危险。1984年-2009年间的3次阅兵，强调的是国内建设的成就——改革开放，国家发展日新月异，这在兵器的更新换代上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而今年的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则是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已经是世界上GDP总量第二的国家，承担着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面对日本右翼对历史的杂音和复杂的地区形势，中国有必要展示出对历史的捍卫和对和平的承诺。

这三个阶段的变化，显示出中国已到了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阶段。从向西方学习、全方位引进资金技术，到经济转型升级，再到在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层面为地区乃至世界做贡献，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传统的阅兵，重在展示硬实力，而今年纪念抗战胜利的大阅兵，所展示的则是价值与责任。有关历史的态度，有关未来的想象，这些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比枪炮导弹更为重要。

因为，大国的崛起，是实力的崛起，更是责任的崛起。

文|浦顿

60 年阅兵简史

文 | 黄小凡

从 1949 年到 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共进行了 14 次阅兵。1949 年的开国大典阅兵，是开创性的；1950 年到 1959 年，则是每年一次的阅兵，这一时期的阅兵，备战氛围浓厚；中断 25 年后，1984 年重启的阅兵，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人踏上新征程的一个写照；1999 年和 2009 年的阅兵，则是在和平新时期的阅兵，也是人民可以从电视直播中观看的阅兵，阅兵，成为每个人都可以同步感受到的国家仪式。

回顾过去 14 次阅兵的全貌，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可以看清一个大国崛起的道路：阅兵从来不是简单的对军事力量的检阅，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进步的集中展示，也是时代精神的写照。





01

01 1952年《人民画报》第10期：国庆三周年，天安门检阅台左至右分别为：周恩来、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总理泽登巴耳、毛泽东、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图/王琼/FOTOE

02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接受检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图/FOTOE

03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飞机。为了防范国民党空军可能进行的空袭，此次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17架飞机，有4架带弹飞行。图/林扬/FOTOE



02



03



04

04 1952年《人民日报》第10期：国庆三周年庆典中解放军盛大阅兵装甲车部队阅过。图/王琼/FOTOE

05 1951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节阅兵式的炮兵部队。拖拉机拖炮是当年国庆节阅兵的一道独特“风景”。图/蔡尚雄/FOTOE

06 1953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从抗美援朝战场凯旋的志愿军战士，在国庆节阅兵式观礼台上观礼。图/孔繁根/FOTOE



05



06



开国大典阅兵：从0到1



举行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还是西苑机场？如今看来，这两套方案的优劣明显，但在当时，这两套地点方案，在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放了整整17天。

1949年开国大典的阅兵，这是从0到1的一次，这次阅兵为以后的数十次阅兵奠定了基本的格局，包括时间、地点、组织方式和程序，其中，最重要的选择，是地点的确定。此后的阅兵，都是在这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调整、完善和创新。1949年3月25日，西苑机场成为迎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入城阅兵的广场。这次阅兵的规模虽然比不上后来开国大典的阅兵，但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大规模阅兵仪式。

1949年6月15日傍晚，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连续开了5天，其中一项决议是：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届时将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

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由周恩来担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筹备委员会很快就拿出了庆典方案，内容主要有三大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而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么组织，在什么地方组织，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

西苑机场已经举行过一次阅兵，那一次可以说是开国大典阅兵的预演，因此，在西苑机场进行阅兵，就成为一个选择。机场跑道宽阔，容纳的人多，也没有阻断交通的后顾之忧。当然，

1949年10月1日，北京，开国大典上的步兵分列式。图/FOTOE

在西苑机场阅兵也有明显缺陷，没有检阅台，临时搭建应付一些小的场面还可以，要举行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就不行了。即使新建检阅台，场面无论如何也比不过天安门广场。如果把阅兵地点放在天安门广场，有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地处北平市中心，道路四通八达，便于数十万人集结与疏散。天安门气势恢宏，广场宽阔壮观。城楼是现成的阅兵台，不必费太多的力气，城楼上就可以容纳全体新政协代表，领袖、军队与群众水乳交融的热烈场面也可以想见——最重要的是，这里过去曾是中国政治中心，未来也会是，而在这里阅兵，其政治含义和感召力，是别的地方无法相比的。

如今看来，这两套方案的优劣是明显的，但是在当时，这两套地点方案，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摆放了整整17天。9月2日凌晨，周恩来权衡利弊，终于定下决心：天安门。毛泽东和朱德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阅兵难度最大的是飞行梯队，受阅飞机大都从各地战场上缴获而来，机种复杂；17名飞行员中有12人是国民党空军起义、投诚而来；受阅飞机定在下午4时升空，是考虑了国民党空军袭扰的因素。

从技术角度看，开国大典阅兵难度最大的是飞行梯队，因为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正式的空军，而飞机也都是从敌人那儿缴获的。开国大阅兵时，有一个混合飞行梯队共17架飞机参加受阅。《阅兵典礼方案》程序（四）明确规定：“午后4时，在步兵分列前进时，飞机出现于阅兵台面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地面分列式。”在预演飞行时，中南海怀仁堂里正在召开新政协会议，周恩来在

会上发言。忽然，室外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政协委员们以为国民党空军的飞机轰炸北平城来了。周恩来高声告诉大家：“请不要误会，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担负着北平的防空任务，是保护我们的，他们正在进行飞行演习。”

受阅飞行总领队由华北军区航空处飞行队长徐兆文担任。徐兆文所承担的压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受阅飞机大都是刚刚从各地战场上缴获的，有战斗机，有轰炸机，还有运输机、教练机，机种复杂，性能各异。有的飞机甚至是从收集到的零配件组装起来的。飞行员来自四面八方，彼此陌生，缺乏配合——17名受阅飞行员，有12人是国民党空军起义、投诚过来的，也有红军时期中共中央派往新疆学习飞行的老同志，还有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优秀飞行员。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受阅飞行训练开始前，每名飞行员都向组织上立下了“生死状”。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15时开始，受阅飞机16时升空。定在下午举行庆典的主要原因，是考虑了国民党空军袭扰的因素。当时，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1949年5月4日，盘踞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派B-24轰炸机空袭过南苑机场，后来青岛解放了，但国民党空军在舟山群岛及台湾省都有远程奔袭的飞机，随时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但天色晚了飞机就无法回航了。尽管开国大典时的防空准备了各种预案，但还是决定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以便为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飞机争取更多的时间。最后，在参加开国大典的17架受阅飞机中，有4架飞机带着实弹。

开国大典那天，为了显示人民空军的力量，第一批9架战斗机飞过天安门之后，兜了一个大圈，跟在教练机后面，又飞过天安门一次，给人的感觉是共有26架飞机。而在场的外国记者也没能看出个中奥秘，他们在随即发出的报道中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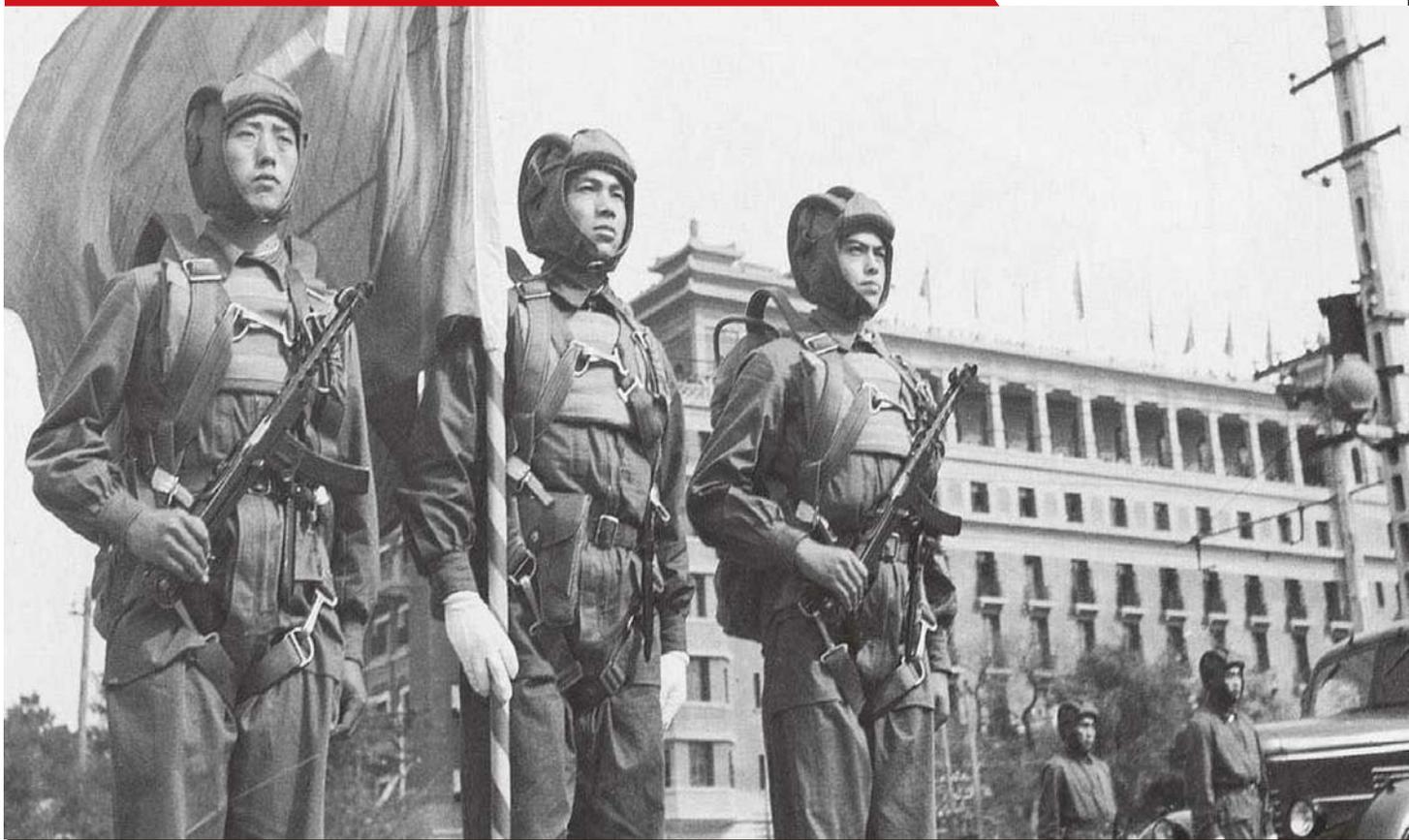
一面搞生产，一面备战。这是第一个十年阅兵的典型状态，阅兵并不仅仅是庆祝和平，最主要的是对军队战斗力的检阅。因为，国际形势的复杂诡谲，战争看上去随时都会发生。

1949年开国大典时，还没有实现全国解放，解放军还在部分地区追剿国民党残余军队。1950年的阅兵是继开国大典后的第2次国庆阅兵。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观礼阅兵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任阅兵首长检阅部队。朱德

在阅兵式上发布命令，就朝鲜战争爆发、台湾省的局势，要求人民解放军做好战斗准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仅半个月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

到了1958年的国庆阅兵，已经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第10次阅兵了。这一年，战争的阴影仍笼罩在中国人头上——1月，美国协防台湾司令麦克阿瑟宣称：“必要时将用导弹攻击中国大陆。”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决定于是年10月26日前分3批全部撤出朝鲜。3月，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在甘肃创建。7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中国方面拒绝了苏方不久以前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中苏关系

1950-1959：备战中向前





出现严重裂痕，以至发展到军事对抗；人民解放军入闽作战，3个月内击落击伤国民党军机27架，8月，为反击台湾国民党海、空军对福建沿海的骚扰，人民解放军万炮齐轰金门的作战打响。9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因此，这年的国庆阅兵“战争气氛”也就显得特别浓。

这是第一个十年阅兵的典型状态，阅兵并不仅仅是庆祝和平，也是对军队战斗力的检阅。因为战争看上去随时都会发生。这也是共和国最初十年面临的挑战——一面搞生产，一面备战。

这10年，共和国经历了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都在阅兵式和紧随其后的群众游行中有所反映。每一次的细节演变，都是共和国最简明的编年史。10年，一步一个脚印。

1950年国庆阅兵庆典于上午11时举行，最壮观的景象是骑兵部队的1900匹白色骏马以6路纵队通过广场和公安部队首次受阅。1950年国庆节，被称为“第一届国庆节”，这一“届”的称谓一直延续到1954年国庆节。另外，天安门城楼前的广场，在当时的报道中称为“人民广场”，次年即统一称为“天安门广场”了。由此至1959年国庆，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式，基本按照这一年的程序进行。

1951年国庆两周年阅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3次国庆阅兵。这一次的阅兵出现了好几个“第一”：第一次出现由华北老解放区民兵模范和代表组成的民兵方队；第一次有伞兵部队、探照灯部队受阅；喷气式飞机首次受阅，告别了以往螺旋桨飞机受阅的历史；庆典由上午11时改为10时开始，从此成为定制。

1952年阅兵，公安部队和少数民族民兵大队首次参加阅兵式和分列式。

1953年国庆4周年阅兵式，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该次阅兵仪式上，火箭炮兵方队第一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使用的

01

02

01

1954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节阅兵式的伞兵。图/红枫/FOTOE

02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接受检阅的空军飞行队。图/FOTOE



1984：一个新的开始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受阅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大大提升，全部 28 种武器中有 19 种是新装备，有的已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次参加阅兵，震撼世界。

1984 年 10 月 1 日，在首都北京举行了欢庆共和国建国 35 周年的盛大庆典，改革开放使中国大地迸发出了勃勃生机，人们终于在 1959 年之后再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了震撼人心的阅兵式。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坐红旗牌黑色敞篷轿车在阅兵总指挥秦基伟的陪同下开始检阅部队，邓小平喊出“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的口号。在这次大阅兵中，受阅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大大提升，全部 28 种武器中有 19 种是新装备，有的装备已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次参加阅兵，更是震撼了世界。

1984 年 10 月 1 日，建国 35 周年国庆，天安门金水桥前，北京大学生物系游行队伍中学生突然亮出“小平您好”的横幅。图/王文澜/FOTOE

这一次阅兵式是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形势下举行的，是一次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展示军威和国威，检阅新中国建设成就和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成果的重大庆祝活动，是继 1959 年国庆后，25 年来第一次盛大的国庆阅兵，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此次担任检阅部队的阅兵首长，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83 年 11 月中旬，在邓小平的亲自部署下，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布置 35 周年国庆庆祝和阅兵筹备工作。这次受阅部队共 10370 人，各种作战飞机 117 架，导弹 189 枚，坦克装甲车 205 辆，火炮 126 门，火箭布雷车 18 辆，轻武器 6429 支(挺)，汽车 2216 辆，组成 46 个方(梯)队。

这次阅兵的盛况，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人们高度赞扬这次国庆阅兵所展现的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成就和精神风貌。中国终于再次走上



正轨，短短几年，走上正轨的中国就显示出了她进步的速度。1984年的中国人，是充满朝气的，相信会有更美好的生活在前方等待，这样一种国民情绪，在这次阅兵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而对世界来说，这样一个中国，无疑是值得拥抱的。1984年的阅兵，所展示的军力远超以往，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这个国家值得信赖——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国开始为了和平而阅兵。

本次阅兵式的游行队伍也足以载入史册。首都群众游行时，一条“小平您好”的横幅突然展开，被新闻摄影记者牢牢地定格，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珍贵的记忆。

“小平您好”横幅制作者之一郭建崑，当年身着白大褂将横幅秘密携带入场。郭建崑1963年12月生于山西大同。1985年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于华南农业大学教书，1990年北京大学生物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同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至今。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此回忆：

1984年国庆，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我们81级学生代表北大参加大学生方队游行。9月30号晚上，我们几个在宿舍里扎花，当然心情都很兴奋。我们的宿舍是28号楼203房间，有常生、张志、杜杰、柳波、王新力和我。常生是北京人，字写得不错。

我们边扎花边议论明天的活动。大家七嘴八舌，突然有人说：“明天的游行，我们能不能偷偷带点什么进去？能展现我们个性的东西？”常生就说：“我写点什么，做个横幅，让全世界看

看我的书法。”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成。其实，当时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不让私自带东西进入游行队伍中。北大的学生嘛，就是想与众不同，张扬一下个性而已。就我个人而言，参与这么一件在后来成为里程碑式的事件，在当时真的不像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说经过很深的思考，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很偶然。

既然决定写点东西，那么，写什么呢？“振兴中华”被别人说过了，没有创意；“教育要改革”“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等没有特色。一个个的口号被提出又被否定。隔壁宿舍的几个同学也加入进来，有人提议表达一下对邓小平同志的感情，因为当时改革开放有几年了，成效显著。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人，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也上不了大学。有人提出写“邓主席万岁！”这种带有文革遗留的口号立马被大家否定了。最后决定直接问声好，就写“尊敬的邓小平同志您好”，但是又觉得句子长了点；就写“邓小平同志您好”。大家越是议论，越是大胆，把姓氏也省略掉，干脆直呼“小平同志您好”。于是，常生拿来一张纸，用宿舍里擦桌子的抹布，卷成小棒棒，蘸着墨汁写下了“小平同志您好”六个大字。

字写好了，怎样做成横幅呢？想来想去，只好用床单，把六个大字往床单上一比划，床单不够长。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把‘同志’两个字也省去吧。”

这句话一出来，本来很热闹的宿舍里，一下子静了下来。直接称呼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是不是有些不敬？要知道，在我们国家，对长辈、对领导是不习惯直接称名道姓的。再一想，这是对领袖的问候，没有别的意思，不至于上纲上线吧！于是，我们就把“小平您好”四个大字用订书机订在了床单上。

1999年国庆阅兵式，中国人第一次从电视直播中看到了阅兵现场，阅兵式的视觉冲击力，第一时间震撼到广大普通人。在那一刻，观众与广场上的人们是心心相通的。

自1984年国庆阅兵后到1998年，由于各种原因，其间没有再举行国庆阅兵。这15年里，国家和军队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军队裁员100万，大军区由11个调整合并为7个，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

陆军的军整编为集团军，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199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是世纪之交的年份，全球都在展望一个新的世纪，世界将向何处发展；这是共和国建国50周年，是一个各方面都值得好好总结的年份；香港已经回归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进驻香港，澳门也即将回归，中国人对国家统一有了真切的感受和热情；由于李登辉抛出了“两国论”，台湾海峡陷入一场不大不小的危机，解放军进行了军事演习，中美关系出现了紧张；在国际关系上，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大使馆，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

1999年10月，国庆五十周年阅兵仪式，中国坦克部队方阵。
图/Li Gang/中国特稿社/FOTOE

1999：世纪大阅兵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大庆，阅兵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地面方队通过北京天安门。图/李浩军/FOTOE

因此，1999年，必须有一次阅兵。在共和国成立50周年时，举行盛大的国庆阅兵，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全民的共识，有关部门在1998年底即开始筹划。

中国把立足打赢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调整军队建设布局，把科技强军、加强质量建设作为军队发展的根本大计，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尤其是在武器装备建设上成果显著。1999年10月1日，共和国迎来了50华诞。时值世纪之交，这一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阅兵式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世纪大阅兵”。

在这一年，改革开放新时期诞生的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预备役等部队第一次汇入了受阅大军中。在武器装备方面，此次受阅的42种装备，90%以上都是新装备，绝大部分都是自行设计和生产的，高科技武器装备已开始成为解放军的主战武器。

这次阅兵方队横排面为25人，创造了世界之最。25个车辆方队由陆海空军和二炮四大军种400多台车辆组成，方队数量和车辆数量都创造了历次阅兵之最，空中加油机首次受阅。基本数据：共有52个方（梯）队，其中42个地面方队（17个徒步方队，25个车辆方队），10个空中梯队，共有11000人受阅。其中，地面重装备441台（辆），飞机132架。步兵方队已下降到两个，装甲兵、炮兵等兵种占70%。

15年前在电视尚未普及的1984年，许多人只能从后来的电影中重温国庆35周年阅兵的威武，1999年的国庆阅兵就大不一样了，无数中国人从电视直播中看到阅兵的现场，阅兵的视觉冲击力，第一时间震撼到广大普通人。在那一刻，观众与广场上的人们是心心相通的。



2009：高科技之兵

空军成为最大亮点，151架飞机组成12个空中梯队，创下新中国阅兵史之最。让人“捏把汗”的是，作战飞机全部是挂弹参阅。这是继开国大典之后，空中梯队第二次挂弹“上阵”。

又过去10年，来到2009年的国庆节。这1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10年，国家的军事力量也在飞速进步。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中国在金牌榜上全面压过美国代表队，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达到一个新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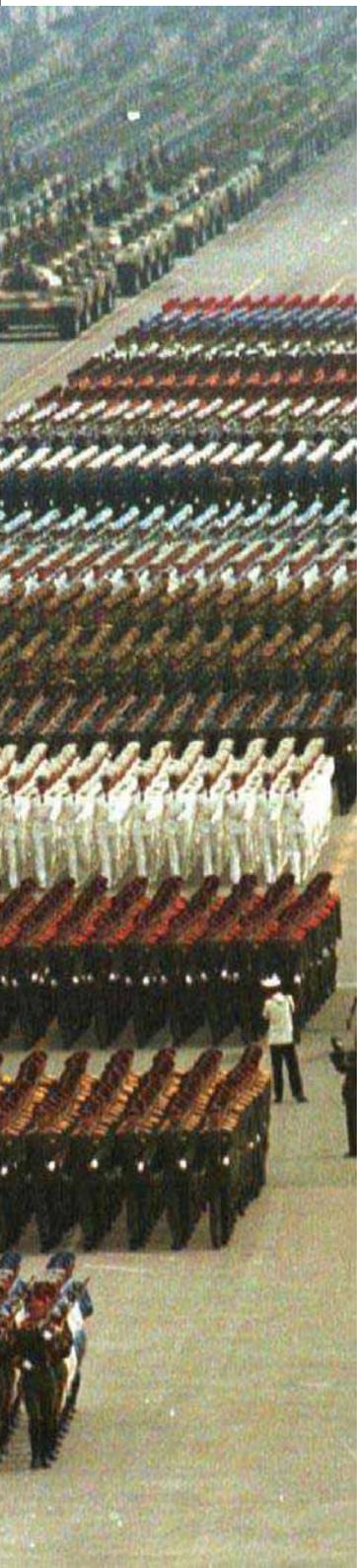
2009年的国庆，开始真正履行“10年一大庆”的方案，中国进入持续、稳定的发展时期，阅兵式也可以以10年为一个阶段，对军事和经济的发展进行一次整体的检阅。中国的军队，已经数十年没有经历战争，这种长期和平的态势，给军队系统性发展提供了机会，但仍然需要通过阅兵这样大型的仪式，来检阅战斗力。

中国军队的发展，已经进入信息化的新阶段，

这次阅兵，一架空警2000和两架空警200成为亮点，中国的预警机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而预警机则是空军的大脑，载有信息化指挥系统。因此，这次阅兵的最大亮点可以说是空军，151架飞机组成十二个空中梯队，创下新中国阅兵史之最。让人“捏把汗”的是，作战飞机全部是挂弹参阅。这是继开国大典之后，空中梯队第二次挂弹“上阵”。与六十年前相比，这次显然要“危险”得多——飞机挂载的是首次亮相的中国自主研发的多型空地、空空导弹。尽管有完备的挂弹系统，为防意外，军方还是采取了多种保险措施。

2009年的国庆阅兵，很多程度上展示的是军队建设的科技含量。和早期的步兵方队所带来的直接的气势相比，高科技的阅兵，更多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它是综合国力的体现，而最核心的技术，则不是一眼能看穿的。这样的阅兵式，逐渐有了科普的新功能。它更像是一年前的奥运会——和平时期的阅兵，是全面的科技竞赛。①

（本文主要参考新华社通稿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历史资料）



① 2009年10月1日，头戴防暴盔、身着特战服的武警装甲车第八方队。图/FOTO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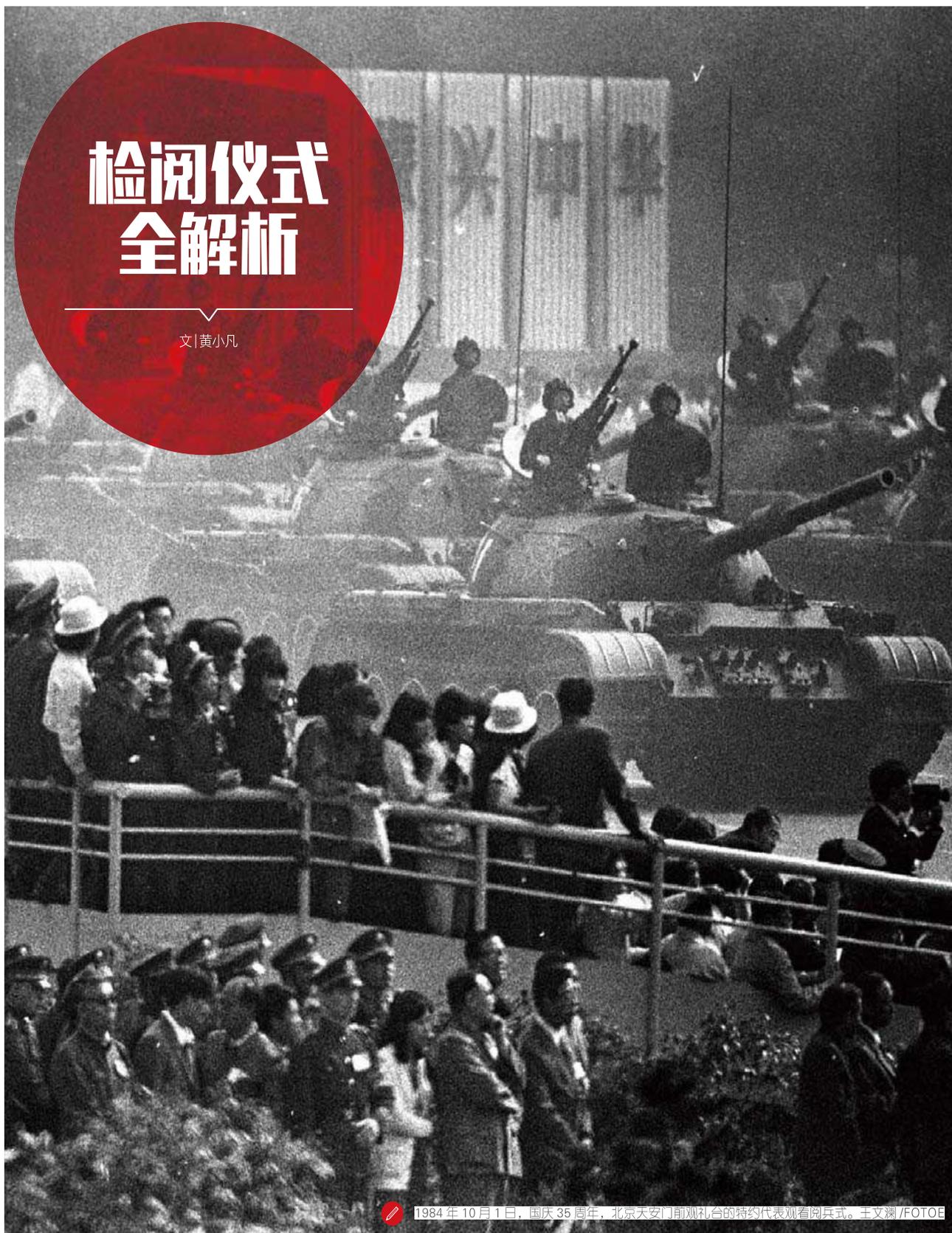


① 200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的第二十四方队：无人机方队。北京。图/FOTOE



检阅仪式 全解析

文 | 黄小凡



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北京天安门前观礼台的特约代表观阅兵式。王文澜/FOTOE

从 1949年开国大典的阅兵开始，中国的阅兵就分为两个步骤：检阅和分列式。检阅在前，分列式在后。整个过程，都体现出一种庄严的仪式感，这是中国独特的军事文化，也是一种政治仪式。60多年来，从阅兵首长、口号、检阅车、阅兵服这些细节处，都可以看出中国军队的进步里程。

首长 | 军事领导体系的现代化

阅兵首长，是阅兵式的最高军事领导。最初的几届阅兵，阅兵首长是朱德总司令。1953年的国庆阅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5次国庆阅兵。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观礼阅兵式，朱德总司令乘检阅车检阅部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朱总司令第5次任国庆阅兵首长，也是最后一次。

1954年到1958年，阅兵首长是由国防部长彭德怀担任。1956年6月9日，第76次军委会议讨论国庆节检阅部队的准备工作，彭德怀发言说：“每年的阅兵命令内容相同，今年可否不发命令，由各位元帅轮流检阅，以过渡到由总参检阅部队。”当时，关于国庆由谁阅兵的问题，军委会议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从当年起由10位元帅轮流担任，一是仍由国防部长担任，究竟采取何种方式，请中央确定。另外，国庆节阅兵所发布的命令内容大体相同，今年阅兵时拟不发布命令，是否可以，也请中央决定。时间整整过去了一个月，7月13日，毛泽东作出批示：“仍由国防部长阅兵，并照旧发布命令，不要改变。”

1959年第十一次国庆阅兵，阅兵首长是林彪。此次阅兵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城楼观礼阅兵式。1959年是中国政坛风云激荡的一年。阅兵式由彭德怀元帅负责筹划准备，却由林彪元帅检阅部队，这也是林彪唯一一次任阅兵首长。因为在那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

从喊“万岁”到互相问好和问候，这种口号的变化，反映的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同志们辛苦了”这样的慰问，体现出军委领导对人民子弟兵的关怀。

召开，彭德怀等受到错误的批判。8月，中共中央在八届八中全会上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彭德怀已经不再是军委领导人，显然他不能再作为国庆典礼的阅兵首长。

1984年、1999年、2009年，阅兵首长分别是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阅兵时，他们的身份都是军委主席。这反映出从1984年开始，中国军队的领导体制在逐渐走向成熟。

口号 | 从“万岁”到问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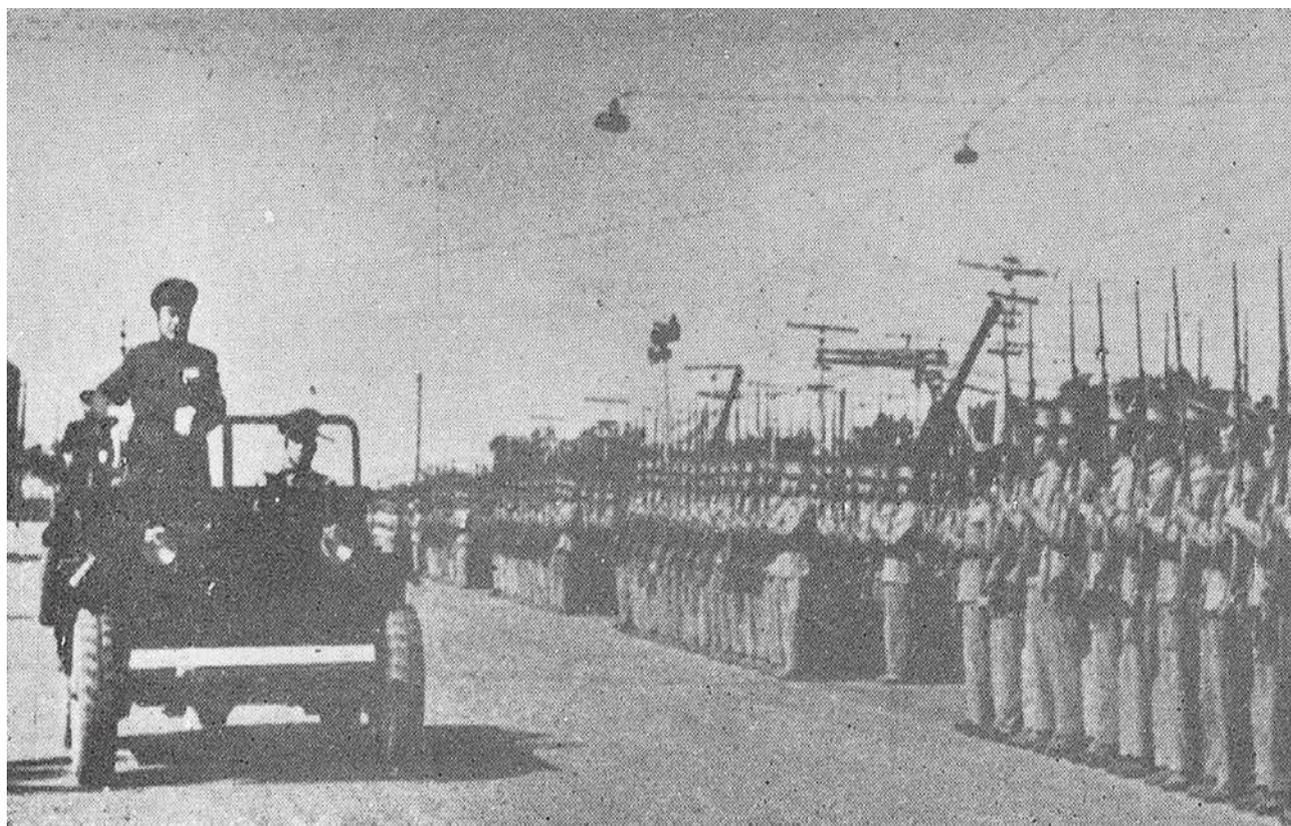
1950年，朱德总司令乘敞篷吉普车在另外一辆敞篷吉普车上的聂荣臻陪同下，检阅三军，向受阅部队行举手礼表示问候，受阅部队向阅兵首长行注目礼。检阅中，当阅兵车行进到每一个方队前时，朱德总司令都向官兵们致以节日的祝贺，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时全体官兵响亮地回答：“万岁！万岁！万岁！”这排山倒海般的声音里充满着将士们对祖国、党和领袖的热爱。

这种典礼仪式的口号及应答形式，后来成为共和国国庆阅兵式上的一种规定程序被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国庆10周年阅兵，直到1984年国庆阅兵时才有了新的改变。新华社1984年阅兵的报道是这样说的：

邓小平的个头不高，但很有风度，他的那种自信传递给指战员们以极大的力量和鼓舞。

“同志们好！——首长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

邓小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受阅官兵的响亮回答，汇成一股股排山倒海般的巨大声浪，响彻十里长街，显示着中华民族无比坚定的信心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一呼一应的两组口号是25年前阅兵时难以想象的，那时阅兵首长呼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邓小平对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总是充满了关怀与爱护。



建国后几任阅兵首长

1951

朱德

1951年国庆节，北京天安门广场，朱德总司令检阅炮兵部队。图/文仕工作室/FOTOE

1956

彭德怀

1956年，北京国庆大阅兵，阅兵首长为彭德怀元帅。图/FOTOE

1959

林彪

1959年国庆大阅兵，国防部长林彪检阅步兵。图/孟昭瑞/CFP



1984

邓小平

1984年10月1日，建国35周年大庆，军委主席邓小平接受阅兵总指挥秦基伟司令员的报告。图/袁苓/FOTOE

1999

江泽民

1999年国庆大阅兵，江泽民检阅三军。图/新华网/王建民摄

2009

胡锦涛

2009年国庆大阅兵，胡锦涛检阅三军。图/新华网/王建民摄



在检阅过程中，邓小平频频挥手向将士们致意，将士们向统帅行注目礼。

从喊“万岁”到互相问好和问候，这种口号的变化，反映的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同志们辛苦了”这样的慰问，体现出军委领导对战士的关心。阅兵式要经过长期的操练，辛苦，而他们的日常工作，也辛苦。

检阅车 | 曾经的尴尬

从建国10年后的大阅兵仍无“本土车”可用的窘境，到建国60年阅兵，红旗HQE比肩顶级豪车的辉煌，阅兵车的进步，见证了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历程。

1949年刚建国时，我国还没有能力生产汽车，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所乘坐的也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美式吉普检阅三军。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这次阅兵活动是中国人民解放后第一次军事盛典。朱德总司令身着戎装，在聂荣臻陪同下，乘阅兵车检阅了部队。朱德总司令乘坐的是由斯大林赠送的吉斯-110。

关于吉斯-110，这款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5年6月底。

当时，斯大林汽车厂生产出第一批著名的吉斯-110型豪华轿车。该车装有8缸60L发动机，功率147KW，车速每小时135公里。斯大林立刻下令将该车作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专用座车。1949年，斯大林汽车厂终于研制成功吉斯-110防弹车，斯大林曾将吉斯-110作为礼物送给毛泽东主席。该车没有倒车镜，主要是苏联的意识形态要求“社会主义不能开倒车”，同时车辆乘坐级别非常高，使用时一般都有警卫车队护驾而无需倒车。

1954年10月1日，建国5周年庆典大阅兵仍然使用了前苏联制造的轿车，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实属无奈之举。1954年国庆阅兵式上，阅兵

指挥官、中国人民解放军京津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杨成武向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报告时，乘坐的是苏联制造的吉斯-115型敞篷轿车。吉斯-115是吉斯-110的防弹型，长6m、宽近2m的车身被安装了8mm厚的装甲、70mm厚的防弹玻璃，能有效阻挡子弹及弹片。车身底盘上安装有厚重的钢板装甲，能够经受住地雷爆炸的冲击，借助一套液压系统才能升降。车厢内还有一道可升降的中隔玻璃，能与前面驾驶舱隔开，既防弹又保密，整个轿车自重达到7.5吨。这辆吉斯-115是1953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的，目前俄罗斯也仅剩一辆当年产的吉斯-115。

1959年10月1日，建国10周年大阅兵最引人注目，国产红旗轿车高调亮相，扬我国威！1960年，红旗轿车被编入《世界汽车年鉴》。

1984年10月1日，在中断了整整25年后，天安门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2次国庆阅兵，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阅兵。1984年国庆35周年前，一汽接到中央紧急指示，造出两辆红旗特种检阅车供国庆阅兵时用。在很短时间内，一汽就将两辆检阅车造好了。这种车是把红旗770型防弹车加以改进，装上了活动式顶棚和升降装置。邓小平就是乘这种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三军将士。而另一辆检阅车则由阅兵总指挥秦基伟乘坐。

1998年3月，一汽集团又接到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准备红旗阅兵检阅车的电话指示。同年6月10日，高层有关领导批示：此次国庆阅兵，采用第二代全新红旗开天窗式检阅车。1999年10月1日，在国庆50周年盛大阅兵式上，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乘坐一汽生产的红旗CA772TJ特种检阅车检阅了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将士。

建国60周年大阅兵，胡锦涛主席乘坐一汽全新打造的HQE检阅三军，这部手工打造的“元首级”座驾，长度超过6米，延续了三排座椅的传统。所用动力是由一汽自主研发的V12汽油发动机，这也是我国第一款自主开发的顶级乘用车发动机。



1954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式的步兵方队高呼口号通过检阅台。
图/FOTOE



武器装备 | 万国造·全苏式·全自主

1949年

开国大典阅兵式，当时国内解放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大多是从战场上缴获来的，所以战士手中的枪械五花八门，严重影响受阅时的持枪动作。为了整齐划一，阅兵指挥部规定，受阅部队统一使用“三八大盖”（日本制造，明治三十八年定型生产，由于枪身上有一防尘盖板，故称“三八大盖”）。飞机则大多是缴获和投降过来的美式飞机。

195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国庆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检阅了部队。受阅部队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提高，由开国大典时的“万国造”变为“苏式”武器装备的基本统一。

1959年

这一年的国庆阅兵，受阅部队的装备中出现了最新式的自动步枪、大炮、坦克、高速喷气歼击机，都由我国自行制造。中国制造的第一代主战坦克“五九”式中型坦克也首次亮相，此次受阅部队的最新式武器装备全都由我国自行制造。

1984年之后

受阅部队所有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而且更新换代极快，1984年的武器，到1999年几乎就不见踪影，而到了2009年，则又有更尖端的武器亮相。这背后，是中国工业的长足进步，在当今世界上，或许只有中美俄三国，拥有自己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



200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方队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阅兵式，北京。图/FOTOE

服装 | 1984年阅兵为何穿“八五式”军服

开国大典阅兵，官兵着独特的“解放”式样军装。这种军装，简单朴实，特殊标记是“八一”五角星帽徽，“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牌，头戴钢盔或“解放”式单布帽。

1950年国庆阅兵，军装的显著改变是军官的帽子是圆顶大檐帽，仍是“八一”五角星帽徽，“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牌，士兵的帽子仍然是解放帽，军官大檐帽的改变显现着人民解放军当时强调正规化建设和学习苏联军队的历史痕迹，这种军装一直延续到1955年9月。经典的阅兵照片是彭德怀在1954年国庆阅兵式上讲话，从中可看到人民解放军军装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渐变。

1955年国庆阅兵，官兵着首次授衔后的“五五”式新军装，显著的特点是士兵头戴船形帽。在此后的4次阅兵，直至1959年都是这种样式的军装，只是成方阵的士兵船形帽在1959年国庆阅兵式上改为解放帽。“五五”军服样式的更新，正逢国庆阅兵一展风姿、军威的好时机。

1984年国庆阅兵，奇特的是官兵所着装是“八五”式军服的提前亮相，第二年全军才换发这种样式的军装，这在阅兵服装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军装既有传统样式的领章，又有新军装样式的肩章，但无军衔，是向“八八”式军服过渡的军装。由此着装的“提前”看，“八五”式服装样式的更新与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相结合，把这两个都能充分展现军队新面貌的亮点巧妙地聚集在了一起，可说是匠心独到，时机正抓在点子上。

1999年国庆阅兵，官兵所着是新授衔后的“八八”式军装，并有不同方队各种方块的迷彩服点缀其间，军队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2009年国庆阅兵，官兵所着装是“零七”式授衔新军装，给人以全新的惊艳阵容面貌。

统观历次国庆阅兵服装变迁，有所遗憾的是，在人民解放军服装史上曾有20年（1965年6月至1985年4月）历史的全红领章、全红帽徽“六五”式草绿色军装，从来没有在国庆阅兵式上展示过。①

65年 阅兵村变迁

文 | 王月

在 1949年的开国大典阅兵之前，受阅士兵尚不知如何徒步通过检阅台，他们更不会想到，这之后的阅兵式是如何万众瞩目，甚至还要修建一个专门的阅兵村供士兵们练习如何“走路”。到今天的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这个颇有中国特色的“阅兵村”，也同很多其他东西一样，从简陋到完善，从“简单粗暴”到更加人性化，也变得更科学、更务实。

❖ 50年代，天坛公园是临时阅兵村

分列式——可能很多人以为是某种数学公式，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常常在电视上见到的受阅部队列队从检阅台前通过，接受阅兵者检阅的仪式。

中国共产党建军以来，并不熟悉分列式。因其最早建军的基础是少数黄埔生加上广大农民群众，而非正规化军队。所以，直到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受阅士兵多数不知如何操练分列式——打头阵的海军方队，是“重庆号”起义海军官兵，他们所受的训练是英式操典，不但手臂姿势与陆军

部队不一致，每分钟114步的步速也与陆军不统一。最后，大伙以齐步走通过全场——齐步走，并不“齐”，看起来也不够威武雄壮，所以到了1950年阅兵，就改为走正步。

所谓正步，最初是普鲁士军队19世纪初期在阅兵中使用的，上身保持立正姿势，两臂摆动较高，看上去整齐划一，又显得雄健有力，能展现军威。唯一的缺点是，正步步伐训练起来，难度大，费时费力。

这样，就需要把参加阅兵的部队集中起来，进行长时间统一训练——阅兵村也就应运而生。上世纪50年代，每年国庆都要阅兵，当年的北京城还远远没有今天这样庞大而拥挤。当时的国庆阅兵的受阅部队，竟是驻扎在天坛公园进行阅兵集训的。

但把天坛公园称为“阅兵村”，如今看来也是名不符实。公园是开放的，每到国庆阅兵前几个月，经常有逛公园的老大爷、老大妈走进部队的帐篷参观内务，但驻扎在这里训练的部队官兵则对外什么都不能说——阅兵任务也是保密的。据说有一次，一名战士在帐篷门口意外地看见了自己的母亲。她到北京出差，也顺便来逛逛天坛。那名战士当时不敢出去招呼母亲，只敢从帐篷的门缝里偷看。事后他还向组织报告了“为保密，主动避免与妈妈意外相见”的经过。

1957年，正在第一海军学院（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习的蒋方印被选中组建阅兵海军军官方阵。当年7月，按照上级统一部署，阅兵训练队伍开赴北京，进驻天坛公园。蒋方印回忆，当时的天坛公园内没有固定的营房，受阅部队都是搭建帐篷宿营。正是盛夏时节，帐篷内蚊子叮、虫子咬，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环境十分艰苦。

在训练中，整个方阵先是以5个人为小组，主要练习个人动作，然后以20个人左右为一个班的单位，练习动作一致性，最后才是整个方阵200多人的大合练。

当时的训练，就开始特别要求“五个一”：



上边看大盖帽一个水平面，踢脚高度一条线，脚步落地一个声，肩部一条线，手臂在胸前一条线。当时，蒋方印手部有一个习惯动作不达标，每次训练结束后，他都“加班”训练。

阅兵，也主要是练习走正步。1959年，一名有幸入围炮兵院校方阵的四川籍士兵回忆道，走正步，看起来容易，其实里面暗藏玄机。比如，甩手的时候，力量要集中在大拇指沿手背一线。

训练相当辛苦，每天最少要训练8个小时，而且很多学员经常都还要自觉加练一两个小时。达标困难的，还会在腿上绑上沙袋练，以增加肌肉力量。那一年，“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因被山崖上的树枝挂住才幸免于难的宋学义也参加了训练，他属于校方方阵。因为背上有老伤，他练习时还专门在腰上绑了夹板。虽说很辛苦，但每个人都明白：这多光荣啊！

在天坛公园，场地并不大。训练场就如同天安门前一样，划出了一条600米长的场地，大伙都在这块场地上训练。那时的训练还没那么严格。训练的时候，炮兵方阵的战士比较爱看旁边国旗方阵的队员训练。因为这个方阵全是清一色的女生，而且都漂亮。

但坦克方队就没这么“幸福”了。坦克，也是要走“正步”的，所以也要每天刻苦训练。而钻进坦克中，基本啥也看不到，又热得很——按规定，坦克兵要穿上长袖军装，而夏天的坦克被太阳晒得如同蒸笼一般。

1959年，邢书府驾驶着第一代国产坦克参加了国庆阅兵。他回忆道：“我们训练时，要求非常严格。坦克前后左右偏差不得超过10厘米，要求行进200米内误差时间不超过0.3秒，也就是行驶200米内误差不得超过两块履带板的宽度。这难度可想而知。”

邢书府坦言，每天训练下来，大家都大汗淋漓，衣服全都湿透了，汗水里还掺杂着钢铁和柴油的味道。只要训练结束，大家首先就是跑去冲凉水澡，





凉快凉快。出痲子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为了防止大家身体出现问题，每天都让大家喝盐水。

1959年的10月1日，就这样到来。6点钟，坦克方队就到了天安门东侧一条叫南池子的大街上。他们要从这里起步，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要观看国庆阅兵，所以邢书府对当天唯一的记忆就是“很紧张”。然而在这次阅兵时，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准备撤回在华专家，不再提供核技术帮助，此后，中国和“老大哥”的关系开始恶化。

❖ 第一个真正的阅兵村

1959年之后，由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中央决定不再每年举行国庆阅兵。在其后24年中的国庆节，天安门前一直悄无声息。直到1984年，国庆阅兵重启，沙河机场被开辟为“阅兵村”，这正是第一个名符其实的阅兵村。

当年5月，各阅兵方队开始入驻阅兵村。他

们对这里真是久闻大名了，但是崭新的阅兵村一在面前出现，还是让人激动不已。当时宣化炮兵学院参谋系的王晓辉，正是阅兵方队中的一员。他在日记中写道：“1984年5月22日，星期二，多云。久已闻名的阅兵村终于出现，新铺的方块水泥路，排排整齐一致的帐篷和新架设的水泥线杆上的崭新路灯给人一种大方美观的感觉。机场北侧几公里长的阅兵村像一座小城，形成一种阅兵要高标准、一切都整齐划一的浓厚氛围。”

然而，方队正步训练恰逢酷暑盛夏，广阔的机场上连一棵小树都看不见，一丝风也没有。头上是烈日毒晒，脚下的水泥地烫得汗一落地马上就被蒸发掉了。热气直往上冒，如同置身在一个大火炉里。

王晓辉当年正好26岁，在阅兵方队里算是年龄比较大的。这段在阅兵村的日子，真是让这群平均年龄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记忆深刻。正值酷暑，但他们还是要穿着长袖衣服、短裤和半腰皮靴，每天一练就是十三四个小时，要连续不停地做动

01

02

01

2009年10月7日，北京通州阅兵村，圆满完成阅兵任务的受阅装备部队大规模撤离。图/CFP

02

这木架让背影显得严肃而沉重，可兄弟们说，就这简单的家伙，对于挺拔身姿特别有用处。图/FOTOE



作。一天下来，身上都结满了汗碱，鞋里都能倒出水来，很多人都曾累得尿血。

女同志也并不轻松。邵雅梅是女兵方队的一员，那年她才19岁。让她记忆深刻的，就是“拔军姿”训练——在阅兵村，一般先练拔军姿，练好了再练走正步。大夏天，这些女兵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太阳曝晒、疲劳口渴不说，各种蚊虫叮咬在脸上、身上，又痒又痛，站到最后一时，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很多女兵的面部被强烈的紫外线烧伤了，脸上先是起疹子，接着是破溃流水，最后是结痂。

即便如此，大家仍在坚持，再坚持。只能坚持，因为只要“站军姿”时晕倒过一次，第二次再晕倒时就要立即被淘汰，去当预备队员。邵雅梅感慨地说，为了通过天安门这196米，33分钟，我们军姿站了上千个小时，齐步正步一丝不苟地走了数千公里。

但是，到了晚上，阅兵村里还要更难受一些。邵雅梅说，她们睡的帐篷里，最高温度达到56摄氏度，根本睡不着。队里怕她们休息不好影响第二天的训练，弄来好多冰块帮助降温。但很快就发现这其实是个馊主意——第一天，第二天，冰块都被一抢而空。到了第三天，冰块没人要了。因为温度太高，冰块化了后，帐篷里湿气太重，更加闷热，完全就是个桑拿房！

没有人抱怨。那时候的大伙，只关心训练的好坏，心里都紧绷着，生怕细节上出现一点点失误。阅兵村成天都放着乐曲，士兵们连上厕所都踩着鼓点。思念亲人只能写信，一封信往往要经过一周才能抵达收信地。

关于那一年阅兵村里的故事，陈凯歌执导的《大阅兵》让人印象深刻，就是用普通士兵的视角还原了那场盛典。阅兵村中一件件感动的事，让阅兵式不仅仅是简单的队列训练，而成为了参与者的精神寄托——排起整齐的方队，踢着正步，从路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动作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甚至就连身高、体形、容貌也出奇的一致。

没有人抱怨。那时候的大伙，只关心训练的好坏，心里都紧绷着，生怕细节上出现一点点失误。阅兵村成天都放着乐曲，士兵们连上厕所都踩着鼓点。

❖ 1999 现代阅兵村

1999年，建国50周年的世纪大阅兵，徒步方阵依旧在沙河机场阅兵村训练。这一次，阅兵村的帐篷加冰块，变成了板房加电扇。

8月的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报时：北京，晴，最高温度37℃。在沙河徒步方队阅兵村，上午11时左右，水泥制作的机场跑道上方，温度高达50℃。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阅兵方队中间，中间那一片白色，便是海军水兵方队——白色的水兵帽，白色的水兵服，白色的手套，还有白色的水兵高腰鞋。在这群年轻水兵中，年逾花甲的孙启华显得特别显眼。他多次参加阅兵，如今50周年阅兵，他再度出山，担任海军水兵方队总教练。

在孙启华眼中，正步训练是重中之重。想练正步，必须进行分解动作训练——手臂向前摆时，摆到什么方向为最佳，如何才能摆得自然而优美？都十分关键。这些在条令中虽有规定，但在分解动作训练过程中，却没做太多太细的要求。以往，这些细节都是各个部队的执行教官凭借自己的队列经验各自掌握和实施。但孙启华觉得不太对劲了，这不科学！

正步是人的行为，既然是人，就与人体有关。于是他找来了心理学、运动学、医学方面的书籍，从熟悉人的肌肉组成部分开始，到如何运动才能达到心理上的兴奋点，到如何使运动进入最佳状态，逐条分析逐条理解，不断应用于实践中。

比如，孙启华发现，在正步训练中，学员学习的过程是通过眼睛观看，反馈到大脑中枢，再指挥手脚运动。这是一个先由模仿再到支配的有意识过程。在有意识过程内，正步的目的不能高质量地完成。因此，必须通过训练，使有意识过程过度到无意识过程，最终脱离意识阶段。

为尽早达到这一阶段，在训练中，孙启华将操场上的动作，贯穿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使学员养成习惯，就真正达到了“站如松、坐如钟、走如风”的效果。所以，在阅兵村的训练教学中，孙启华就这样贯彻着他的科学训练法。结果是，

2009年10月7日，北京通州阅兵村，圆满完成阅兵任务的受阅装备部队大规模撤离。撤离时战车驶过阅兵演习观礼台。图/CFP



较之以前，因动作过猛而造成肌肉损伤的学员比往年同期相比降低了56%，这便保证了方队训练的顺利进行。

到了2009年60周年阅兵，来自南京军区某炮兵旅的李永春，则开始想办法“训练”机器——他是阅兵装备方队的教练员兼“替补”，因为每个方队都有引导车、基准车等等，不管哪辆车哪个位置的驾驶员都有可能出现问题，所以就需要一个像李永春这样有技术有经验的全能替补。

对于装备方队的训练，最难的是排面标齐。因为发动机转速总有5到6转的误差，所以转速快慢对行驶标齐速度有很大的影响，加上转速表也会有一定迟滞时间，稍不注意就会突破0.3秒的误差，就会影响整个方队整齐划一。

机器不是人，没法靠加强训练来找补，那李永春的办法就是去请教发动机厂家的师傅，他都记不清楚找过多少遍专家了。综合了专家的意见，他又去找来录音笔，将发动机起步、行进、等速等各阶段的声音录制下来，一有空就拿出来听、仔细地辨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和队友总结出发动机转速规律表，并练就了不看仪表就能“一听准、一踩准、一瞄准”的绝活。

2009年的阅兵村，条件继续改善。这里已经有了新型彩钢板房，中间夹的聚苯EPS夹芯板是新型高效复合建材，密封性能好，美观、隔热、环保、节能、耐用，完全能与我们日常居住的砖结构房媲美，还能抗8级大风。每间宿舍都安装了空调，保证盛夏时节受阅士兵能得到充分休息。

而且，板房区的四周花团锦簇，就像是城市里的花园小区一样，种有美人蕉、一串红、鸡冠花等许多种花卉，煞是好看。战士们也要自己动手种花种草。

阅兵村内从未如此丰富多彩。商业服务区有工商银行网点、可自动取款的ATM机，还有中国联通的话吧、中国邮政的阅兵村邮政支局，还有冷饮屋，以及可提供16小时服务的平价超市。

还有网络。士兵们可以在宿舍上网，连通整个阅兵村的是“砺剑网”。士兵可以在这个局域网内发帖子、看新闻、玩游戏、网上冲浪。

“砺剑网”甚至都有了自己的“网络明星”，比如训练标兵柳聪的“形象”上网之后，迅速“走红”阅兵村，成为许多学员的榜样。教导员潘剑则在网上开了个光影博客。每天，他指挥训练必带照相机和摄像机，时刻记录下学员们训练的场



景，下了训练场又会抓拍大家的生活情景；到了晚上，就把照片和音像资料贴到博客上，加上自己的评论，供战友们参考。像他这样的“博主”，二炮学员方队里还有近50个。

阅兵村里还建了个“休闲吧”。晚上，官兵们冲完澡，经常会来到这里，围坐在一起，下棋、聊天、看杂志。对于那些不能经常和女友联系的官兵，队里就组织大伙集体来写情书，然后用一个个粉红色的信封把战士们的思念寄给女友。

2009年的阅兵村，新的“八大员”取代了旧的“八大员”——解放军部队有“八大员”之说，指的是在部队中担任各种后勤工作的官兵，比如炊事员、饲养员、运输员、警卫员等等。如今的新阵容是：网络管理员——局域网真是“火”得很；图书管理员——阅兵村里建立了图书室；健康理疗员——阅兵村内还有按摩椅；心理疏导员——随时帮忙解决各种疑惑和困扰；医务监督员——对带伤训练现象“叫停”，对训练强度、时间等提出建议；文化服务员——整天忙着给大伙放电影；DV拍摄员——就像潘剑这样用DV拍摄同伴们的训练情况，然后利用休息时间，回放给参训学员看，从中寻找训练问题，随时改正。

❖ 未来，阅兵回归“常态”

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阅兵村再次换了位置。最新的阅兵村位于北京城北的昌平区阳坊镇。此处的“阅兵村”是数月前由一处废弃的靶场改建而成的。部分参加阅兵的官兵已经在该地开展紧张训练。“阅兵村”门口两侧设有士兵岗亭，大门内侧墙上写有“谋打仗 能打仗 打胜仗”九个大字。场地周围有高墙围住，周围道路正在维修，从围墙缺口可以看见一座酷似天安门城楼的建筑。

以往，装备方队的阅兵村一般是安排在通州区的张贵庄机场。徒步方队的阅兵村则在沙河机场。这次阅兵，阅兵村没有放在张贵庄机场和沙河机

场实在出乎意料。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这两个机场有自己的驻扎部队，有自己的管理和训练任务。所以，阅兵再重要，也不能影响正常的训练，不能影响正常的战备，这其实就应该是阅兵的“正常模式”。

实际上，从国庆60周年阅兵起，就有些“不正常”了。当年阅兵结束后，很多人发现，这次的徒步方队走得不整齐啊。与1999年甚至1984年的徒步方队相比，2009年的阅兵分列式走得并不整齐。

但是，我们已经过了只追求整齐这个阶段了。

从视觉效果上而言，穿着笔挺的军礼服踢正步才是最理想的。这就是为什么水兵方队看起来更整齐的秘密，他们的白色水兵常服线条分明。

以前，中国军队无论是训练、作战还是日常穿着都是一身三点红，而随着正规化的进程功能性服装在不同场合穿着已经成为习惯。60周年阅兵，大部分方队身穿数码迷彩，这种衣服没有裤线棱线，穿上之后更是松松垮垮。更糟糕的是迷彩效果导致人形模糊，所以从镜头中看无论如何都感觉不是一条直线。但身穿迷彩服的士兵，才是真正要上战场的士兵。

鞋子，也是为战斗考虑。国庆60周年阅兵，几乎所有徒步方队都穿上了战斗靴，与过去的胶鞋相比战斗靴无疑能够更好地保护足部。有人感觉这次正步踢腿的动作中士兵的脚没有绷直，其实就是因为换了靴子，就根本没法绷直。

服装不一样，武器也不一样了。国庆50周年阅兵大部分徒步方队以加挂刺刀的81式自动步枪为主。在正步走之前，需要做一个漂亮的劈枪动作——这个劈枪动作相当于一把尺子，可以再对齐一次队形。但国庆60周年阅兵中大部分方队使用的是95式自动步枪，由于95太短，根本没法做这个劈枪的动作。然而，这个时代的步兵已经不可能需要这样肉搏了，更短小的武器才利于更好地发挥战斗力。

不是为了阅兵而阅兵，这才是常态。①

阅兵场玫瑰

文 | 潘前芝

阅兵历来是男子的天下，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女兵参加过受阅。新中国女兵参加阅兵的时间虽不长，但她们的甫一亮相就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在充满阳刚的阅兵场上，她们既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又展示着中国女兵的自信与从容，彰显着中国军队的进步与开放。

◆ 1984，玫瑰初绽

1984年10月1日，在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一支女兵方队首次惊艳亮相，引起不小轰动。

当时的媒体这样报道：“年轻的女兵头戴大檐帽、身着棕绿、藏青小翻领裙服，佩戴红十字袖章，脚穿黑色光面皮靴，英姿飒爽，生气勃勃，

1999年10月，国庆五十周年阅兵仪式，行进的女兵方阵。图/Zha Chunming/中国特稿社/FOTOE





195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节阅兵式上的女民兵队伍。图/FOTOE

赢得了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上一阵阵掌声”。组成这支方队的，是当时的北京军区军医学校（即白求恩军医学校）的学员。

1983年底，该校接受了组建首都国庆35周年阅兵女卫生兵方队任务。1984年春节后，他们开始选调受阅队员。学员们得知消息后，纷纷到办公楼和教研室打听选调标准。连正在华北地区12个医院实习的学员，也推出代表，给学校打电话，要求参加。

很快，方队组建。每天的训练内容无非就是“踢步、摆臂、拔军姿”，十分枯燥乏味，而且运动量很大，许多女兵脚都肿了，但没有人因此打退堂鼓。为了锻炼全体人员耐力和意志，方队领导组织400多名队员顶着大雪，排成整齐方阵，进行军姿训练。4月初，方队女兵开始穿皮鞋进行适应性训练。当时，女兵们所穿的皮鞋，只是在制式皮鞋的基础上结合阅兵要求进行改进而成，因此在舒适性上便打了折扣。按规定战士学员是不配发皮鞋的，所以领到新皮鞋的女兵们兴高采

烈，穿上脚后，由于皮子坚硬，40%以上姑娘的脚都磨破了，走路一瘸一拐的。

为适应当时机械化部队数量大、军兵种多、技术装备复杂、物资和技术保障要求高的特点，阅兵指挥部改变了过去分散驻训的方法，实行集中驻训，分别在北京沙河、通县、南苑3个机场按正规化要求修建临时驻训区，搭建了2000多顶帐篷，修筑道路50余公里，铺设训练场90万平方米。营区整齐清洁，道路四通八达，宛如一座村落。

5月8日，女兵方队进驻阅兵村，与首都女民兵方队同住在阅兵村最东边的第九村。参加阅兵的十几支方队在一起训练，相互之间都暗暗较劲。进入6月，阅兵村帐篷里开始升温。到七八月份，外边温度30多度，帐篷里太阳一晒，有40多度，热得人根本睡不着觉。而阅兵训练场的水泥地则超过了50摄氏度。然而一开训，方队的姑娘们都整整齐齐站在那里进行拔军姿训练。排头兵石华，为矫正腿型，睡觉时总要用背包带把两条腿捆在

一起；满族姑娘付亚蕙，练正步时摆臂过多，腋下磨出血，稍稍处理后继续练。她们在锻造自身的同时，也在塑造着中国当代女军人的形象。

短短几个月，这些姑娘穿烂了3双牛皮鞋、一双胶鞋。每双皮鞋修补都在五次以上。在阅兵总指挥部和沙河分指挥部组织的历次考核和9次合练及两次天安门前预演中，女兵方队的训练成绩始终名列前茅。8月26日，总指挥部组织了阅兵前最后一次考核，完全按国庆当天天安门前的实际操作，齐步50米、正步96米、再加齐步50米的顺序，完成了196米分列式行进动作。考核中，女兵方队精神饱满，步伐有力，横、竖、斜线整齐，踢腿、摆臂、步幅、步速合乎标准。规定时间3分22秒75，而实走3分22秒整，仅误差0.75秒，创下了徒步方队最佳成绩。国庆当日受阅后，女兵方队受到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通令嘉奖。

然而，临近阅兵式前，为了女兵着装的事，曾经闹出一场不小的风波，甚至惊动了当时阅兵领导小组组长、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当时，受阅女兵穿的裙子，刚开始是的确良筒裙，而上衣则是凡尔丁布料制作。女兵们普遍认为这两种布料不配套，希望把裙子的布料也换成凡尔丁的。北京军区军需部门特意做了几件凡尔丁裙子，试穿后，与的确良筒裙感觉大不一样。当时，受阅部队的服装标准，总部已经审批过，经费也拨了。北京军区参谋长周依冰和万里较熟。于是，他找了个机会，带上两个女兵，穿上这两种裙子，跑到万里家里去找万里。万里看后，也倾向于凡尔丁，于是他说，行，我给你们说说好话。在万里的帮助下，女兵方队最终穿上了漂亮的凡尔丁裙子。

❖ 三军女兵方队惊艳亮相

在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女兵方阵仍然是佩戴“红十字”臂章的白求恩军医学院学员。方队领队张薇薇、张莉莉——一对双胞胎姐妹成为当年的焦点新闻人物。10年后，在国庆60周年的阅兵式上，首次出现了三军女兵方队。

然而，并不是所有女兵都具备这种自我心理调节的能力。如何排遣高强度训练给女兵们带来的心理压力？三军女兵方队首次将心理专家纳入方队编制，全程伴随保障。

同样是96米、128步，同样是每步75厘米的步幅，然而，受阅女兵主体与前两次受阅女兵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2009年参阅的三军女兵都是“80后”、“90后”的女学员和战士，独生子女比例高，自主意识强，思想活跃。然而，不变的是女兵们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品质。训练场上没有男女之分，体力耐力较弱的女兵只能不断加大训练量，为此甚至牺牲休息时间。为了练体力，她们每天早上绑着1公斤重的沙袋，跑3公里越野。腿受伤了，就练摆臂，臂脱臼了，就吊着胳膊练踢腿。即使回到宿舍，同伴们还会互相压脚尖，压的哇哇大叫甚至大哭。当时的三军女兵方队队长常东华说：“我曾担心‘80后’‘90后’不能吃苦，她们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当然，高强度的训练环境下，姑娘们难免会有牢骚。一位参阅女兵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是第二拨洗澡，可我们排通知晚上训练，大家顿时都如休眠的火山突然喷发。可恶的教练，一听人家排今天晚上练他立刻跟着人家说他也练。哇！这种人真的一点用也没有，白痴一个。”然而，女兵们又是很乐观的，没两天，这个女兵又感叹：“有时觉得我们这群小丫头特别伟大，真的，点点滴滴中你会看到我们的乐观、坚强，日子不论多么苦我们总会把最灿烂的微笑留下。”

然而，并不是所有女兵都具备这种自我心理调节的能力。如何排遣高强度训练给女兵们带来的心理压力？三军女兵方队首次将心理专家纳入方队编制，全程伴随保障，这应该是60年国庆阅兵突出的亮点之一。这种心理服务工作很快显出效果。女兵方队一个羌族学员在5·12大地震时，家里失去7位亲人。在“5·12”一周年祭来临之际，一向训练成绩优异的她表现反常，神思恍惚。方队心理医生梅清海教授得知她的情况后，及时进行心理治疗。同时，战友们也主动找她聊天。一周后，这位能够善舞姑娘治愈了心理创伤，带着饱满的热情融入到训练场上。为了配合心理师的工作，女兵方队拨专项经费购买了最新版心理测试软件，每月进行心理健康、压力应对检测，为队员建立详细的心理档案；建成适应女兵特点的“信任背摔”、“巧



破圈套”、“智穿电网”等心智拓展训练场；编印了《心理健康服务手册》，利用《三军女兵方队报》板报、《受阅之声》广播、橱窗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遇到难事，找梅教授！”良好的氛围，让姑娘们在艰苦的阅兵训练中始终心头洒满阳光。

这种不变与变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阅兵村依然是在沙河，但女兵们居住条件已大为改善。1984年是帐篷营地。1999年住的是木板房，一个房间14人，只有一台小电扇。2009年，女兵们住上了活动板房，每一间里面都安装了空调。依然是在烈日暴晒下训练，但带队干部还买来了知名品牌的防晒霜，女兵们每次训练前，都要抹上几层，尽管还会晒黑，但却没再被晒伤。依然是长筒皮靴，不过09年时的阅兵女靴是根据需求专门研发出的新品，既美观大方，又柔软舒适，减震耐磨。在颜色选择上也颇费心思，譬如三军女兵方队服装颜色分别是松枝绿色、白色和藏青色，整体队列中色彩较多，容易在视觉上产生面积分割、队列不统一的效果，于是靴子颜色采用了黑色。而首都女民兵由于方队服装采用了玫瑰红，胸标、腰带和贝雷帽等配饰为银灰色，于是靴子也采用了银灰色，增强了整体着装的层次感。此外，小小的阅兵村里还开设了银行、邮局、超市、熨衣房和修理间，一日三餐的营养搭配更加科学，一些高科技的辅助器材和评估系统也首次引入了训练。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地面方队，在2009年的国庆阅兵式上，在空中还有一支由女飞行员组成的战机编队。受阅女飞行员全部是“85后”。尽管这支编队年龄偏小、飞行时间较少，她们创新设计的“长僚机组距离500米跟进起飞集合”的方法，突破了低能见度对梯队起飞集合的限制，使女子飞行梯队成为当时所有受阅空中梯队起飞速度最快的一个。

2009年10月1日，地面上，三军女兵方队身着07式新军装，把大地的绿、海浪的白、天空的蓝汇成一个整体，气势如虹、神采飞扬。空中，战机轰鸣，女子飞行梯队分毫不差地飞过广场。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上，掌声如潮。

◆ 女民兵与共和国一起成长

民兵组织是我国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庆阅兵重大活动中不能缺少的。建国初期，市区和近郊民兵组织不健全，训练也谈不上经常化，所以，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1950年国庆庆典上，没有民兵参加。

民兵参加阅兵是从1951年开始。方队人员选调自全国各地，名义上叫“首都民兵师”，当时称“民兵游击队”。1952年国庆阅兵时，民兵方队由一个增加到2个，由男女民兵混合组成。女民兵方队首次亮相是在1958年。这些民兵由工人、农民、学生等组成，大部分是来自太行山、白洋淀等革命根据地的民兵战斗英雄。当时受阅民兵方队是这样编成：20（纵深）×12（排面）+2（指挥员），每方队242人。受阅民兵，不管男女，一律头扎白毛巾，上身着对襟衬衣，所持步枪呈肩托形式。随后，京津卫戍区撤销，组建了北京卫戍区。首都民兵随之归属北京卫戍区领导。从此，首都民兵师脱离受阅部队序列，归群众游行指挥部领导。自1959年开始，首都民兵师正式出现在群众游行队伍中。

在当时“全民皆兵”的形势下，全国上下掀起“大办民兵”热潮，连中南海也有了硝烟味。毛泽东的机要员小李也参加了中南海里的民兵组织，在一次休息时拍了一张扛枪的照片。后毛泽东看到了这张照片，赞赏道：“好个英雄的模样！”然后，他挥笔写下了《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1962年后，民兵师前卫方队改由北京铁路局民兵师担任。当时的铁路局武装部部长张登瑞想改一下过去“首都民兵师”五个仿宋字。铁路局党委立即草拟了请毛主席题写“首都民兵师”五个大字的报告报给中央办公厅。毛泽东得知后非常高兴，欣然提笔书写了“首都民兵师”五个大字，落笔后又重新写了一遍，在其中比较满意的字下面划了个小圆圈说：“请他们选用吧。”题字落



2009年10月05日，北京，三军女兵这些阅兵场上的铁娘子，此时只有离别的悲伤。图/CFP

实后，为体现出对毛主席女民兵师的最好诠释和体现，指挥部选用体态、仪表较好的女民兵担任“首都民兵师”标语牌的护卫队最外层。全体女护卫兵一律穿白衬衣、蓝裤子，佩带50式铁把折叠冲锋枪，呈握枪姿势，组成首都民兵师的前卫方队。

到了1984年，阅兵指挥部决定再次组建女民兵方队。前期，先挑选了500多名民兵，在工人体育场进行了两个月基础科目训练，后进驻沙河机场，与女兵方队在一起训练，实行全天候封闭式训练，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由于地处京郊，早上醒来时，经常会发现鞋子里盘着一条蛇，衣服上爬满小虫子，往往会吓得女民兵们吱哇乱叫，半天缓不过神。

1984年阅兵式上，女民兵方队的队员头戴白底蓝边航空帽、身着艳蓝色服装、手持冲锋枪，犹如一道道浪花涌过天安门广场。阅兵结束后，女民兵方队也受到了邓小平的嘉奖。

1999年阅兵式上民兵服装设计也是一波三折。当时设计了6套件服装，包括猎装、西装、西服裙、列宁衫、连衣裙等，颜色包括红色、白色、蓝色、墨绿色、天蓝色等。第一次送审，白色、天蓝色

裙服因与女兵方队的服装相似，没有被通过。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的设计师们经过两周紧张设计，设计出猎装、常服等三种款式，颜色有绿色、淡蓝色、银白色等。1998年12月19日，经阅兵总指挥部和总参动员部领导审定，确定一套白色西服套裙、红色贝雷帽、黑色高筒靴和白色腰带。后在中央军委常务会上，军委首长认为白色与海军方队服装颜色雷同，最后确定在款式不变的基础上，改白色为红色，女民兵方队服装至此正式确定。

时代在变，女民兵的成分也在不断变化。1999年以前，女民兵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而2009年女民兵都是从北京朝阳区抽组，其中有大学生村官，有“海归”和外企白领，还有时装模特和健身教练。不变的，是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的壮志豪情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参加2009年女民兵方队的舞蹈教练路晓雯的一番话，也许代表了她们这一群体的心声：“我觉得一辈子能有这样一次机会，非常非常有意义”。^①

（主要参考书目：《大阅兵2009》、《共和国阅兵纪事》、《中国国庆大阅兵（1949-1999）》、《一个女兵的阅兵日记》、《阳光女兵：中国第一女兵方队纪实》等）



热历史

Hot History

80年前 航拍下的中国

热历史版块编辑：黄弋
邮箱：klsbjhy@163.com

今 年6月11日，在德国柏林，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办了一场名为“飞越中国”的航拍图片展。大部分图片是由德国汉莎公司飞行员卡斯特尔在中国工作期间（1933年--1936年）所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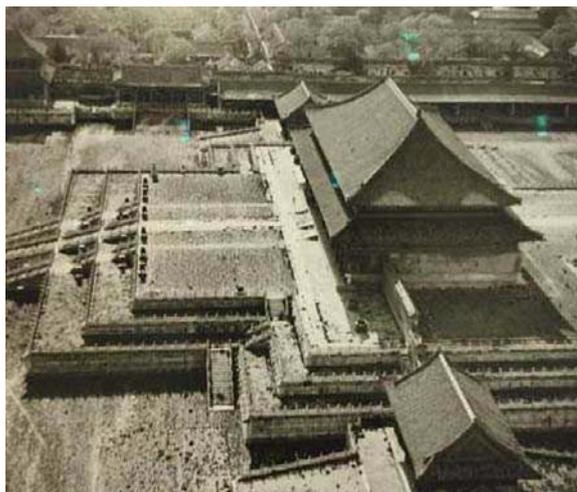
卡斯特尔于1905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很早就开始对中国的一切满怀兴趣。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国帕米尔高原和西藏高原的探险故事让他更加向往遥远的东方。1926年，21岁的卡斯特尔取得了飞行员证书；1930年，正式成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1933年，如愿被派往中国。

在中国，卡斯特尔执行首次飞行任务的航线是从上海经南京飞往洛阳，然后途经西安、兰州、哈密、乌鲁木齐，最终抵达位于中俄蒙边境的塔城。

在这段航线的飞行中，卡斯特尔用相机记录下了珍贵的影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80年前的中国从北部内蒙地区至南方广东地区，从繁华的城市到人迹罕至的雪山、沙漠、草原，从北京故宫到西夏王陵等自然景观、城市图景和历史古迹。

穿越历史，可以不通过时光机。翻看这些旧照似乎就足矣。①

上海。前景为南岛，背景为闸北和虹口。拍摄高度2500米。



第一排（从左至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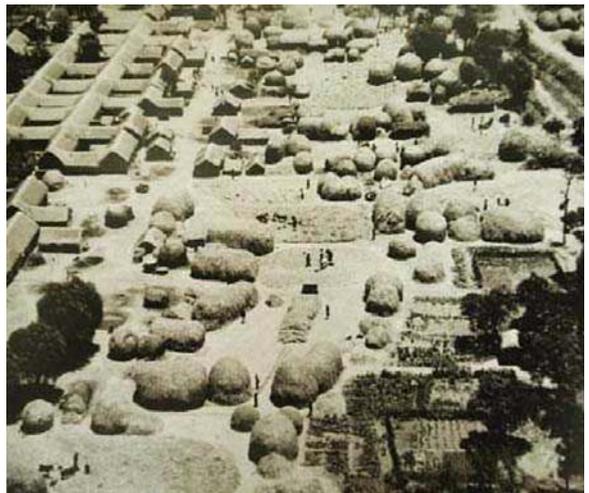
河南潼关以南干旱的黄土区、甘肃黄土山区、甘肃黄土梯田、阿拉善沙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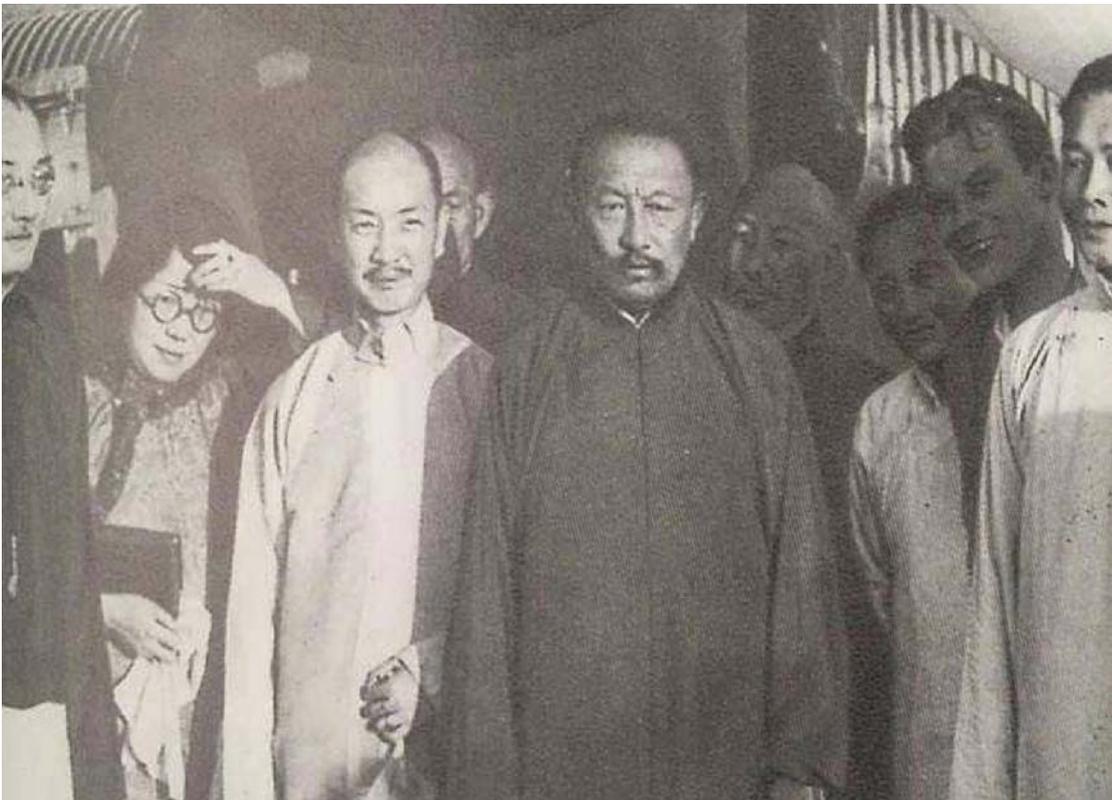
第二排（从左至右）

北京故宫太和殿、郑州的“社火”、北京颐和园、安徽农村的夏收；

第三排（从左至右）

长江 - 衢州 - 滨州公路及村镇集市、四川广元的嘉陵江、四川南部的梯田、广州市郊房屋密集的村庄。





01	
02	03

01

图为几头水牛在拉飞机。一次，在成都的惊险降落中，卡斯特尔驾驶的飞机的起落架陷进了泥地里。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设备辅助的情况下，将重达8吨的机身从烂泥中拖出来十分困难。卡斯特尔将主意打到了当地耕地的水牛身上。他大约需要10头水牛。为此，卡斯特尔和他的机械师最终说服了水牛的主人们。

02

宋子文、汪精卫和班禅大师都曾乘坐过卡斯特尔驾驶的飞机。图为1934年夏，班禅大师（穿黑色长袍者）从南京飞往北京，图中还有汪精卫和戴季陶。

03

卡斯特尔。



“纸片轰炸”日本

文 | 徐秉君

● 1938年，在侵华日军气焰正嚣张之时，有一小部分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一度陷入低迷。“投降？屈服？”中国人绝不！5月19日晚，夜空几乎连月光都看不到，两架由中国人驾驶的轰炸机悄然起飞，突破各种防线，飞向目的地日本。20日凌晨，飞机抵达长崎上空，首次“空袭”日本本土，不过这次空袭投下竟不是炸弹，而是比炸弹威力还大的“纸片”。

● 此次行动首次打破了当时日本从未有外国飞机进入其本土空间的“神话”，使得日本全国上下惊恐万状，更超乎日军大本营的意料。不流血的“人道远征”也在国际间引起巨大反响。而率队远征日本的中国飞行员徐焕升也因此成为“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被美国《生活周刊》评为二战期间最为出色的12名飞行员之一。



另一种绝地反击

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推行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11月，上海失守。12月，南京陷落，抗战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日空军力量对比相当悬殊，日本拥有作战飞机2200架，而中国仅有作战飞机296架，有的还不能真正作战。日本有完备的航空工业体系，不仅能研制和生产比较先进的作战飞机，而且能及时补充战损飞机。可是，中国航空工业仅为初创，没有飞机设计制造能力，仅有的航空工厂只能修理飞机，所有的飞机都是靠向外国购买，主要作战飞机购自美国、德国、苏联、意大利等国，机种型号老旧，性能较差，缺少备件，实际上有

许多飞机已不能飞。更为严重的是，在空战中损耗的飞机，难以得到补充，从而使空军的作战能力难以恢复。

随着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失利，中国空军战损其实已损失了大半。尽管中国空军与强势的日军殊死空战，也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无力扭转战局。此后，当残损和不能参加战斗的飞机被迫调离第一线转移到了大后方，中方逐渐丧失了制空权。

军事上失利，一方面激发了全国军民的誓死抗战决心，一方面也使部分人产生了悲观情绪。此时，国民党内部开始有人认为抗战已无胜利的希望，甚至主张放弃抵抗向日本投降。为了挽回颓势，蒋介石认为需要有一次影响力大的军事行动，来鼓舞民众与军队的抗日士气，同时也向国

二战时，美国产的马丁B10型轰炸机。

际社会表明态度：中国仍然在顽强抵抗。

实际上，早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就在意大利著名军事理论家朱利奥·杜黑制空权理论和国民政府聘请的外籍军事顾问的影响下，产生过空袭日本本土的想法。1937年初，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国防作战计划》中，就明确提出了轰炸日本本土，争夺制空权的计划。尽管有这个计划，但能否付诸实施却是另一回事。当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部对空军的装备并不十分了解，从当时的飞机装备情况来看，并不具备远程突袭的能力。

然而，抗战初期接连的军事失利，又使蒋介石想起了这个计划。1938年5月8日，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之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州断不被人侵入。此等迷蒙，吾必使之觉醒也。”

尽管此时的中国空军已经是举步维艰，但是国民政府当局还是拟定了一个空袭日本的计划。但在制订计划时，却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日本人侵华犯下滔天罪行，应以牙还牙，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另一种意见认为，我方的轰炸机航程及载弹量有限，几吨炸弹尽管能造成敌国的心理恐慌，但破坏力有限，不会对战局带来多大变化。还不如实施宣传示威性的人道主义空袭，去散发传单，既能警告日本当局，又能使日本民众认清日本军阀的嘴脸，从而激发民众起来反对当局对中国的野蛮侵略。

最终，国民政府当局选择了第二种意见，决定用传单和小册子来代替炸弹，沿途飞撒，以唤起日本民众反战的觉悟，打破日本人认为日本本土不容侵入的自大狂妄。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全民抗战的决心。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将这一次远征日本本土称作是“人道远征”。

1938年3月，遵照蒋介石的指令，中国空军重新制订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准备以宁波、诸暨两机场为出发地，目标是日本九州的长崎、佐世保军港和八幡等城市，空袭时间定



军事上失利，一方面激发了全国军民的誓死抗战决心，一方面也使一些人产生了悲观情绪。国民党内部开始有人认为抗战已无胜利的希望。



为1938年5月中旬。

为什么选择这些目标？主要还是受飞机的航程所限，这几个目标相对较近，而且地位重要。佐世保军港是当时日本海军的重要基地，八幡是日本的重要钢铁基地。对这两个地方进行“空袭”，其震慑和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这次征战是另一种绝地反击，也是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特殊“轰炸”。

蒋介石专机驾驶员主动请缨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空袭计划。因为飞机不但要穿越日军严密戒备的防空区，还要进行长途跨海飞行，而且由于没有制空权，随时可能遭到日军飞机的拦截，再加上没有飞行海域和日本的相关气象资料，给执行这一计划又带来很大风险和困难。

在《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得到核准之后，中国空军立即进入了秘密准备阶段。日本军事实力强大，其本土防卫的水平，更是不可小觑。相比之下，中国空军既缺乏远程通讯、导航设施，又缺少长途飞行的经验。赴日的远征，无疑会面临重重艰险。因此国民政府对于执行轰炸任务的人选一时举棋不定。

当时中国能执行远征空袭任务的机型马丁139WC轰炸机仅有几架，但相关资料及飞机都掌控在美国飞行员手里，为此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建议，派美籍驾驶员李尔德担当远征“空袭”的驾机任务。当时蒋介石对中国飞行员的能力心里没底，再加上飞机本就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所以只好请美国人帮忙，准备让李尔德去帮助执行这一远征空袭任务。没想到的是，这个李尔德狮子大开口，提出要10万美元。

这个举动一下子把蒋介石激怒了。尽管国民政府负担10万美元并不是问题，但是感觉被讹诈的蒋介石认为不能容忍。于是，蒋下决心一定要让中国人自己去实施这一计划。那么，人选问题至关重要。

这时有一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徐焕升。

徐焕升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被选入中央航空学校，是第一期受训生，后前往德国航空学校、意大利空军专科学校深造6年，学成回国后任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

他表示说手上有一部分马丁飞机的资料，自己对这种飞机也比较了解，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执行远征的任务。徐焕升的意愿通过宋美龄传到了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及国民党内部对这个计划相当慎重。当时中国的财力有限，一架轰炸机造价不菲。这且不说，万一此次行动失败，损失的不仅仅是几架飞机，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则更大。因此，他不得不审慎行事，经权衡再三，最终同意由徐焕升负责执行任务。

经过缜密部署，这个机密又危险的人道远征任务终于落到徐焕升肩上。徐领受这一绝密任务后，立即着手为远征空袭计划做各项准备。尽管这次任务很可能有去无回，但徐焕升说：“身为革命军人，应把自己贡献给国家。不论面临任何危险，我都义不容辞。”

巧“借”飞机

执行计划的人员总算定了下来，可是飞机呢？完成远征空袭计划，必须要有能够从中国大陆飞抵日本本土的远程轰炸机。当时中国空军的远程轰炸机属第8大队，管辖着第10、19、30中队，原本拥有意大利萨伏亚轰炸机、美国道格拉斯、德国亨克尔和美国马丁139WC等各种轻重轰炸机共25架，可是经过抗战初期的血战后中国空军损失惨重。

1937年9月，蒋介石急派军事代表团赴莫斯科洽谈军事援华问题，并密谈武器购买，他特别指示代表团一定要争取购买远程重型轰炸机和500公斤以上的大个儿炸弹，并明确要代表团告诉苏方，购买飞机是准备去轰炸日本本土的。甚至早在当年8月20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

订前一日，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便接到蒋介石密电：“沈德燮处长已到莫，请兄介绍其与俄政府洽商飞机交涉，现最需要者为驱逐机200架，和双发重轰炸机100架。”

然而，谈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中方迫切希望苏联能够卖给中方急需的远程轰炸机，并且明确告诉苏方购买这种轰炸机的目的就是要去轰炸日本。可是当时苏联出于多种原因的考虑，最终还是没能向中国提供这种远程轰炸机。以至于远征日本的作战计划，曾一度由于没有远程轰炸机而搁置下来。

正当中方为没有远程轰炸机一筹莫展的时候，美、英、法、荷等国的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参战，并以他们为核心，于1937年10月，在汉口组成了外援队。由于原来中国空军第2大队第14中队飞机损失殆尽，便将这支外援队改为了直属空军司令部的国际第14中队，由宋美龄的美国顾问陈纳德直接指挥。这时新购得的马丁139WC轰炸机、伏尔梯VII轻型轰炸机以及刚从前线淘汰的诺斯罗普2EC轻型轰炸机，都属于该中队管辖。

在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轰炸机中，只有马丁139WC轰炸机能担当远征日本的重任。这种飞机在美军序列中称为马丁B10B，出口到中国的这种飞机的型号便叫马丁139WC。说是重型轰炸机，其实也不过是一种中型轰炸机，载弹量和续航能力都有限。为了增加续航时间，不得不减少载弹量。

这仅有的几架马丁139WC轰炸机却掌控在美籍飞行员手中，怎么办？于是，徐焕升制订了一个巧“借”飞机的计划。徐焕升的英语流利，他就易装改变身份，与住在武汉基地的外籍飞行员套近乎、交朋友，获取马丁轰炸机的相关资料。时机成熟后，国民党军方就假称日本飞机要来空袭，要对马丁139WC轰炸机进行紧急疏散，于是徐焕升就随着些美籍飞行员一起上了飞机，当飞机飞到成都，等外籍飞行员都下了飞机后，徐焕升立即叫地面部队把飞机围起来，再也不允许美

籍飞行员接手。

为此，徐焕升与美籍飞行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第二天，当美籍飞行员返回机场后，徐焕升出示了有关证明，他已被任命为第14中队队长，并奉命接管马丁139WC轰炸机。美籍飞行员当下并不能理解。因一时无法沟通，徐焕升再以正式信函致全体外籍飞行员，解释自己接收飞机的依据和决心。此一信件由当时的一名外籍飞行员收藏，至今还保存在美国圣地亚哥航空博物馆内。

当时，徐焕升面对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外援队人员构成复杂，某些人更有着金钱利益的驱动。本以为能凭借远征日本的计划，挣得一笔钱，不想计划落空。其中一个名叫吉鹏的雇佣兵，拔出

了手枪，对着徐焕升就开枪，好在徐焕升反应机敏，躲过了子弹。吉鹏的过激行为立刻被大家制止，徐焕升才躲过一劫。

这场冲突过后，这些外籍队员被送返至武汉。航委会立即以作战不利，军纪涣散为由，解散了这支更像是雇佣兵的外援队。至此，第14队重新恢复为纯粹中国人的编制序列。

远征前夕

接手飞机后，为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航委会又从空军第8大队第19中队调来以佟彦博副队长为首的数名优秀飞行员，与先前到达成都的飞行员会合，成立特别轰炸中队。另外还召集了蒋

1938年5月，武汉各界向飞往日本散发传单的徐焕升（右三）、佟彦博献旗致敬。图/秦风老照片馆/FOTOE



绍愚、苏光华等航校4期生。

这样一来，飞机和驾驶人员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可是马丁139WC轰炸机原本就只有9架，在战争初期已经损失了5架，在检查中发现仅存的4架飞机也是问题不断。由于缺乏备件，只好把两架问题较多的飞机上的部件拆卸下来，东拼西凑，最后攒出两架相对完好的飞机，准备就用这仅有的两架飞机去完成远程“空袭”的使命。

接着，徐焕升开始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一方面，徐焕升对马丁战机进行了改装，将飞机炸弹舱改装为油箱，增加可携带的燃料量；加装了无线电定向仪，以确保航向准确。另一方面，他组织了秘密训练，模拟实战的长途夜航训练，摸索和适应马丁战机的性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突击训练，他们的技术日趋成熟，信心也大大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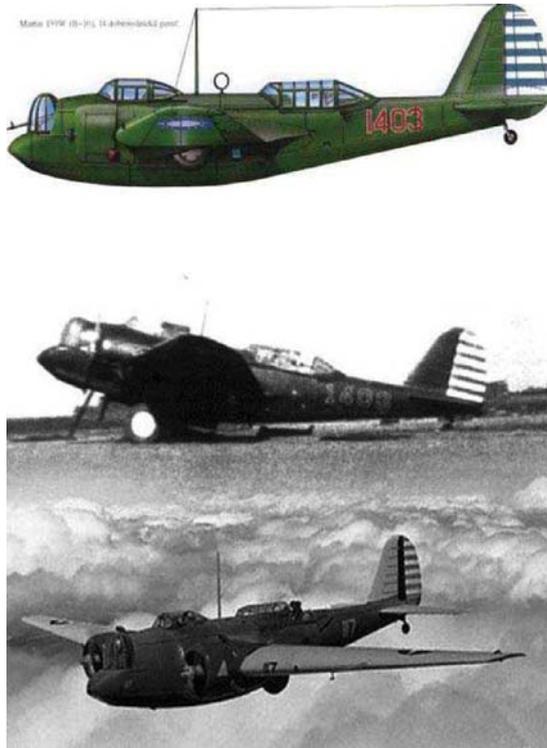
特别轰炸中队根据训练情况，确定了执行轰炸使命的机组人员各自的任务。编号1403号机为“长机”，徐焕升为正驾驶，苏光华为副驾驶，刘荣光为领航员，吴积冲为通讯员；编号1404号机为“僚机”，佟彦博为正驾驶，蒋绍禹为副驾驶，雷天春为领航员，陈光斗为通讯员。

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对日本远征轰炸必须要选择一个晴朗的月夜，这样才有利于飞行员靠目视发现地面目标。所以，特别轰炸中队机组都盼望能有一个好天气。但是，5月的长江流域正是梅雨季节，给机组出击带来很大困难。为了选择合适的出击时间，徐焕升先赴前线基地宁波，在当地随时观测东部海洋的气候变化。

为了鼓舞士气，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机组出发前，亲临武昌南湖机场，接见8名远征队员，并关切训勉：“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别，为国牺牲是光荣的，无论成功成仁，决不辜负你们。”

“空袭”之夜，动魄惊心

1938年5月19日，依照农历，月亮将转入下弦，也就是说即将要进入夜间飞行所需亮度的最低限，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当日14时，航委



会突然接到了徐焕升从宁波发回的电报，请示立即执行任务。留在汉口的飞行员接到通知，马上赶到王家墩机场准备起飞。为了隐蔽出击，按照预先的计划，先向南直飞，避开长江沿岸日军的耳目之后，再经由南昌、衢县飞抵宁波。15时，2架马丁139WC型轰炸机从汉口起飞，并于17时左右降落在浙江宁波栎社机场。这时早已做好准备的场务人员以最快的速度为这两架飞机加满油，并把成捆的“纸弹”装进弹舱。

5月19日23时30分，航空委员会下达实施远征命令。23时40分，出征人员为表达必胜决心，由徐焕升向军事委员会拍发电报：“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各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徐焕升皓”。这份电文，后来在全国各报刊载，显示了我东征勇士们的悲壮英勇。

23时48分，两架马丁139W轰炸机从宁波栎社机场秘密起飞，先沿舟山群岛南端飞行，以避开日机防空警报系统，然后再向东直向日本方向飞去。由于云层很厚，无法看清地面，起初全靠宁波地面电台导航。升空后，只能凭借仪表进行飞行。当机队飞临东海上空时，忽然，在海上游弋的5艘日舰探照灯齐明，深沉的夜空里闪烁着根根光柱。紧接着，高射炮、机枪弹流如注，直射天空。不过飞机飞得很高，又没有投弹轰炸，日舰便停止了盲目射击。危情之下，两架马丁139W轰炸机不理睬这些干扰，沿既定的航线沉着前行。

20日零点35分，后方基地收到了机组发回的电报：“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这是告诉后方基地，他们仍在安全飞行。由于经过严格又艰苦的训练，“盲航”并没有成为问题。经过3个多小时的编队夜航，两架飞机顺利飞抵长崎上空，下面路灯织成的光带依稀可见，那是长崎东面风头山下的灯火。这时，整个九州岛的日本人正在酣睡，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中国空军的飞机已经飞到他们头顶上来了。

领队徐焕升随即命令飞机下降高度，然后果断下令：“准备、投弹！”飞行员们早就把那些捆扎好的“政治炸弹”松了绑，立即往下投放。这些“炸弹”没有爆炸的火光，没有震耳的声音，没有呛人的硝烟，而是五颜六色的彩纸，带着和平的愿望和使命，沿着飞机的飞行路线，天女散花般地往下飘落……双机编队以长崎为起点，向北做大圆弧飞行，于3时45分到达福岗上空，再次撒下传单。4时32分，编队飞越北九州上空，将剩余传单全部投放。

这些反战政治传单上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战争不仅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将损害日本的利益，号召日本民众应当起来，打倒本国军阀。

《中华民国全国民众告日本人民书》中写道：

“日本国民诸君：老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这样对人民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可是，占领满洲而今已七年。在这七年之间，除了军部的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了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贵的物价，贫与饥饿，疾病和死亡罢了。”

《中华民国空军将士中日人民亲善同盟告日本国民书》中写道：

“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领土上做着怎样的罪恶。”

有一份传单对日本军阀发出严正警告：

“尔等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驯，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等戒之！”

投撒完传单后，徐焕升带领飞机编队旋即掉头返航，经佐世保、佐贺、久留米、熊本等地时，日军均未做出反应，只是个别城市实施了灯火管制。

1938年5月20日拂晓，这两架马丁139WC飞抵我国东海岸。这时，突然发现有机机试图拦截，并遇到日舰高射炮的轰击。徐焕升指挥两机

01
02

01

1938年，《新华日报》的头版头条刊载了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壮举。

02

上图为徐焕升驾驶的1403号轰炸机设计图，中为飞机照片，下为美国产的马丁B-10型轰炸机飞行姿态。

利用云雾作掩护，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沉着应对。在此期间，两机失散。

8时48分，佟彦博驾驶的1404号机率先在江西玉山降落，9时24分，徐焕升驾驶1403号机也顺利地降落在南昌机场。随后，两机分别在各自机场加油后再次起飞，11时30分在武汉上空再度会合后，安全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终于圆满完成了这次铭记历史的“人道远征”。

纸片的威力并不弱于炮弹

徐焕升等8名勇士胜利凯旋的消息，很快在武汉三镇传开。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在机场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各界代表云集汉口机场，汉口市民欢欣鼓舞，夹道欢迎远征日本凯旋归来的空中勇士。

当徐焕升跨出座舱兴奋地向人们挥手致意时，现场的人群阵阵高呼：“中国空军万岁！”“中国抗战必胜！”表达了对远征勇士的敬意和坚定抗战的决心。中外记者争相拍下了远征日本归来的中国空军英雄们的镜头。

这次远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战信心。蒋介石从洛阳发来专电，嘉奖徐焕升等8位远征勇士。他在总结抗日战争中还将徐焕升远征日本一役举为范例。武汉三镇各界纷纷向凯旋英雄赠送锦旗、鲜花和慰劳品。锦旗旗上写着：“远征东瀛”“扬威海外”。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负责人陈绍禹、周恩来、吴玉章、罗炳辉等人也前往航空委员会赠旗慰劳。八路军办事处赠送的锦旗上写着：“气吞三岛，威震九州。”中共中央代表团赠送的锦旗上写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周恩来在致词中说：“我国的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成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

中国空军远征日本，首次打破了日本有史以

来从未有外国飞机进入其本土空间的“神话”，使得日本全国骚动，惊恐万状，更超乎日军大本营的意料，从而使日本政府颜面扫地。这次对日本的“纸片轰炸”，向国际社会充分显示了中国人誓死抗战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中国飞机到日本投下的不是毁灭性的炸弹，而是赋予和平使命的传单，彰显了中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这就给世界形成一种全新的印象，与日本在中国烧杀抢掠的作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此次远征，尽管军事效果有限，但政治影响巨大，对日本法西斯的骄横与狂妄予以正面回击，并给日本人的心里带来强烈震动。后来，日本人阿部弘之在其《山本五十六》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记载，日本庆祝“皇历纪元2600年”，高官将领们都到皇居广场参加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唯独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死活不去凑这份热闹，反而调兵遣将，沿着东海、黄海、日本沿海、全力防范。这一天，山本五十六带着他全部的舰队在中日之间的海上进行巡逻，他说：“我要是蒋介石就在这个时候派出中国所有的能飞到这儿的飞机对二重桥进行一次轰炸，那就会把我日本的整个中枢机关都干掉。”可见，这件事对日本军方的影响之大。

而对民间的影响也非同寻常。富泽在当时是日军士官，他在《陆军下士官漫语》一书中曾描述过：“捡到宣传传单的人们，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因为对这一事件好奇，富泽在战败回到日本后，采访了亲历中国空军“纸片轰炸”的中谷正子，她说：“这时候我家院子里落了传单，很明白是敌人飞机投下来的。这一下又让我更加害怕了，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敌人的飞机是一定要攻击我们的。敌机远去了，周围的大人乱成一团，但是，我们一些小朋友在一起谈这件事的时候，却觉得（中国人）专门派了飞机来仅仅是撒一些传单，其实他们是很和平的人啊！”

中国空军远征日本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世界各国及国内报纸大篇幅赞扬中国空军对日本的“人道远征”。

1938年5月21日《新华日报》以《为唤醒日寇铁蹄下民众，我神勇空军征日创伟举》为题报道了此次远征行动，并发表了《空军英雄远征的意义》的评论。香港报纸评论说：“传单比炸弹更具威力，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后日本人不得安宁矣。”

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大赞中国空军。美国报纸还登出漫画，把日本在中国进行的野蛮轰炸和中国对日本仅作“纸弹轰炸”进行对比，说这实在使日本无地自容。二战结束前，美国《生活周刊》刊登了12名全球闻名的飞行员照片，其中就有率队远征日本进行“纸片轰炸”的中国飞行员徐焕升，并介绍说：徐焕升是比美军飞行员杜立特更早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路透社以《中国飞机轰炸日本》为题，详尽介绍中国空军远征的经过。英国《新闻记事报》社论称：“中国空军日前飞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重大，亦饶有趣味。”还有英国报纸说：在日本，凡是不利于政

府的新闻一概禁止刊登。假如像这件事一样的新闻从空中掷下，那么日本政府的伎俩就穷尽了。

苏联《莫斯科新闻》也不吝赞美之词：“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占重要地位，在未来无疑将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还有一些世界主流媒体，盛赞中国空军创造了光荣战绩。

这是世界航空作战史空前绝后的一次“纸片轰炸”，是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空军最有特色的一次作战行动。这次远征彰显了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如果时间回溯到1938年，在侵华日军气焰正嚣张之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国内部分抗日力量正陷入一种低迷之中。此时，几个中国将士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挺身而出，用勇气和智慧胜利完成了一次远征，给侵略者以震慑，给全国人民以巨大信心。这种豪情、决心和精神，值得我们铭记，更是支持我们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民族心理的一种完美诠释。^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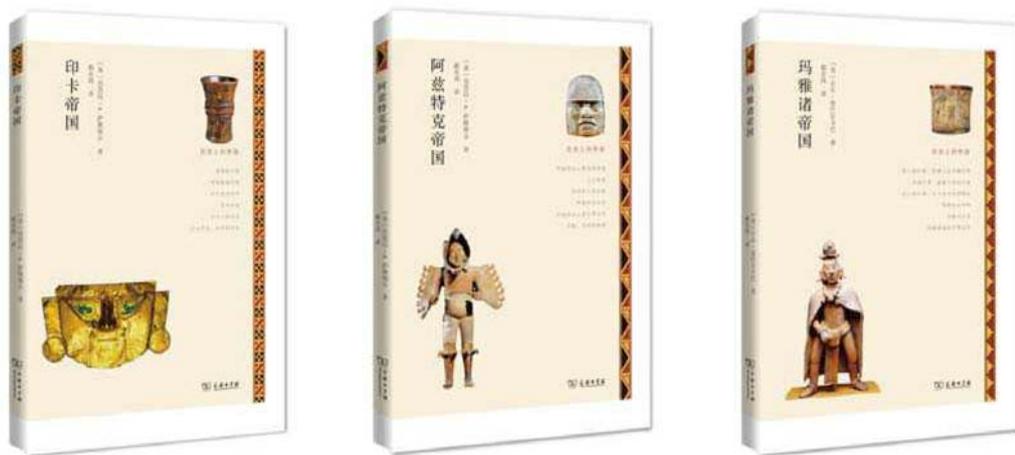
(除标注外，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图为孔祥熙（左一）等亲自到汉口王家墩机场迎接远征机组人员等凯旋。前排左三为带队机长徐焕升，左二为僚机机长佟彦博。

失落的帝国：谈谈拉美古文明

文 | 刘杨



《印卡帝国》（左）
《阿兹特克帝国》（中）
《玛雅诸帝国》（右）

历史上，拉丁美洲有着辉煌璀璨的古代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心之一。印卡帝国、玛雅诸城邦和阿兹特克帝国是集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之大成者。2015年7月12日，在北京字里行间书店德胜门店，《印卡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玛雅诸帝国》三本书的译者、拉丁美洲史专家郝名玮与青年翻译家范晔与读者畅聊拉美古文明。《印卡帝国》《玛雅诸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分别叙述了高度发达的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发展状况，并呈现了三大帝国各自的特点。

最早的拉美古文明形成期叫前古典时期，即拉美古文明形成的时期；接下来称古典时期，这一时期是拉美古文明发展辉煌的时期；最后来到后古典时期，印卡、玛雅、阿兹特克三大帝国就处在这个时期。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拉美古文明所处的历史时间点，郝名玮介绍说：“相对于中国来说，拉美古文明的前古典时期是大概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50年这个期间，这个期间相当于我们中国夏商

周秦汉三国前期。古典时期相当于三国的后期，一直到晋朝、南北朝、隋唐五代。后古典时期是900年到1500年左右，相当于中国的宋朝、元朝跟明朝时期。”

从地理位置上看，玛雅文明与阿兹特克文明共同处于中部美洲地区。《阿兹特克帝国》和《玛雅诸帝国》两本书中都提到了一种 Olmeca 文化，这个文化是中部美洲的母文化，玛雅文明与阿兹特克文明都继承了这种文化。玛雅从来没有在地域上成为一个统一帝国。玛雅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它的政治体制是城邦国家。阿兹特克帝国也不是真正疆域意义上的帝国，它跟被征服的国家关系是种“贡赋关系”，征服一个地区后不加以控制，不派军队进行统治，不建立地方政府。这个地区的原统治者还在那统治，但是必须给阿兹特克纳贡。

印卡文明在南美洲，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印加文明”。郝名玮认为“印加文明”这个译名有些问题。他曾经请教过拉美的一些学者，Inca 中的“C”应该发“K”的音。印卡帝国范围很大，是个真正

的大帝国，从今天的厄瓜多尔、秘鲁一直到阿根廷、智利中部的毛莱河，从疆域上来说它是真正的大帝国。

阿兹特克帝国跟南美洲的印卡帝国这两个帝国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们是这两个文化区历史文化的集大成者，吸收了它们以前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城邦的文化遗产。这又不同于玛雅文化，玛雅文化的传统是一直继承发展下来的。

许多学者都认为玛雅文化是西半球最富特质的古文化。谢勒在《古玛雅》中写道：“我们越深入了解玛雅人的历史，就越对之加以尊崇。诚如文物所示，玛雅人是在数学、天文学、历法编制、文字、技术、政治组织、贸易、雕刻、绘画、建筑以及其他技艺方面取得惊人成就的民族。”

郝名玮在活动现场也提到了玛雅人在数学和历法上的成就：“玛雅文化有它的特点，比如它数学很发达，玛雅人在世界上最先发明了‘零’的概念。玛雅人的零的概念出现大概在公元 350 年。以前我们都说‘零’最早是印度来的。印度从 564 年才开始有零，也就是说玛雅‘零’的概念出现得最早。玛雅人在数学上的成就还影响了天文上的发展，像它的纪年，跟我们现在用的格列高利历一样，过一天就过去一天。玛雅人从公元前 3114 年就开始纪年了，那一年是他们的元年，比今天使用的公元纪年要早很多。”

文明的标志之一是文字。印卡文明没有书面的文字和数字，因此研究起来比较困难。有英国史学家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印卡人是有文字的，只不过还未被破译。解读印卡帝国的唯一档案是基普（quipus），也就是结绳记事。当时西班牙征服印卡帝国之后发现，印卡帝国对它的土地、臣民家庭成员、牲畜、收了多少粮食记录得清清楚楚，依靠的就是结绳记事。今天人们“所知道的有关印卡帝国的信息也大多来自于西班牙史事记录者——士兵、书记员和神父们。他们详尽地记述了印卡人的历史、习俗和日常生活”。但是这些西班牙人的日记、信件等资料中记录的印卡帝国的信息，很多反映了



玛雅人在数学上的成就还影响了天文上的发展，玛雅人从公元前 3114 年就开始纪年了，跟我们现在用的格列高利历一样。那一年是他们的元年，比今天使用的公元纪年要早很多。



征服者的观点，有些未必能够准确地评价和理解印卡人。

在界定文明标准这个问题上，郝名玮在活动现场总结说：“传统的说法是有文字才有文明，国家出现了才进入文明阶段。欧洲文明还有一个标志就是车轮，这个美洲没有。拉美古文明的长途运输、短途运输都是靠人力。拉美的物质文明很发达，玉米促进了世界人口的增长，解决了人们的粮食问题；还有土豆也是原产于这里，就是说拉美文明对世界人类社会的贡献不亚于欧洲文明和亚洲文明。加拿大一个考古学家提出，文明不能够拿现成的理论来套，文明发展的水平各个地区的特点不一样。虽然拉美没有牛，可是种玉米只需要点种，不需要牛拉犁。还有印卡也有梯田，除了我国云南的梯田，世界上没有一个梯田有它那样完美。文明的表现不一样，不能拿欧洲的标准、理论来套。”^①



“刀下留城”：平遥古城护城记

口述 阮仪三 编撰 居平

从1980年开始，全国一片拆掉旧城建新城的形势，整个国家百废待兴。那个时候盛行两句话，就是“要致富，先开路”“汽车一响，黄金万两”。这样一来，到处都在开路。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拆掉旧城建新城，拓宽原来的旧马路变成新马路。但是很多城市不大理解怎么样是正确的城市建设方式，在此过程中出现大量的无序拆迁。实际上，我们需要做好城市规划，要有一个详尽的能合理指导城市建设发展的城市规划。

❖ 欲拆平遥城？且慢

在拆山西平遥城墙的时候，我正带着学生在榆次做总体规划教育实习。平遥古城离榆次很近，我向当地借了一辆小车，走了一圈去看一看，一看就吓了一大跳，所有的东西都在拆。因为我跟我的老师董鉴泓先生1962年去平遥调查过，就认识了平遥古建文物队的队长李祖孝和李有华，他们看到我都还认识，他们就来跟我讲，说这里要救一救，这么好的东西不要拆啊，太可惜了。我说你们怎么拆房子的？你们的规划图拿来我看看。当时平遥建设局的工程师王中良把规划图拿出来，王中良是一个很老实的地方干部，但是这个干部不懂规划技术，他是搞市政管理的。当时说要开马路，要开多少米？开24米宽的路，就



口述人 / 阮仪三

1934年11月出生，苏州人。现任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和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因而享有“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等美誉。主要著作有《护城纪实》《护城实录》《江南古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等。

拆掉了房屋，然后就把城墙拆掉了。在这个情况之下，李祖孝、李有华就带我去看已经拆掉的许多明清时代建筑的残址。

1980年平遥刚刚拆了一条大街，从西城门拆起，进去180米，这一段路已经拆掉了300幢明清建筑。

平遥城里大多数房屋都是明清建筑，要着重说一句，山西省的古城里所有的房舍、建筑大多是明清建筑，像现在你去找找看明代建筑，到哪里去找？这个地区各个古城都是明清建筑，我觉得实在太可惜了，就希望他们能很好地做城市规划。当时，山西省建委的规划处处长赵晋普，曾是我们同济的学生，我教过他。他说，正好你们同济的老师来了，可以帮助我们搞一搞建设。他就把山西省各个城市规划部门做的图拿出来给我们看，我一看又吓了一大跳，忍不住生气骂起来，我说这种图还能叫做规划图？你是学城市规划的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图？他说他也没办法。我一张图一张图地看，看了以后就觉得非常悲哀，就是所有的图几乎都是不合格的。赵晋普说，阮老师那你看我们该怎么办？我说先停下来。他就请示了一下省政府，回复说不可能。后来，我说，我们换个方式，看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地方进行试验建设。

到了平遥不久，古建筑就不拆了。因为没钱了。平遥当时很穷，城市领导是主张要拆的，但

是拆也要工钱。我说，平遥现在停止拆老城了，城市照样可以现代化发展，你不要用这种拆了旧城再建新城的办法，你不拆旧城也可以建新城，我们要有合理的规划办法。

当时就是这位赵处长找了山西省建委主任，这个省建委主任同意由我来做一个合理的规划，但是要求是要快，这个规划要一个月做出来，做出来以后按不按照这个执行，不能确定。我想虽然结果不知道，但是至少可以让拆老城的事情停一停。那个时候正好放暑假了，我就赶快回到学校招兵买马，挑了12个优秀的学生。我对学生们说，第一是没有钱，咱们是去义务劳动；第二是会很辛苦，都要吃苦耐劳，并且技术水平要高，能画能写；第三，你还要有一点特长。当时所谓的特长其实不是指别的，主要是指会骑自行车、会摄影、会做模型。那个时候不是人人都会骑自行车，因为调查要跑，会骑自行车肯定会快一点。然后会拍照，以前的照相是用胶卷，自己要会冲印，要会放大，因为没人帮你做这个事情，只能我们自己做。还有一个就是会做木工、做模型，因为到那边要自己动手做。当时挑出来的12个人后来全出了成绩：“其中就包括同济大学现任的副校长吴志强、上海规划院的院长、广州市规划局的局长，还包括张庭伟，当时他是研究生，现在是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授。”

❖ “老城老到底，新城新到家”

我那个时候也有四十几岁了，我在念大学前当过兵，年龄比学生大得多。去平遥要花钱，买火车票、吃、住，就预支了教学经费3000块钱。回来要用教学经费慢慢地还的。我每年进行的全国各地古城调查的经费要花掉一辆小汽车的钱。都是我自己贴钱的，每年在这个项目上花去15万到20万元之间，所以我买不起房子，用不起车子。

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做了100多个古城镇的调研和规划，做好了就把材料上报上去。学校却没

有专项资金支持这件事。

当时平遥调研也是我们自己拿钱，各种日常开销都要自己拿钱。当时我去之前，我就跟学校几个主要老师讲这件事，一个是系主任董鉴泓教授，一个是古建专家陈从周教授。陈从周教授给了我很重要的启发，他说，对于这些城市来讲就是一句话叫“老城老到底，新城新到家”，新旧分开。这个建议很有智慧。

后来系主任董鉴泓教授也到平遥来了，过来了之后具体做了一点指导，系主任董鉴泓教授也到了，给了我们精神上的支持。

我到了平遥以后就发现，平遥有非常珍贵的文物遗产价值，有很重要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平遥的城墙，平遥的城墙是后周时期留下来的，像这么古老、完整的城墙中国没有几个，实在是罕见呀！当时，全国一片拆城风。当时只有4座城墙还留着：第一座是平遥，只拆了一个口子。第二个是西安拆了一半，还留了一半。第三个是荆州，因为湖北荆州的城墙本身就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第四个是东北的兴城，袁崇焕明末在东北抗击金兵的城市。因此我们就说这四座古城是当时中国仅存的相对完整的古城，这些古城都可以列为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当时，荆州城和西安城已经是国家级的文保单位了，进入这个级别的名录以后就能有机会把它保住。

同时，我在平遥古镇又发现了两处重要的古建筑：一个就是双林寺，双林寺里存有二千多个元、明、清以来优秀的雕塑，这个雕塑之精良，内容之丰富，应该说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如普通山门里的四大金刚，人家的四大金刚就是“风、调、雨、顺”，一般是穿上盔甲的武将装束。双林寺里的四大金刚竟穿着露脐装，肚子、胸部都裸露到外面。它们是元代的雕塑。

另外，我们常见的十八罗汉，一般是什么降龙罗汉、伏虎罗汉，然后是沉思罗汉、长眉罗汉等，双林寺里的也不是这样，他们是怒罗汉、哑罗汉、醉罗汉、睡罗汉、病罗汉，元代的雕塑非常有特色，



01
02

01 平遥古城大街。
02 平遥古城民居。

很人性化、生活化，把人的神态用罗汉的形式表现出来，很仿真的，有活灵活现的感觉。另外，一般常见的观世音菩萨是男身女相，而他们做的是女身女相，胸部高的，屁股大的，侧身坐着，一看就是漂亮女子的形象。

❖ 寻求“护身符”

最特别的是双林寺的韦陀像，看那浑身隆起的肌肉，活脱脱就是中国的男性维纳斯。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们说这个是世界级瑰宝，这些罗汉像是从来没有在其它地方见到过的，是惊世骇俗的。

还有一个就是镇国寺，镇国寺是唐末的，是北汉天会七年（963年）建的。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寺庙第一个是南禅寺，第二个是佛光寺，第三个就是镇国寺，而年代早晚排序依次为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的寺庙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镇国寺当时却不是，因为当地没人申报。我们立刻决定申报。我让学生们把镇国寺的相关材料准备好，把古城墙首先画成考古古建筑图，我拿这个去报批，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有谱了。若是有了这个认定称号，平遥古城就有了免于被拆的“护身符”了。

平遥的那些明清的民居，也都特别精良，这中间还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比如它的文庙大成殿。大梁上写着金大定三年（1163年）建。甚至城市当中的市楼，建的时候是清康熙二十八年，都明确写在那里。这些建筑中光明代的东西就多到几百个，还有那些像城隍庙、清虚观，一看就是元代、明代建的。但是，当时山西省留存了全国65%的古建筑，到处有精品。想要得到保护，不让它被拆迁破坏，我们还必须想方设法拿到这个“护身符”。

我们日夜奋战了一个月以后，我带着做好的材料，专门去汇报，我们把图做得很好，希望让那些领导们能看得懂并认同。我先给县里领导汇



山西平遥双林寺释迦殿内的雕像。图/海峰/FOTOE

报，然后再跟省里领导汇报，然而，县里和省里领导都没有表示出较大的兴趣和支持，然后我就想办法，直接把材料送进了北京。

我一个人背着图纸，问县里借车。当时借的不是汽车，是自行车，想借自行车推我的行李，结果没借到。我就只好自己背着走，一共是7里路，路不远，但要扛着行李、图纸，当时还下着雨，很不方便。我浑身是泥浆，我走到火车站，乘夜车从平遥坐到了太原，然后到太原转火车去北京，到了北京见到了国家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罗哲文，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阮老师，您赶快去想办法洗个澡吧！”当时，我完全就是像叫花子一样，浑身又是泥，又是水。我把规划和图片资料给罗

哲文、郑孝燮先生看了，他们都傻眼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保护。我提出请他们去一趟，当时罗哲文和郑孝燮都是重量级的专家，人也很热心，先前搞保护和考察古建筑时我和他们已经熟悉了。

❖ 郑孝燮说的“刀下留城”

我请他们去了以后，全国政协常委去了，当时的山西省省长也跟着到了平遥。郑孝燮跟山西省省长交流说，这些规划是“刀下留城”的规划，是高水平的规划，你们应该认真地执行。我就想要赶快把它变成红头文件。于是，当场就请他们

把这个话写下来，然后请郑老签名，在我们当时的会议纪要上写上这几句话：“这个规划是高水平的”。然后，省长马上就批示，希望按照规划认真执行。

我说这还不算，这个规划能不能执行，还需要钱，没有钱无法执行。那时候还没有设国家文物局，罗哲文当时是国家文化部文物处处长，每年的文物保护经费归他管，我后来跟他说：“平遥的古城墙应该是国保单位，肯定没问题。你能不能给点修缮文物的钱？”他说单位是有笔钱，但是这个钱是专款专用修长城的。我说你自己以前也说过，所有中国的长城为什么没有保护好？是由于各个城市都有城墙，城墙是洪武年间跟明长城是同时修的，也就是说全国所有的城墙几乎都是从洪武三年开始，各地自己修的。万里长城是中央政府修的，而这些城墙则是各地方政府同时修的。我据理力争：“你自己也讲过除了北方的长城还有南方长城，所有的城墙都是一个体系的。”这些平遥的城墙跟长城是同一个体系的，是万里长城的延伸部分。他说这个话有道理，是这么一回事。我提出能不能多拨点款，然后他就一下子拨款8万元。

当时，在1980年代的时候，8万元不容易，是笔大数字了。

8万人民币直接拨到平遥，专款专用维修城墙，我就怕这笔款不落实，我就叫当时的同济研究生李晓江在北京盯着看这笔钱是不是真正拨出来了，拨出来以后这笔钱是不是到了平遥，到了平遥以后是不是这个钱用在城墙的修缮上，一定紧紧盯着。李晓江就做了这个重要的事情。

他盯着这笔钱汇出了，然后这个钱就批到文化部财务处，他到财务处看，看钱汇出去没有，用什么方式汇的，银行汇款还是邮政汇款还是银行转账。后来他打电话跟我联系，我叫他赶快赶到平遥去。赶到平遥以后钱还没到，我说你在那儿等着，等着过两天钱到了就去找县长。县长一开始不相信，不相信国家文物部能批这么多的钱，根本不相信有8万。后来银行的行长拿着支票的抄件就找县



万里长城是中央政府修的，而各地的城墙则是地方政府修的。但它们是同一时期所修。平遥的城墙跟长城是同一个体系的，是万里长城的延伸部分。



长去了，是手抄件，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县长一看高兴得不得了。

我让李晓江在平遥建立古城保护的修缮委员会，然后成立一个古城墙修缮的工程队，把建筑工程师调过来修城墙。我要他落实了再回校。李晓江在同济研究生毕业以后到北京工作，现在是中国城市规划院的院长。跟我到平遥去的这十几个学生，回忆起平遥那段经历，都还会激动、兴奋，觉得干成了件大事、有意义的事。

从“刀下留城救平遥”这件事当中我也有很深的体会，我发现，不懂技术的人在那里搞技术，是最大的缺陷。我在平遥做规划的时候感到严重的问题是缺乏技术干部。举个例子，当时平遥县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懂什么是“单行道”。我们做平遥规划时，认为平遥古城里马路还比较宽，可以用“单行道”的方式来通车，就没有必要来拆房修路了。但“单行道”这个名词平遥人都不懂。

他们更不能理解什么是修复，什么是维护。维护和修复是不一样的，当时，许多技术干部不懂。从平遥回来以后，后来还有其他城市，比如丽江的保护、新绛的保护，还有江南古镇的保护都需要懂保护理念和技术的人去抢救我们的古城和古建筑，后来我还开办了一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培训班，利用我这个同济大学老师的身份，同时我正好又兼任国家建设部城建领导干部培训中心主任的身份，给干部们介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些专业知识。

后来就是因为有了这一批初步懂得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干部，有了这些人员，才有了这些古城保护的具体工作的落实和成绩。我开玩笑说这些人全是我派到古城里去“卧底”的。当他们在古城里发现了保护工作被刻意破坏的情况，便通知我去抢救保护。^①

（摘编自《留住乡愁：阮仪三护城之路口述实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删节。除标注外，图片均由出版社提供）

别时容易见时难

——左权将军的抗战家书 文 | 王家淼



左权与妻子刘志兰及女儿。

左权，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他牺牲时年仅37岁，所幸他为后人留下了一摞鲜活生动的家书，才使我们能透过文字、穿过时间去认识这样一位情感细腻的威风男儿。

70多年过去了，这些家书的纸张已变成了枯黄色，字迹也淡化了许多，然而，这字里行间蕴含着绵绵深情却永远震撼着我们。

志兰：

就江明同志回延之便再带给你十几个字。

乔迁同志那批过路的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之封锁线了，很快可以到达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

希特勒“春季攻势”作战已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国内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

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希望能好好的恢复

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需人照顾的。

此间一切如常，惟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今年没有种花，也很少打球。每日除照常工作外，休息时玩玩扑克与斗牛。志林很爱玩牌，晚饭后经常找我去打扑克，他的身体很好，工作也不坏。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之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不多谈了，祝你好！

叔仁
五月二十日晚

有便多写信给我。

又自本区开始扫荡，明日准备搬家了，托孙仪之同志带的信未交出，一同付你。

这封信是写给志兰的。志兰，即左权将军夫人刘志兰，1917年生于北京，1992年去世。

信中提到的江明是山东掖县（今莱州）人，北平师范大学肄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发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后任民先山东省队部、中共鲁西南特委、中共中央北方局青委负责人，



在书信中，
这个沉默刚毅的军事指挥员一变而为伴侣的丈夫、女儿的慈父。字里行间凝结着对妻子的想念和呵护，对女儿冷暖关爱的骨肉亲情。



中共中央太行分局秘书长、中共太行八地委、冀南二地委书记。

北北，即左权将军唯一的女儿左太北，1940年5月生于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八路军总部。因出生地武乡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叫太北区，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刘伯承的孩子叫刘太行，而建议左权的女儿取名左太北。左太北长大后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部门工作，曾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计划司副司长，2000年退休。

信的末尾提到的孙仪之是安徽六安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卫生处处长，军委卫生部副主任、主任，卫生部代部长、副部长，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南军区卫生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封家书写于1942年，是左权将军壮烈殉国前几天写给爱妻刘志兰的最后一封信。

❖ 左权生平

左权，原名左纪权，号叔仁，1905年3月15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市黄茅岭一个农民家庭。中学时他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社会科学出版社，阅读了《向导》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1924年考入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编入第一队。他在校勤学苦练，受到教官和同学们的称赞。

1924年10月，左权参加了镇压商团叛乱。11月陆军讲武学校一、二队学员转入黄埔军校。1925年1月，左权在黄埔军校由陈庚、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6月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以后历任新12军军长，红

一方面军总前委参谋处长，红五军团第15军政委、军长和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红一军团作为先头部队，左权经常参与指挥战斗，协助聂荣臻等指挥渡赤水河、过大渡河、夺泸定桥、攻腊子口等战斗和直罗镇战役。1936年，任红一军团代军团长，率部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9月15日，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4月，日军以108师团为主力3万余人分九路围攻晋东南根据地周围的博爱、邯郸、长治等地区，左权亲自率总部警卫团参加战斗，歼敌千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围攻，并收复了辽县等18座县城，扩大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日军分三路围攻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左权指挥部队警卫团打麻雀战，粉碎了日军的围攻。8月至12月，左权参与领导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共毙伤日伪军2万余人，破坏铁路、公路2000余公里，拔除敌军据点3000多处，取得了重大胜利。1941年11月，为保卫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他亲自选择地形，指导修筑工事，并指挥总部警卫团不足千人的兵力，采取“以守为攻”“以静制动”“杀敌至果”的原则与日军5000余人激战八昼夜，毙敌1200余人。中共中央军委称赞黄崖大捷为“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1942年初，日军接连向晋东南根据地发动“总进攻”。2月，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毒辣手段，不断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区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一带增兵，进行“扫荡”，被我军击破。两个月以后，日军又纠集3万多兵力，进行空前残酷的“五月大扫荡”。24日，八路军总部机关开始转移，左权亲自率129师及警卫连部署突围计划，在突围中，由于后勤部门对形势估计不足使几千人马阻滞在山西河北交界的十字岭，日军发现了目标，从四面合围，步步紧逼。左权

命令作战科长及警卫连长护送彭德怀总司令转移至安全地带，自己坚持指挥突围。在总部机关和老百姓转移完毕、掩护部队冲向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时，一颗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八路军卓越的将领左权将军壮烈牺牲，时年37岁。

1942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作出决定，将山西省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并在涉县石门村西北太行山麓修筑了左权将军陵墓和纪念塔。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将左权灵柩移至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 家书中的左权

左权将军可谓将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谱写了自己辉煌的革命生涯、军事生涯，撰写和翻译了大量军事理论文章和著作，但很少谈及自己。正因为如此，这些家书便成为抗战时期八路军高级将领的家书代表作，这十几封出自左权将军内心深处的文字细腻地勾勒出其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多彩世界。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左权所写的家书，除了他给母亲和叔叔的两封信写于1937年外，其余的信

📌 左权家书。



都写于左权与刘志兰1939年新婚后至1942年5月壮烈殉国的戎马倥偬、战事频繁、炮火纷飞的21个月中。

1939年2月，中央巡视团到达山西前线，巡视团成员、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刘志兰随团来到山西后留在晋东南北方局妇委会工作。经朱德总司令做牵线红娘，左权与刘志兰结婚并于次年即1940年5月生下了女儿左太北。

这批家书写作的时间正值百团大战前后，日军将八路军视为华北的眼中钉、肉中刺，为此进行了残酷残忍、灭绝人性的“大扫荡”。面对险恶的战争环境——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是天不雨、地久旱、人缺粮、畜缺草，八路军战士缺枪炮弹药，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却对抗战胜利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家书透露出左权将军对刚刚投身革命的亲密伴侣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呵护；对刚出生才几个月就离别的女儿，这个沉默刚毅的军事指挥员在家书中一变而为慈父，字里行间凝结着对女儿冷暖关爱的骨肉亲情。

下面摘录几段左权家书中的内容，看看百团大战前后太行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战时生活。

接何廷英同志上月二十六日电，知道你们已平安地到达了延安。带着太北小鬼长途跋涉真是辛苦你了。当你们离开时，首先担心你们通过封锁线的困难，更怕意外的遭遇。今天安然到达了老家——延安，我对你及太北在征途中的一切悬念当然也就冰释了……你们走后，确感寂寞。幸不久即开始了北方局高干会议，开会人员极多，热闹了十多天，寂寞的生活也就少感觉了。你们走时正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胜利开展之时……（1940年11月12日左权致刘志兰第一封家书）

前托郭述申同志带给你的一包东西：有几件衣服，几张花布，一封信，听说过封锁线时都丢掉了。可惜那几张布还不坏，也还好看，想着你替小太北做成衣服后，满可给小家伙漂亮一下，都丢掉了，这怪不得做爸爸的，只是小家伙运气太不好了。（1941年5月29日左权致刘志兰第三封家书）

……半年来没接到你的信，时刻担心着你及北北的一切……二月间我们全处在反扫荡中……敌人的残酷仍然如故，新的花样就是放毒……因为毒伤，老百姓很死了一些人，伤的很多。女县长刘湘屏中毒非常厉害，全身发烂，皮肤掉了三分之二，幸而医治较早，大概可以不死了，其痛苦之极也可想而知。……亲爱的，时刻牵挂着你，你当同感，别后将两年了，不能不算久，愿共同努力，多多工作、多多学习度过未来的两年吧。

（1942年4月1日左权致刘志兰第九封家书）

文章开头左权殉国前给妻子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表达出对女儿的思念及渴望全家团聚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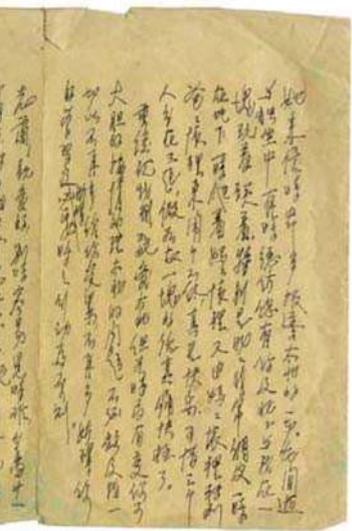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就在此信写完不到几天，左权将军就壮烈殉国了。

1942年7月3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刘志兰撰写的《为了永恒的记忆——写给权》一文，其中有这样的几段文字：“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自然也怀着这不安和悲痛的心情而焦虑着，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在共同生活中，你有着潜移默化力量，我更是一个热情、积极的、幻想很深的青年，在你旁边渐变得踏实、深沉，一面开朗地认识革命事业的伟大规模，一面体验到人生的丰富意义。……或许是重伤的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在任何困难之下，咬着牙齿渡过去。有一点失望和动摇都不配做你的妻子……”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然而，当一个人把有限的生命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那他的生命就会得到永生。^①

（摘自《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删节。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盛爱颐： 中国首桩女权官司

文 | 庄莹

1928年，近代上海“第一豪门”的盛七小姐，将兄长及侄子告上法庭，要求获得同等的财产继承权，是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桩妇女维权案。在这段历史中，中国近代重要的历史人物纷纷登场，时代的影像逐渐清晰。所谓“一门望族，映照一个时代的起承转合”，的确如此。



盛爱颐。

盛爱颐，民国时期著名的女企业家、旧上海最有名的娱乐场所百乐门的创始人，她出身的家庭被称为“近代上海的第一豪门”，她本人被称为“盛七小姐”。1928年，盛爱颐的母亲、盛氏家族的掌管人庄夫人去世，盛氏子孙分崩离析，争抢遗产，掀起轩然大波。盛爱颐把自己的三位兄长以及两个侄子告上了法庭，要求获得同等的财产继承权，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桩妇女维权案。

关于盛爱颐还有个聚焦点。那就是她和宋子文的爱情故事。

彼时，20岁出头、刚回国的宋子文与盛爱颐相遇相识，互生情愫，却遭到盛爱颐母亲及家族的反对，最终各自转身。

在这段历史中，中国近代重要的历史人物纷纷登场，时代的影像逐渐清晰。所谓“一门望族，映照一个时代的起承转合”，的确如此。

❖ 出轨的帝国

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龙年。

是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僵持阶段，无暇顾及远东时局，中国工商业界利用此短暂的空隙，大力发展实业，实业救国盛极一时。

然而在这一年，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盛宣怀撒手

人寰，招商局因此下半旗三日致哀。

盛宣怀，祖籍常州，生于1844年。据说那年春天，祖父盛隆梦见老宅枝头红杏灿烂如锦，依稀香暗渡，引为吉兆。结果，当年儿子盛康不但进士及第，还喜得贵子。于是，祖父便给盛宣怀取字号“杏荪”。

1844年，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中，还有一位后来被慈禧称为“再造玄黄之人”的李鸿章，只是这一年21岁的李鸿章虽作《入都》诗十首，抒其“意气高于百尺楼”，却最终科考落榜。

中了进士的盛康，先是任知府，后治水赈灾，大营粮仓，职掌盐务，督办粮道，走的也都是经世致用的路线。1867年，盛康的父亲盛隆去世，按照礼法律例，朝廷官员的父母若去世，要回原籍居丧27个月，称为“丁忧”。于是盛康辞官护送盛隆的灵柩回常州。而这时候，任江苏巡抚的是曾与盛隆同年科考的李鸿章。

27个月的丁忧，盛康先是在常州开了典当行，又开起了钱庄，最后索性告老还乡，在姑苏购得刘氏寒碧山庄，修葺后改名为“留园”。

于是，休辜负清风明月，佳晴喜雨，涵碧清歌，宴饮山林，可胜饮尽江南酒？

常州盛氏，成为江南大户。

盛宣怀三次乡试均名落孙山，仅中过秀才，后放弃科举之途，入李鸿章幕府，协助李鸿章督办洋务，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作为“中国实业之父”，他开创了诸多的第一，比如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第一家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与此同时，盛宣怀还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和第一所官办大学——北洋大学堂。

盛宣怀共有妻妾六房，八儿八女，家族联姻，互相依附，可谓近代上海滩最大的豪门显贵，势倾朝野，富可敌国。

盛宣怀去世的这一年，盛家七小姐爱颐，时年只有16岁。

按照家乡的风俗，盛宣怀的灵柩在老公馆停放一年后，于1917年冬至，举办了轰动上海滩的“盛杏荪大出丧”，一个时代渐成背影。



临行前，宋子文愿盛爱颐抛开家庭与世俗观念随他南下。但也许爱情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轰轰烈烈，以身试海，直到万劫不复，或者爱情原来只是在现实中辗转反侧之后说出的那个“不”字。



在盛宣怀的长房孙女盛佩玉的记忆里，看祖父“出丧的人多极了，天勿亮便在街上等着，一路的商店楼上也挤满了人，路角上人像堆起来似的，连外省的也闻风而来……出殡的仪仗，花花绿绿，捐旗打伞，好像出会”。

同样是在1917年，宋子文留美归国。

一个盛大出丧，一个平淡回沪。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擦肩而过。

历史在追忆中，重新赋予旧日往事诸多意义。许多变革性的日子，当时经历也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一天。

出身于普通中产家庭的宋子文，其父宋嘉树，幼时家境贫寒，辗转于各国：9岁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当学徒；12岁随堂舅旅居美国，并追随堂舅改姓氏为宋。在美国的宋嘉树，做学徒，夜读书，并接受基督教洗礼，在神学院毕业之后，又回到上海。他在兴办实业的同时，传播《圣经》。此生，有两件事让宋嘉树付出了他全部的热情与无私的支持：一件是基督教义，另一件便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结识孙中山后，宋嘉树成为孙中山的挚友以及国民革命的重要财力支柱。倾囊相助，于他，不过是赤心用尽为知己，何用悠悠身后名。

回国后的宋子文任职于汉冶萍公司，担任上海办事处秘书。汉冶萍公司作为盛宣怀一手督办、创立于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此时的总经理是盛家四少爷盛恩颐。盛恩颐与盛爱颐同为庄夫人所生，前面三房兄长均早夭，所以盛家老四实为长房长孙，自哥伦比亚大学留美归国，便接手汉冶萍公司。

彼时的宋子文，也不过是在美国主修经济、各课程平均分数是B的普通学生，正在经历着前程茫茫的20出头的几岁。1917年，人物悉数登场，只待传奇开讲。

❖ 朝荣夕卒，尽为常也

盛宣怀的第一位夫人姓董，名舜畹，与盛宣怀

同是常州人，典型的大家闺秀。她读过私塾，笔法秀逸，行间玉润，与盛宣怀共同生活了16年，1878年因病去世，遗下三子三女。此后，盛宣怀的爱妾刁氏承担起了家政。刁氏出身青楼，虽深得盛宣怀喜爱，却至死都没有得到盛氏家族的认同。刁氏去世后的1891年，盛宣怀续弦，迎娶常州望族庄毓莹的千金，庄小姐成为盛宣怀的第二任夫人。

常州庄家，书香世代，诗礼传家，祖上多科举名士。

庄夫人名毓玉，又名德华，比盛宣怀小22岁，大婚之时，年25岁，那一年盛宣怀47岁。

庄夫人知书识礼，雷厉风行，精于治家，在盛佩玉的回忆录中，称她“有王熙凤的手段”。

“毓玉、德华”，两名一柔一刚，庄夫人对外常用“德华”这个中性化的名字，甚至给夫君盛宣怀写信亦是如此。

1911年，辛亥。5月8日，清廷成立责任内阁，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十三人中，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四人，这是一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盛宣怀是四名汉族内阁成员之一，官场势力达到顶峰。

清廷内阁组成后的第二天，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邮传部管辖，而邮传部尚书正是盛宣怀。同月，盛宣怀与英、德、美、法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600万英镑修路的合同，但很快便遭到了各地的反对，保路运动由此爆发。为镇压保路运动，清廷出兵镇压，防务空虚，于是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暗中准备策划起义。1917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迅速响应独立，清王朝统治土崩瓦解。盛宣怀无意中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成为大清王朝的第一个掘墓人。铁路收归国有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件，各省代表纷纷攻击盛宣怀激怒民变。

同年10月25日，清政府内阁资政院召开第二次会议，“不杀盛宣怀不足以平民愤，不开国会不足以谢天下”的呼声不绝。盛宣怀当夜撰写替自己辩白的奏折，到第二天天亮，奏折还未写完，朝廷

的旨意已到。盛宣怀成为替罪羊，被革除了邮传部大臣的职务，永不叙用。侍君之畔，朝荣夕卒，尽为常也。

圣意之下，盛宣怀仓皇逃亡日本，留给庄夫人的是一个四面楚歌的盛氏家族。

然而，辛亥时期的清朝，已不是一个替罪羊可以挽救的。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幸而，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与盛宣怀往来密切。盛宣怀被朝廷革职逃亡日本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都主张对盛宣怀家产进行保护。同年10月，流亡日本的盛宣怀以支持袁世凯办实业为名回到上海。

此时的盛宣怀，年老体衰，已没有太多精力顾念这个越加庞大的家族，于是盛公馆中一切事务都由庄夫人一手操办。

1916年，盛宣怀去世，庄夫人执掌整个家业。遵照遗嘱，用盛氏遗产的半数，计580万两银子，成立名为“愚斋义庄”的基金会，规定不动本金，只用利息，用于家族事务和慈善事业，以维持盛氏家族的延续和发展，另一半的遗产则由盛家五房子孙分拆。

中国人讲“富贵传家，不过三代”，个中原因既有家业传承之艰辛、家风谨严之易衰，另外还有多子多福的观念，长辈过世后，家产便会分割，家族的离散使得家业很难维持当年之盛况。

❖ 临行的金叶子

盛宣怀去世之后，盛家尚有三个未出嫁的女儿，五小姐关颐、七小姐爱颐、八小姐方颐。盛家向来有开风气、求西学的传统，于是“在汉冶萍公司的外文书记宋子文介绍了自己的大姊宋霭龄来教她们英文”。

盛恩颐奢侈成性，挥霍无度，日夜颠倒，沉迷

于大烟和豪赌，于是作为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秘书的宋子文，便时常出入盛家大宅，寻四少爷盛恩颐审批文件。因缘际会，便与七小姐爱颐从偶有照面，到互见欢喜。

他带来枝叶繁茂的大千世界，她脂粉盒里放置的是那些旧掉的昨日雍容。他们的过去互无交集，相去甚远，带着彼此陌生的人生经验，狭路相逢。

1917年，与君相逢于微时。君有情，卿有意。

庄夫人共育有个三子女：儿子盛恩颐、盛泰颐，女儿盛爱颐。七小姐是庄夫人唯一的女儿，在得知宋子文的家世后，庄夫人对二人交往之事坚决反对。

不久后，宋子文被调离沪上。一个简单粗暴却易行的方式。

宋子文调任汉冶萍公司汉阳总公司会计处科长，数月之间，父亲宋嘉树逝世，留下的家产虽足

以维持小康，但绝谈不上巨富。此间距离，怎是汉阳到上海的天高路远可以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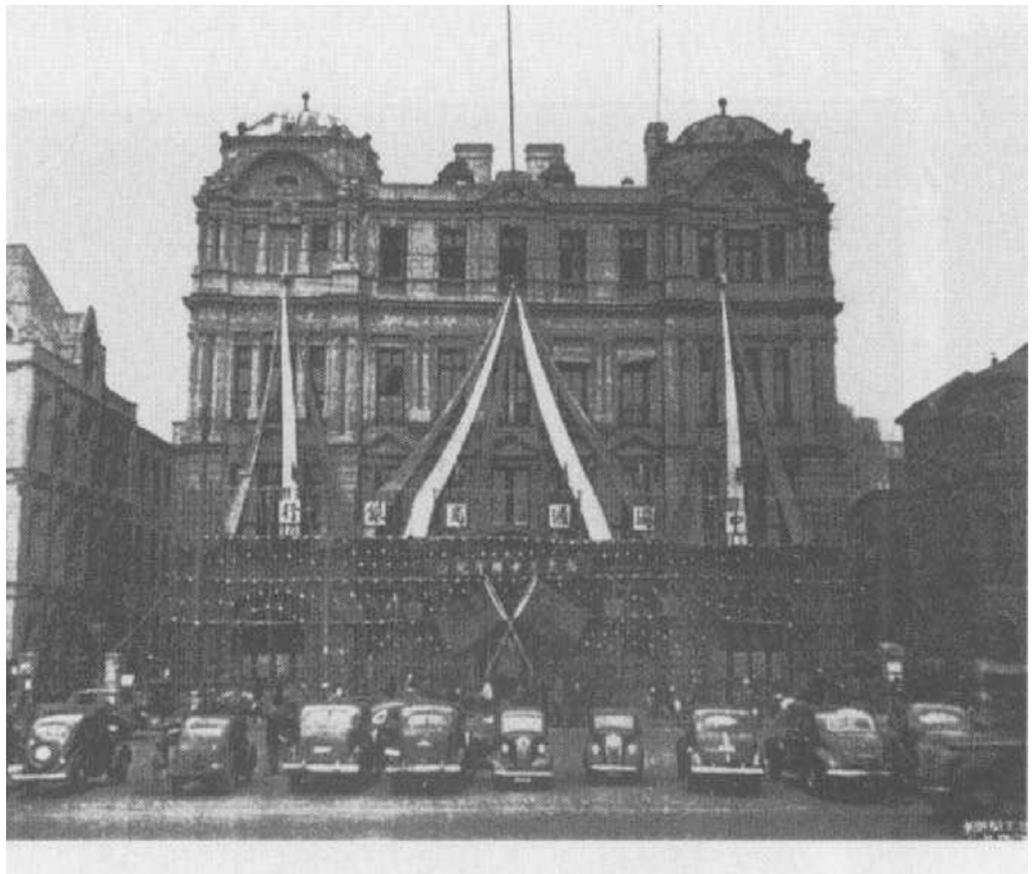
此后，宋子文从汉冶萍公司离职，重回上海，却不过是辗转于各实业公司与金融公司之间，事业颇多坎坷，归国已逾六载，不见起色。

她只静待，甚至几乎忘记自己在等，所以心安也笃定，一等六年。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宋子文由二姐宋庆龄引荐，出任孙中山秘书。

这一年的宋子文，才真正开始踏上历史的大舞台。

临行前，宋子文愿盛爱颐抛开家庭与世俗观念随他南下。但也许爱情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轰轰烈烈，以身试海，直到万劫不复，或者爱情原来只是在现实中辗转反侧之后说出的那个“不”字。



20世纪初期，上海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银行，成立于1897年5月27日，创办人是盛宣怀。

他走，带着盛爱颐送他的一把价值昂贵的金叶子；她留，深信各自要走一段寂寞的长途，但终究还会相遇。

1925年，与北洋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宋子文任财政部长；1926年，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不设主席，宋子文成为五位常务委员之一；1927年，国民革命军攻克上海和南京，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统一了中国的半壁江山；1928年，革命军进入北京，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全国统一宣言。

南下之后的宋子文，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任职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长，位高权重，无限风光。

此前仅有数月间，盛爱颐的母亲庄夫人去世。

庄夫人掌管盛氏家族十一年，这11年间的世态炎凉，亦全赖庄夫人以一当百，宠辱不惊。庄夫人去世后，盛氏子孙分崩离析，争抢遗产，掀起轩然大波。

❖ 中国第一桩女权案

他正如沐春风，她恰如履薄冰，彼此的浩瀚往事都未曾共同经历。

庄夫人去世之后，盛家才是真正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原本按照盛宣怀遗嘱，将一半遗产归入“愚斋义庄”，另一半分割，也便相安无事。但老四盛恩颐无视父亲遗嘱，向法院提出，要将早已归入“愚斋义庄”用于慈善基金的遗产，由盛氏五位男性子孙均分，分别是老四盛恩颐、老五盛重颐、老七盛升颐以及孙子盛毓常和盛毓卹。于是，1928年，盛爱颐把自己的三位兄长以及两个侄子告上了法庭。

按照中国传统家族观念，女子没有财产继承权。虽然辛亥革命后，男女平等，政府法律条文已明确女子也有继承权，但观念上的摧枯拉朽，在现实中往往拖泥带水，具体实施绝非如法律条文那么轻易。

盛家遗产案，成为中国的第一桩妇女维权案，其变革性的意义远远超出盛氏家族内部的矛盾问

题。此案在报界一经曝光，即刻引起极大的反响。盛爱颐，成为第一个打女权官司的现代女性。

开庭之日，盛况空前。盛爱颐依据民国法律关于男女平等的条款，以及第二次国大妇女运动决议案中的有关条款，认为未嫁女子应有与其胞兄弟同等继承财产的权利，未出嫁的盛爱颐与八小姐盛方颐均属有继承权之列。

盛爱颐维护女权一案，得到宋美龄及宋庆龄的鼎力支持。最终，盛爱颐胜诉。根据法律，法庭认为盛爱颐拥有与盛家男性子嗣平等的权利，判决将“愚斋义庄”财产均分为七份，盛爱颐得其中一份，



按照中国传统家族观念，女子没有财产继承权。虽然辛亥革命后，男女平等，政府法律条文已明确女子也有继承权，但观念上的摧枯拉朽，在现实中往往拖泥带水，具体实施绝非如法律条文那么轻易。



赢得了社会意义重于金钱意义的五十万大洋。

同在这一年，自别后5年，宋子文再次重回沪上，选址上海建立国家银行——中央银行——以代理国库、发行纸币。十里洋场，由此也就无可争议地成为远东金融中心。

1928年11月，中央银行在外滩15号举行开幕仪式。当日，宋子文的母亲倪桂珍也应邀前来，此前，她刚刚参加过大女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主持的国货展览会。会后赶赴外滩出席中央银行开幕仪式，陪伴在侧的是大女儿宋霭龄、小女儿宋美龄，还有儿媳张乐怡。仪式上，国民政府



1937年11月上海沦为孤岛后，宋子文全家随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至香港。这是宋子文夫妇在香港的合影。

主席蒋介石向宋子文授中央银行总裁印。

1928年，蒋、宋、孔三家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势头，在这一天，一览无余。

一别经年，重回上海滩，位居财政部长之位的他，陪伴左右的是新婚夫人张乐怡。

此前一年，在庐山避暑的宋子文，结识了庐山当地建筑企业老板的膝下千金。此时他已极盛，张家父母自然乐于成全。1928年秋天，宋子文与张乐怡喜结良缘。

罗敷未有夫，使君已有妇。

当时离散，未说出的那个“等”字，一个收，一个放。

或许门当户对并不重要，但又或许只有门当户对，才有爱与被爱的平等和底气。

盛爱颐为此大病一场，直至1932年，时年32岁的她才与庄夫人的内侄庄铸九完婚。

原本以为不可或缺的人，不知在哪个路口，走着走着竟就散了。前尘往事，换一句得之坦然、失之淡然。

❖ 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盛爱颐完婚的1932年，由其提议，商人顾联承投资白银七十万两，在上海静安寺附近，建造海上繁华的“百乐门舞厅”，成为“东方第一乐府”。

百乐门为Para mount Hall的谐音，原意为至高无上。风月温柔乡，夜夜笙歌，演绎着十里洋场的声色犬马。

1933年2月16日，《申报》用一个整版记录了百乐门开张时的盛况。

当时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吴铁城亲自出席发表祝词；一个外国人写道：“白色的大理石旋转楼梯通向大舞厅，阳台上另有一个舞池，玻璃地板，下方有脚灯，让人感到像在鸡蛋上跳舞。表演合唱的是俄国女子，她们穿戴很少：帽子、浅帮鞋和非常细的腰布。”

盛爱颐成为中国第一位涉足娱乐业的女企业家。百乐门建成后，即作为上海最负盛名的豪华娱乐会所，成为贵族阶层生活的一部分。

隔江犹唱后庭花，乱世自有乱世的活法，豪赌狂饮狎妓大烟，也不失暗度光阴的一种方式。

盛宣怀此生有一嗜好，唯爱藏书。哪怕避难日本，遁入困苦之境，依然不坠读书兴致，常赴公园各图书馆博览群籍，叹为观止之余，在日本大肆购买医学、经济等类图书，千余种，万余卷。盛宣怀的愚斋藏书楼，拥有典籍十余万卷。1933年，在宋子文与盛爱颐的共同努力之下，盛宣怀生前藏书六万六千多册捐赠给了圣约翰大学图书馆。^①

（摘自《民国胭脂和她们的时代》山东画报出版社，有删节；除标注外，图均由出版社提供）

百年前，西方人的中国漫游（一）

◎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古老的中国尝试打开大门，一些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而同时，一些西方人也飘洋过海，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这块陌生的国土及其上芸芸众生，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生物学、人类学理论知识，带着在当时的西方也尚属新奇的相机，探索着这片大陆——地理、地质、历史、生物、社会……

◎ 他们考察贵州的少数民族，也研究台湾的语言体系；他们去到三江并流之地，也攀登雪山，跋涉进入西藏，他们所走过的偏僻之地，甚至连当时的中国学者也甚少涉足。他们写文章，写书，寄出标本，甚至以“小狗”的名义寄出活体的熊猫，中国的植物从此在英国皇家的植物园——邱园落地生根，而熊猫也成为整个世界的最宠爱的动物……古老、悠久、丰富、多样的中国慢慢为外界世界所知。这些漫游者，打开了一扇门，中国走了出去，世界走了进来。

丁韪良：游历大中华帝国

文 | 绿衣

在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之后，在中国居住半生，四处周游的西方人就很少了，而大中华帝国的核心北京更是少有西人探访。1869年，来自美国的丁韪良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光绪皇帝授丁韪良二品顶戴，他或许可算清初耶稣会传教士之后，第一个在中国政治体系中拿到官职的西方人。同时他也借自己身份、语言之便，四处游历，是以西方之眼描述、传扬中国地理历史文化的西人代表。



两个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乡村的兄弟于1849年11月23日开始了去往中国的漫长旅程，其中的一位就是W.A.P. Martin，后来他有了中文名字，叫做丁魁良。

其时，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是遥远而荒蛮之地，来到这里的除了外交人员，就是商人和传教士。丁魁良正是为传教而来，他的大姐在1834年随丈夫去非洲传教，从非洲的来信中常常谈到在非洲的传教工作和旅行，对丁魁良影响很大。而当1839年，英军隆隆的炮声使遥远的中国“外部城墙”轰然倒塌，丁魁良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决定来此一探究竟。

丁魁良和哥哥及各自的妻子在海洋上经过143天的航行，1850年4月到达香港。从冬季漫长、寒冷而干燥的印第安纳来到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城市香港，这群年轻人都很兴奋，马上利用短暂停留的时间四处探访，丁魁良早晨出门去攀登海拔两千多英尺的维多利亚峰，这种亚热带气候的山和故乡的山风格迥异，他被“似乎一直延伸到山顶的地毯般的绿色草地”迷惑了，以为很好爬，走到近前才发现那些草地很快变成了覆盖了各种植物的陡峭悬崖，他不得不脱掉皮鞋，攀援而上。

这对兄弟本该被分配到澳门，但由于澳门唯一的长老会传教士去世，无人带领，丁魁良兄弟被重新指派到宁波传教点。澳门毕竟是从17世纪作为通商口岸而渐渐繁荣起来的城市，宁波则是历史深厚的传统中国城市，这样的分配让他们有了深入体验中国社会的机缘。

❖ 乘舢板的海途

在香港短暂居留后，哥哥S. N. Martin选择乘客轮去宁波，而丁魁良为了尽可能了解中国情况，选择乘坐舢板。等待航船时，他们乘坐着一艘小汽轮沿珠江溯流而上，访问广州。广州的一位传教士哈巴安德在这里迎接，他们一行人坐着一条“由一个大脚女人摇橹的小船”，穿越密林般的

中国式帆船，前往哈巴安德的家。丁魁良初见中国水上家庭，颇为好奇，他这样描述道“这条船其实是个住家，一家人挤在后舱里，前舱甲板上铺着干净的垫子，还插着花”，他还发现生长在船上的孩子与众不同：“出生在这些船上的婴儿深谙水性，据说他们第一次被扔进水里时就会游泳，但是为了防止意外，他们的背上绑着一对竹板，以便其父母能随时把他们从水里捞出来。”

当时即使是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广州，也甚少见到洋人，所以当他们上岸时，有一大群人围着他们喊“蕃鬼，蕃鬼！杀头，杀头！”当丁魁良从惊慌中定下心来，开始打量周围的环境：在暑天完全被凉棚所覆盖的街道实在狭窄无比，路面铺着石板，街上因悬挂形形色色的招牌而显得琳琅满目，招牌上的汉字符号具有图画的效果。这是他对中国城市街道的最初印象，同样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将城区团团围住的石头城墙、偶尔一见的宝塔、两条大河以及远处隐约可见的白云山。

他们的海上航程不停地在中途城市停留，他也顺便拜访当地西人或传教士，他在厦门、福州停留过，还在许多小地方也逗留一下。在丁魁良眼里，厦门是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他还拜访了鼓浪屿，这个小岛在他当时游玩时还没什么人，而后来成为外国人的居住区，建起各种漂亮的别墅。后来，他们的船驶入了闽江，向北直奔福建省的省会福州。他评价福州“是中国最干净和建设最好的沿海城市之一。”在福州，他坐着轿子在城墙顶上走了一圈，并幽默地写道“我对骑在别人脖子上的方式深为反感，然而十英里的徒步旅行使我消除了原有的顾虑”。

在福州渡过了愉快的一周后，他又继续海上的航行。但出海第一天他们的三桅帆船就遇上了风暴，船上的主桅杆“咔嚓”一声被狂风刮断，船被迫折返福州重装桅杆。终于，他们在1850年6月26日抵达宁波。至此，他们在海岸线附近的大小岛屿中穿梭而行，整整花去了35天时间。虽然旅途艰辛，却真真实实看到了中国沿海城市、

1865年前后的浙江宁波港。当时宁波市区已建起洋房，泊在港内的CHUSAUHAO号汽轮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客运汽轮。图/FOTOE

乡镇的风土人情，留下了很好的最初体验。

❖ 宁波·在浙江省的游历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2年，最初10年是在宁波度过的。他在《花甲记忆·对宁波的最后印象》中说：“宁波，我在这里找到了毕生的友谊，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中国知识，也写出了一些我最好的作品。”确实，在宁波，他详细考察了中国的文化、民俗、经济、宗教、军事，广泛接触官员、士大夫、市民、农民、游民等各阶层中国人，学会了清朝官话和宁波话。

宁波，这个坐落于宁绍平原、依山靠海的小城，也给了丁韪良很好的认识中国的机会——作为“五口通商”城市，宁波开埠很早，较为开放，而宁波又是积淀深沉的历史古城，在这里能够接触到传统中国文人、官员，老百姓，附近还有村庄、小镇，既有山峦，又有海岸线，沿着大运河，还可以轻松去往杭州、绍兴等城市，是个了解中国的好起点。

他在宁波待了十年，在他的教会里他是个异类——偏不肯住在城外的教堂，而要租间房子住在城市里。深入民间使得他很快熟悉了宁波的大街小巷，传教之外，他开始在宁波附近进行了一些短途旅行。去周围的乡村，既为了传教，也为了欣赏风景——有时他会沿着一条晶莹澄澈，可供小船航行的溪流漫步；或是走入青翠的群山，山坡上覆盖着高高的杉树林，不时夹杂着一簇簇呈羽毛状的毛竹。这样的风景在浙江省内司空见惯，但对从印第安纳来的年轻人来说却是新奇又新鲜的。他的另一次旅行是去奉化，他这样描述“那儿好斗的山民据说还对洋人深怀敌意，就连我的汉语老师鲁先生也不敢陪我去”，但他以自己惊人的适应能力，竟然在奉化郊外一个木结构的、年份在800年左右的古庙里安顿下来，甚至还在古老的贡院、村里的始祖庙和戏台上讲起了福音。丁韪良还去了杭州，归途中，他探访了绍兴城，并将这座城市和威尼斯比较：“运河变成街道。船只是普通的交通工具。”

他对历史、文化甚感兴趣，来中国之前，丁韪良已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他自认为自己很有语言天赋。的确，他也被认为是最快学习中文的外国人之一，他很快学会了宁波话，不久甚至开始用宁波话传教。语言的通畅使得他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他在传教之余阅读儒家经典，并且不放过拜访任何具有文教意义的历史遗迹，去过“绍兴城外一英里左右的大禹陵”，那里有一块石碑用蝌蚪文记录了大禹的功绩；还游览雪窦寺，认为雪窦寺的瀑布“堪与美国的约塞米



当时的度假不似今天，而是充满惊奇和冒险。1855年，他们在普陀山的度假曾经遭遇海盗，结果海盗听说他们是传教士，同意放走他们，还送给了他们一盒茶叶。



蒂瀑布相媲美”，还去过许多其他名山古刹。

对于来自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来说，中国南方的夏天酷热难当。所以夏天找地方避暑是不错的选择。莫干山、庐山都曾成为在华西人的避暑胜地，而当时宁波的传教士们常去的避暑胜地之一是舟山群岛的定海，在那儿他们除了能够吹到海风之外，还能经常洗海水浴。有时他还会携着妻子去普陀岛上躲避一阵子。在他的描述里，“普陀岛周长约有九至十英里，其中最高的佛顶山高达三千英尺。在面对海滩的寺庙里，有一座高大的殿堂，殿内的柱子上雕刻着飞翔的巨龙。”“这里是佛教圣地，就



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时的丁韪良在他的住所。丁韪良曾担任京师大学堂负责人。京师大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校址原为和嘉公主府（四公主府），辛亥革命（1911年）后改称为北京大学。图/FOTOE

像古时候的艾欧纳和如今的圣山那样，它完全是僧侣的领地，当地妇女不准以任何借口住在岛上。然而这一条戒律并不适用于外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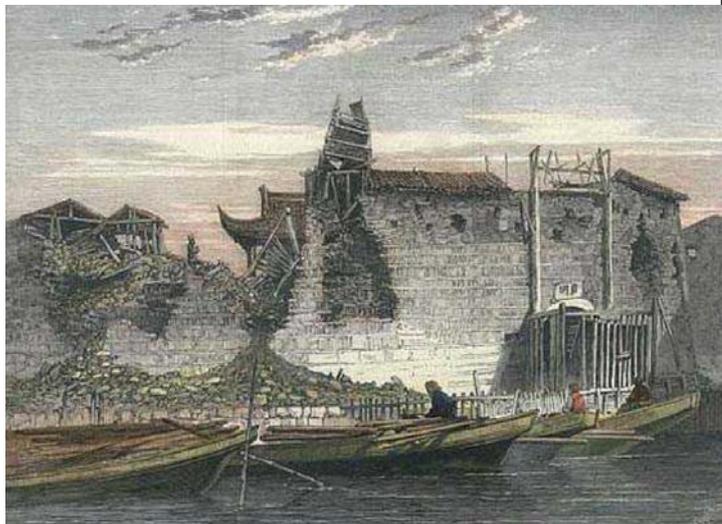
然而，当时的度假不似今天，而是充满惊奇和冒险。1855年，他们在普陀山的度假曾经遭遇海盗，结果海盗听说他们是传教士，同意放走他们，还送给了他们一盒茶叶。

对于当时传教士来说，中国是个神秘莫测之地，他们也能找到各种奇奇怪怪的方式来享受他们在这片神秘土地的日子。有位传教的女士因为不愿离开学校去海边避暑，经常爬上九层高的宝塔顶端，坐在那里，呼吸海边吹来的清风，度过漫长的午后时光。丁韪良也有个爱好，就是在城墙上骑马——这种看起来“大不敬”的活动在他眼里是正得其所——宁波的城墙有二十至三十英尺高，周长六英里，用巨大的花岗岩块筑成，因时间久远而呈灰色，城墙顶部开阔，正适合骑马，他有时就雇了清兵的马，在城墙上来回驰骋。直到晚年丁韪良仍然非常怀念他在宁波的日子，认为他在宁波度过了一生中最容易感受新鲜事物的十年，并称宁波是一个“尽管缺点很多，但我爱你始终不渝”的城市。

❖ 北京时光

但宁波溽热的天气让丁韪良和他的孩子都觉得有些身体不适，短暂去美国休假后他决定去北京。1858年丁韪良给美国使团担任翻译时，曾经去过北京和天津。他很喜欢北京的气候，并希望把宗教带进古老帝国的的心脏。

1960年，丁韪良去往北京，先是借住在一个寺庙里，后在卫三畏（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被称为美国“汉学之父”）和一位官员帮助下租下房子，作为自住并开办家庭教堂。和宁波相比，北京作为当时中华帝国的首都，有更多政治和文化上的意义，他这样描述北京“北京居于两座呈抛物线形状的山脉焦点上，一座山脉与蒙古高原擦肩而过，向东延伸至渤海湾，另一座则从西北高原向南延伸



大约四百英里，到达黄河沿岸。它们层峦叠嶂，就像绿色海洋上翻滚的波涛。”

这时的北京只有少数外国使馆人员和传教士，如赫德、蒲安臣、卫三畏、施约瑟、德贞、艾约瑟、包尔腾等。他们经常去西山和八大处避暑，据丁韪良称这是“京师附近最美丽的山谷”，“现在这些庙宇逐渐衰败，善男信女逐渐少了，因此寺僧也乐意把宽敞的客房租给外国人，以获得较好的收入。”西山的三山庵是美国公使馆的避暑胜地，英国使节则居住在“灵光寺”附近。丁韪良很喜欢中国式的庙宇，“兴建它们的和尚都有很高雅的情趣。登临其上，一切都豁然开朗，可以远眺远处群山环绕的巨大平原，偌大北京城及其闪闪发光的宫殿是最引人注目。”

他趁着在北京的时间，周游北京名胜古迹，长城、天坛、雍和宫、汉白玉桥、清真寺、十三陵、黄寺、大钟寺、小汤山温泉……他认为除了天坛之外，最让人流连忘返的景色莫过于京城殿宇里的汉白玉桥和郊外颐和园的万寿山。在汉白玉桥上可以

欣赏到各种美丽轻盈的东方建筑，而在万寿山上则可以俯瞰美丽的昆明湖。

他和京都文人士子关系甚好，因此还得以参观国子监，而长城更是常去之处。在十三陵，他看到“陵墓的神道上排列着人形和兽形的各种巨大石雕。明朝皇帝永乐的陵墓要比其他皇帝的规模更为宏大，中国人用从暹罗购买的柚木来施工，就像所罗门王从黎巴嫩取得雪松木一样。”

❖ 开封寻犹太人后裔

当时有传言河南开封有个犹太人居住社区，丁韪良对此非常感兴趣并前去考察，顺便参拜孔墓。

1866年2月2日，丁韪良从北京出发，花了四周时间在中国的中原地带穿行，然后渡过了黄河、沿着大运河和扬子江来到上海。那时，这条路是欧洲人从未涉足过的道路。

犹太人的居住地开封距离北京450英里，丁韪良租了一辆两头骡子拉的板车，把行李和一个仆人

01 | 02

01

1901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居中的外国人）和教员在北京和嘉公主府（四公主府）梳妆楼前合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和嘉公主府（四公主府）成为京师大学堂。图 / 江南 / FOTOE

02

以桑德斯照片为蓝本所绘制的铜版画，宁波南门瓮城。载1862年8月2日的《伦敦画报新闻》。

安置在车里，自己则骑着马，在旁边紧紧跟随。他要寻访的在中国的犹太人据说在古代就来到开封，是17世纪被耶稣会教士发现的。1850年，麦都思博士曾派遣一个中国基督徒使团来到这里，劝说了两个犹太人来到上海。但直到丁韪良的旅行，欧洲人已经有两个世纪没有到过那里了。

到了开封，他好不容易找到了“有以色列血统的人。”这里一共有七个犹太人家族，他们的教堂年久失修，却没有维修的钱财。他们也不会说希伯来语了，祖先的风俗和礼拜仪式也已经失传。屈服于现实的压力，把圣殿的木材和石头都用于自己遮风避雨之需了。丁韪良从他们手里得到两本极珍贵的希伯来文经卷。但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开封犹太人已成为族系中的“孤儿”，不出五十年将会被完全同化。事实印证了他的预言。

离开开封府后，他向东北一直行走，花了八天时间，最终到达曲阜。他记述到道“这八天里我两次渡过黄河，行走的路线基本是沿着黄河的新河床。”他描述自己看的黄河的感觉“我首次看到黄河的时候非常失望，河流蛰伏在两岸之间，流量不到长江的二十分之一。正是干涸期，水位很低，艖公用竹篙就可以来回撑渡。面对它，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面对的是东方最主要的河流。只有那些巨大的堤坝才使得我意识到它的地位。”

曲阜的孔墓则位于城外，由一条两旁种满雪松的林荫道相连，这条大道叫做“神道”。丁韪良在参拜孔子时遇到一群年轻人向祖先之灵行礼，门房请他到旁边庭院去呆一会儿，直到典礼结束再进去参观。院子里森森的柏树使得他很受震撼，“尤其是其中有一棵据说是圣人亲自栽种的，已经有两千年之久”。另一个院子里有各种碑林，都是由皇帝竖立起来的，有些甚至可以上溯到汉、晋、魏，这些古老的石碑时光磨蚀了它们的外表，字迹已经模糊。他还参观了藏书楼，他描述道“这里并没有贮满书籍，相反却成为无数鸽子的栖息地。”

丁韪良为在华西人中笔锋颇健的一位，他曾担任《纽约时报》的特约记者，写了不少文章，介绍

蒲安臣使团、黄河、开封犹太人、北京同文馆、同治大婚等等。作为西方世界广泛认可的“中国通”，他的著作是当时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一大途径，他的旅行通过著作，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窗口。1880年，他出版了自己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英文著作：《翰林集》。后来又陆续出版了《汉学菁华》《花甲忆记》《北京之围》《中国之觉醒》等书，其中最后一本完成于1907年，其时，他在中国所度过时光已经超过六十年，也就是一甲子。

在他的著作中，他夹叙夹议，将自己的旅途融入对中国历史地理的分析评论之中。1916年12月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此后他被葬在西直门外的传教士墓地中，与他的妻子葬在一起。作为一个在中外交流舞台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交流者，他并没有留下太多照片，亦没有留下多少遗物——他的很多书籍和笔记，在义和团事件中被毁。但是他的一生，无疑将中国和世界拉得更近。

编后语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超过了60年，期间历经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民国建政等重大历史变迁。他曾长期担任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新学教育机构——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使他有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然而，丁韪良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他究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这个问题迄今还存在着很多争论。有学者直指丁韪良是“反动的美国传教士”“帝国主义分子”，最为人所诟病的两件事是：其一，参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两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其二，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时期，他始终致力于给美国政府提供带有分裂色彩的政治建议。

这篇文章没有陷入对丁韪良的政治评价和讨论中，而是力图从丁韪良在中国的游历中去找寻百年之前西方与中国在文化方面的碰撞和激荡，从这个层面上讲，丁韪良是个合理的突破口。①

厚历史 Thick History

/历史的细节/

70年前的红色影像

厚历史版块编辑：蔡丽萍
邮箱：2010025743@qq.com

虽然 20 世纪上半叶是一段战乱纷扰的岁月，但仍然有一批中国摄影人，经历了红军时期、长征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坚持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着历史的细节，使我们有机会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望那些战火硝烟中的瞬间，感觉那些曾经鲜活的真实。

这批摄影人以沙飞为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摄影武器论”，发展出独立且风格鲜明的摄影语言，培养了大量的摄影人才，建立了完备的报道摄影体系，构成了中国摄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摄影作品记录的不仅仅是与共产党发展成长过程相关的人与事，更是历史长河中无数普通人的平凡的身影，他们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国家的兴亡、民族的自强，默默地倾尽所有，甚至是牺牲生命。如果没有这批奔走在前线的摄影人将这些普通人作为“镜头前确实存在过这些被摄物”记录下来，那么这些平凡身影的不凡贡献，将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模糊淡化，也将没有人记得，照片上的战士、民兵、儿童团员、妇女自卫队都是确实存在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冲锋、撤退、抢救伤员、支援前线都是在中华大地上发生过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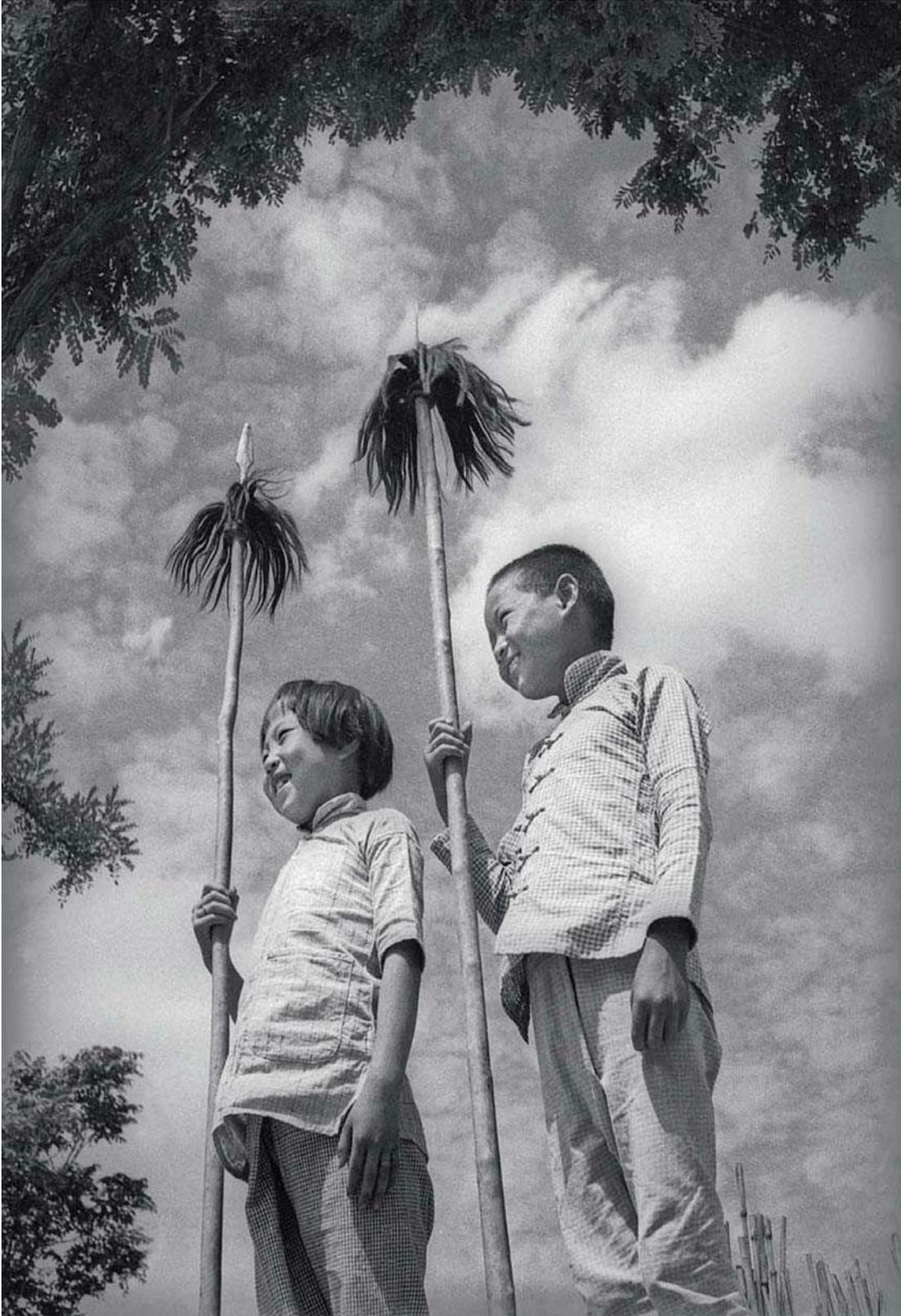
（摘自《红色影像》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图片由后浪出版公司授权提供）

✎ 切断敌人补给线

李峰跟随部队到山西忻州南边的铁路沿线执行破路任务。铁路两边是敌人的碉堡，部队先把碉堡围住，民工用仅有的两把土造大铁钳拧开道钉。拍照前指挥员特别告诉民工，拍照时会有“火光”，这是自己人点的，不要惊慌，不能乱跑。拍照时，李峰打开相机快门，团政治处主任林真帮助划火柴点燃镁光粉。镁光粉在黑夜里闪出一片白光，这情景便拍进了镜头。指挥员随即发出了撤退命令，大家推翻铁道，跑步撤离现场，此时敌人的炮弹才对着闪光的地方打来。——李峰《弹道下的闪光》（李峰 1945 年 6 月摄。）









01	02
	03
	04

01

儿童团

石少华在画面的影调与层次方面是十分考究的。此时他到晋察冀时间不长，初到前线，尚未深入下去，作品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深入之后，作品便更多体现出现实主义风格——用现实生活中的细节说话，而非仅仅用影调说话。（石少华 1940 年摄于冀中。）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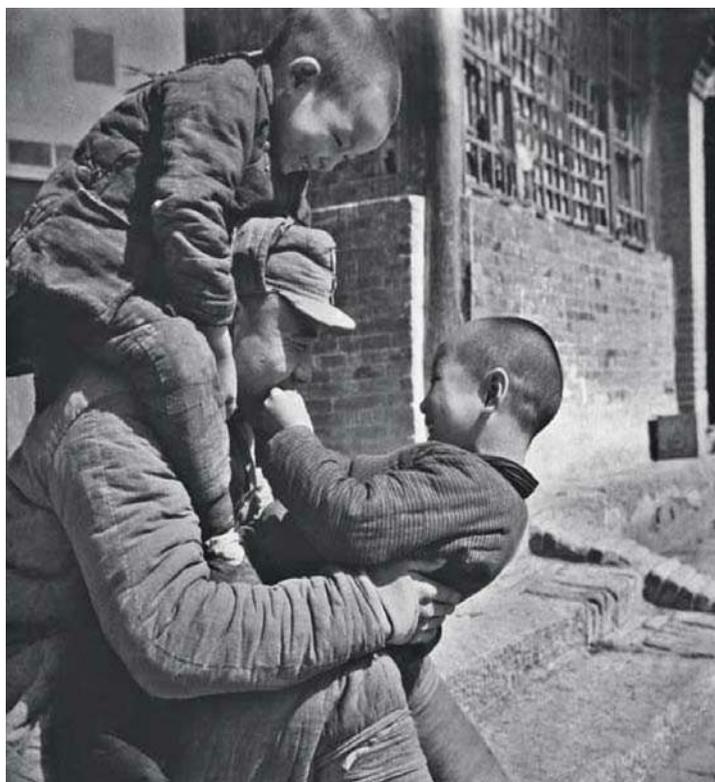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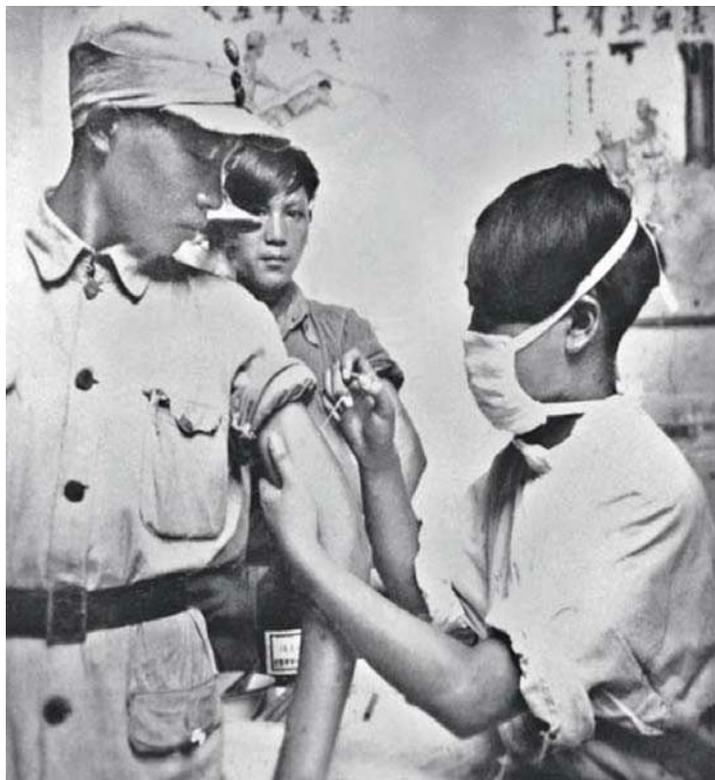
自力更生制造武器。（杨国治 1940 年摄。）

03

冀中八路军在石德路上埋地雷，准备炸日军列车。（流萤 1944 年摄。）

04

三八节大会射击比赛。（沙飞 1940 年摄于唐县。）



01	03
02	

01

卫生训练班种牛痘

这幅作品来自叶挺 1939 年拍摄的《新四军后方医院》组照。1940 年，叶挺还拍摄了另一组《新四军卫生训练班》组照，成为反映新四军医疗工作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叶挺 1939 年摄于皖南云岭。）

02

解放军战士和房东的孩子们。（梁明双 1946 年 6 月摄于河北怀来。）

03

八路军重机枪手据守村落，流萤 1942 年 6 月摄。冀中八路军某部挺进平汉路封锁沟，战斗一天，消灭伪治安军一营。



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继失天下

文 | 王千马

明朝万历年间的《汾州府志》描述：“（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然而，正因为“人多耕织少”，却意外地促成了平遥乃至整个山西的转型。平遥人仅仅以颜料、干果、茶叶、丝绸等杂货便敢行走各地，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走西口”。这让山西商贩遍布全国各地，而“晋商”的名头也由此而来。到了明代，得益于朝廷实行的“开中制”与“开中折色”这一经济政策，晋商迅速崛起，成为明清商人中的重要势力。平遥也因此受益匪浅，历代统治者对这一地理位置颇为看重，常驻扎重兵于此。有兵就有需求，所以商业竟成了平遥的立身之本。

当市场在日益发展与扩大，平遥与外部的接触更为紧密，其所开设的商号遍布全国，甚至足及海内外。这直接导致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长途贸易意味着它的贸易周期比较长，其利润回款的周期也相应比较长，那么，面临如此长的回款周期，就必然要提出相应的、严格的信誉要求；另一方面，因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生意买卖或者长途贩运，让异地结

算成了市场主流。

但要命的是，清朝中后期，在权力的贪婪和压迫之下，农民起义开始此起彼伏，加上灾荒不断，连年歉收，社会变得极不安定，商贾

 日升昌票号旧址，前身为西裕成颜料庄。



鏢銀屢遭搶劫——如何讓外地的銀子能穩妥地落入自己的口袋，或者自己的銀子能安全地抵達外地，顯然成了一個很重要也很普遍的社会問題。人民對錢輕的渴望，也變得尤其急迫。

❖ 雷履泰開創票號

在被李大全收歸到門下之後，雷履泰很快就西裕成挑起了大梁，先後被委任為漢口分號的執事、北京分號的領班。正是在京城一任上，他經常會遇到同鄉找他幫忙捎送銀兩。這些同鄉把自己欲捎的銀兩交到西裕成北京分號，想由分號寫信通知平遙總號，然後在平遙提現。不過他們也覺得，老是這樣麻煩人家也不成，得給人家點“服務費”。這讓雷履泰敏銳地感覺到，專營匯兌是一門大生意。而且，匯和兌之間存在着時間差，還可以拿存進來的資金去做放貸生意，又可以額外賺到一筆錢。正是這些因素的存在，意味着雷履泰開創票號，並非一時頭腦發熱的倉促之舉。他所做的一切，其實是建立在對錢輕的預判的基礎之上。

在和東家李大全協商之後，雷履泰決定利用西裕成分號分布廣，有着比較完善的渠道資源的優勢，帶領西裕成全面轉型做銀兩匯兌生意，並提出用自家的紙票作為匯兌憑證，紙票就叫銀票，新號就叫票號。票號就此走進了歷史舞台，並成為了晚清中國最為重要的金融機構。

雷履泰在1849年去世時，法國人在上海如願以償獲得了自己的第一塊租界，中國正從封建社會逐漸陷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催境遇之中。這也意味着，票號在風光多年之後，得面對模樣逐漸改變的世界。但這些已經與他無關了。如果說他在創辦票號的過程中还有什么重要失誤的話，那就是在1826年，他將自己重要的合作夥伴——毛鴻翔給硬生生地逼成了自己的對手。

事情的經過應該是這樣：有一次，他生了

雷履泰帶領西裕成全面轉型做銀兩匯兌生意，並提出用自家的紙票作為匯兌憑證，紙票就叫銀票，新號就叫票號。票號就此走進了歷史舞台，並成為了晚清中國最為重要的金融機構。

場病，就連休養也一度住在票號內，這讓日升昌的二掌櫃毛鴻翔的處境猶如“丫鬟帶鑰匙——當家不做主”。後來，毛鴻翔只好私下建議財東李箴視，請他回家休養。李箴視是好心，也不知毛鴻翔另有想法，遂如此這般地勸說雷履泰。沒多久，李箴視前往探視，便發現雷履泰在給各地分號寫信件，內容是命令它們暫停營業，準備撤莊。這讓李箴視大吃一驚，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他回答的意思是，“字號是你開的，但分莊是我安的，你現在要用新人，我只好全部撤回來，好交盤給你”。吓得李箴視身為東家，卻屈尊下跪。接下來的數天，李箴視還每日送上一桌上等酒席，並贈白銀50兩作為生活費，這才將他請回來。

然而，毛鴻翔知道，自己在这里干不長了。就在雷履泰回來的前一天夜里，給東家留了封信後，憤然離開了日升昌，投靠了日升昌東隔壁的蔚泰厚布莊。這個布莊是介休財東侯培余所開。因為距離很近，侯培余早從日升昌的身上看到了經營票號的前景光明，正愁沒有人才。沒幾年，毛鴻翔就在侯培余的支持下，一手創辦了“蔚字五聯號”。

日後，他們之間的恩怨依舊不曾停息。也許正是雷履泰為自己製造的麻煩，改變了日升昌一家獨大的局面，讓市場上多了競爭。鼎盛之時，平遙城裡竟然就有票號22家。

如果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這次斗法，你會發現在整個斗法過程中，作為大掌櫃的雷履泰的表現都是很強勢的。這無疑改變了打工者在人們心目中的固有形象。一方面，它跟日升昌離不了雷履泰有關，更重要的是，它跟票號的權力劃分有關。

在票號的權力劃分中，所有權與經營權一開始就是分離的。儘管李氏家族擁有日升昌的產權，但是在經營上，則是掌櫃全權負責。甚至為了不影響掌櫃的經營，東家不能在票號里借錢，即使到票號視察也不能在號里過夜。這種兩權分離，讓經營者和所有者之間有了互相

制衡，而不是完全听命于所有者。正是如此，雷履泰在日升昌中有着独一无二的话语权。不过，对于财东来说，充当“甩手掌柜”并不意味着完全甩手，它实际上是黄老思想中“无为而治”的体现。财东不仅对本号负无限责任，而且对扩充业务、赏罚号内人员和红利分配具有裁定之权。而且，当企业经营失败，经济上遭遇损失时，财东要负全部责任——可以说，正是这一根本性的权力架构模式，给票号注入了极大的活力。直到进入 20 世纪，票号面临着生死存亡，这种权力架构依旧不曾突破。

光绪三十四年（1908），日升昌的新一任财东李五典，三十出头，正年富力强之时，内心里颇不甘心当“甩手掌柜”。在大掌柜张兴邦病危之时，请他举荐后任掌柜人选。张曾建议，如果要想日升昌继续发展，就请选用邱泰基和尹光铎；如果想求得平稳运行，则可运用郭树炳、梁怀文。出于自己易于驾驭的目的，李五典选择了后一种方案。结果自然能想象，除了李五典经常性的指手画脚，李氏家族的其他财东也经常上号随意支取银两，而郭树炳却听之任之，致使号内人心涣散。梁怀文在多次劝阻无效之后，只得辞职回家，等到日升昌在 1913 年因事危急之时，方才重新出山力挽狂澜。只是，此时的日升昌，在一番折腾之后，再也恢复不了往日的元气。

❖ 票号的治理

对票号来说，仅靠两权分离，还不足以让其可持续发展。事实上，票号在发展过程之中，也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这里有顶身股的设置。所谓的顶身股，即人力股。它和银股一起，构成了票号的股份。“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它的设置，是票号笼络人才的一种手段。看上去，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很是相似。日升昌在初创时，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的身股皆

为一分，亦即一股，相当于银股 1.2 万两白银。到后期张兴邦任大掌柜时，身股顶到一分三厘，相当于 1.56 万两白银。而介休侯培余，在毛鸿翔投奔到自己手下时，为了表示对他的另眼相看，给他在蔚泰厚顶股十厘的同时，又在新泰厚同时顶股十厘，等于让他一个大掌柜顶了双份身股。除了顶身股之外，票号还要设立故身股，也是指顶身股者去世之后，其子孙可享有三次分红的机会。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顶身股者在晚年即将卸任时“晚节不保”，做出营私舞弊的勾当。

如果说家有家法，那么，号就有号规。在号规上，票号一直做得很是严格。其有二十四字店训：立法定规，实行法制；严厉执法，严格守法；任用贤才，起用能人。不管大小员工，都不准带家眷出外；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在外开设商店；不准捐纳实职官衔；不准携带亲故在外谋事。票号在用人上还呈现出一种“用乡不用亲”的模式，这对尤其注重亲情的山西人来说，能立这样的规矩，不得不让人佩服。

对内管控的同时，票号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对外防伪。谁能相信在当时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情况下，居然没有发生过一张假汇票？这也是票号之所以能“一纸汇通天下”的最有力的保证。今天，如果我们去拜访日升昌在平遥古城的旧址，还能在它的西侧柜房的墙上，看到这样的诗文。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诗文中的句子分别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总有报，到头必分明”“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以及“国宝流通”……把这些不相关的句子放在一起，让人很摸不着头脑，但显然，票号并不是在做提醒或者无聊的说教，这些句子其实构成的是中国最早的银行密押制度，即用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诗文的第一句，12 个字，对应的是每年的 12 个月份。诗文的第二句，30 个字，对



平遥雷履泰故居。

应的是每个月的30天。诗文的第三句，10个字，对应的是银两的数目。诗文的最后一句，对应的是银两的数字单位“万千百两”。对外人来说，这种密押无疑就是天书，如果看都看不懂，也就没法冒领。更重要的是，这些密押也不是一成不变，用过一段时间，再行变更，若有人想要破译或者伪造，更是难上加难。除此之外，汇票的防伪措施还包括，隐含在汇票里的水印、印章，还有汇票书写的固定笔迹，层层构筑起了汇票的“防火墙”。

只是，管控和防伪做得再好，它们也只是技术手段，深入不了内心，但票号还有一种无形中的治理，那就是其多年遵循的诚信。今天，很多人都会觉得，当年的晋商除了质朴、会经营之外，还是儒家所追求的“以义制利”的典型。《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八称：“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自日升昌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只要储户手拿汇票，不管何时何地，都必须无条件兑换。

❖ 失落的“民间帝国”

票号喜欢做一些达官贵人的生意。一方面，官员自身的积余应是不少。另一方面，官员的手中还掌握着权力，巴结好了，还能从他们手中无息或者低息拉到可以动用的公款，这就意味着票号能获得巨额的无息或者低息的资金。

票号不仅巴结官府，而且在保密性上还尤为注意。这也是官府愿意和票号一起做“生意”的原因所在。这种意愿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变得更为强烈。

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各行省都要按时按规定向指定口岸汇解战争赔款。距离近一点的没什么困难，但远一点的行省，则变得有些头大。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意味着有轻则革职、重则杀头的危险。它们只能主动寻求票号的帮忙。正是日升昌抓住了这一机遇，按期完成汇解任务，既为行省解决了“政治难题”，更让道光皇帝由衷赞赏，“好一个日升昌，还能汇通天下。”金口玉言下，“汇通天下”自此成了票号的口碑。这让“有困难找票号”也成了清政府的习惯。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因受战火的阻隔，清政府的财政拨款同样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又进一步加深了票号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这种垄断性的“强强联手”，让票号自身利益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证。这也是票号在清末得到较快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

庚子之年，八国联军打上京城，慈禧和光绪西逃，途经山西时先到太原，因经济困难，慈禧派山西巡抚召集宴请太原各票号人员，请求借款。属于祁县乔家的大德恒票号应诺借银30万两。再到祁县，下榻乔家的另一家票号——大德通票号。在这里为慈禧设置的临时行宫内，铺着红地毯，挂着锦缎，美酒佳肴，山珍海味，使仓皇出逃的慈禧大喜。可以说，这成了票号在政商关系经营上的典范，最终也赢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它反映出了中国民

间金融依旧摆脱不了对权力依附的思维惯性。对票号本身来说，当钱因垄断权力而变得如此好赚之时，他们内在的创新冲动，难免会因此失色。更重要的是，它没意识到，跟官府打交道，其实也是在刀刃上舔血，搞不好就割断了自己的舌头。这在战乱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战火来袭，那些达官贵人们就纷纷挤兑。若是借了款，死的死，跑的跑，这让票号一大堆贷出的款就变成了坏账。

此外，权力的勒索，也让票号一直如鲠在喉。赔付西方列强需要钱，平息内部的战火也要钱，这让清政府在手头紧张之时，选择了向票号动刀。比如说强迫它们大量捐款，口头说是自愿捐助，实则完全是强行索要。《清仁宗实录》中有这样的记录：“晋商摊捐最繁多，统计每年捐银八万二千两。”

这些还是小问题，对票号来说，它最大的隐忧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里，皮就是指它依附的权力，而毛显然就是票号本身。当它所依赖的权力，先是被西方霸权侵蚀，既而被推翻，它的结局也显而易见。

❖ “自救”失灵机

清末，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内陆城市显然已经跟不上社会的需求。

事实上，当山西票号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精明的南方人，开始创建一种更新型的票号。这种票号包括有近代宁波帮的鼻祖严信厚成立的源丰润，也有著名徽商（又一说是浙江杭州人）胡雪岩成立的阜康票号，以及云南王焯的天顺祥，当然更少不了李鸿章家族的义善源。这些票号因为是南方人士创办，且多在上海立足，它们遂被称为“南帮票号”。这些票号的出现，打破了山西人对票号的垄断，更加促进了票号业之间的竞争。不过，它们和山西票号之间除了业务相同点之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们身处上海，靠近洋务运

动的中心，所以它们在经营理念上已经有了极大的超越。比如说一改票号的钱只能作为消费工具或者支付工具，亦即周转资金，而非长期投资的陋习，开始投资实业，让这些钱成为真正的本钱。这里还得要说的是严信厚，他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宁波帮的鼻祖，正是借助于同僚盛宣怀开启的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由幕僚商人主办洋务的这一“便利”，投身到近代工业的创办之中，让他和旧式的宁波商人有了天壤之别。

只是，身处上海，既是机遇，也是危险，因为它得直面西方霸权的威胁。胡雪岩在19世纪80年代的大衰败，对票号来说无疑是个刺激。这个家财万贯的大商人，表面上看是败在了朝廷的内讧之中，事实上，是死在汇丰银行之手。他和汇丰的冲突源自1883年，他对那些跑到中国来发财的外国洋行所发起的“生丝大战”——他希望通过控制生丝生产的源头来控制生丝的定价权，进而不再受到外国洋行的盘剥。但再精明如他，也没料到自己的对头，并不是那些洋行那样简单——在这些洋行的背后，其实站着汇丰这样一只大怪兽。它于1865年在香港“出生”，未满百日，就在上海开设了分行并营业。很快，它就凭借着自身优势，控制了上海市面上的银根。当胡雪岩对洋行穷追不舍时，汇丰却对他的资金进行釜底抽薪。胡雪岩的家资一泄千里，而阜康票号在挤兑面前也彻底倒闭。

这不是个案，就连源丰润和义善源也没能够善始善终。1910年，因为橡胶股票风波导致的金融危机，财大气粗的源丰润竟宣告清产，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多万两。它的倒闭，累及外埠分号17家。而义善源同样也步其后尘，李鸿章之侄李经楚无法偿还借款，最终以1400万两之负债宣告破产。这就不免让人唏嘘不已，它们尽管比山西票号更新，但最终还是倒在了日升昌之前。

这两家票号的倒下，自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因为它们都处于上海，这意味着融入世界的程度和深度都比



清朝山西全图，中间画圈的地方，就是晋商历史上有名的“祁、太、平”了。

窝在山西要大要深，因此受到西方霸权的影响就尤其大。但因为害怕危险，而没有走出来直面威胁的勇气，这让决定票号命运的大人物们没法体味到新鲜事物，接受到新鲜思想，最后让票号的另一种自救良机——改组银行，最终成为泡影。

他们不仅没有认清自己所处的形势，更担心转型银行就得引进外资，这样会让自己独得的好处变成与外人共享。此前，当清政府的户部筹办户部银行时，山西票号就坐失良机，拒绝了参加筹办该银行的计划，明令北京各分号“不仅不让入股，人亦不准加入”，致使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这就是近代中国金融业渐被江浙商人控制的缘起，而宁波帮也因此挤掉晋商成了中国近代的第一商帮。

为救亡图存，民国元年（1912），山西票号终于想起要建立一家银行了，名字都取好了，叫

山西汇通实业银行。然而上天再也不愿意给它机遇了，本由政府提供借款，或者入官股，以便银行开张，却无一落实。加上一战爆发，国内外的社会环境更是动荡无比，这本来是票号最接近转型成功的一次努力，也因此化为乌有。

民国三年（1914）农历九月，尽管有梁怀文重新出山力挽狂澜，但日升昌票号还是倒闭，李氏家族的风光也就此退隐。民国十一年（1922），北洋政府农商部正式批准日升昌复业，日升昌却已不是原先的日升昌，它改为新型的债权人做股东的股份制票号，总号设在北京，分号设在平遥。这无疑是一种自我否定以及自我更新。不过，十年后，新的“日升昌记”还是坚持不住，宣布倒闭。^①

（摘自《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有删节 现代出版社，图亦由出版社提供）

伍廷芳： 中国近代长图法治第一人

文 | 何远琼



伍廷芳。图/FOTOE

纵观伍廷芳一生，几乎可以串联起大半部中国近代法律史。他少年志学，敢发新声；他青年别家，留洋习律；他壮年北上，襄办洋务；他老年革命，奠基共和；他暮年护法，长图法治。他精通西律，学贯中西，创造了无数个中国近代法律史上的“第一”，他促使了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封建法制的瓦解，促成了中国法律体系的近代化的开启。

公元1922年6月23日子时，时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兼财政部长的伍廷芳溘然长逝，享年80岁。他离世之后，孙中山为其亲题碑文墓表，由衷深赞：“知公弥深，敬公弥笃”，并在其追悼演讲中感叹：“惟元老凋谢，此后共谋国事，同德一心，恐无如伍总长其人矣”。

因法律与政治的天然姻亲关系，清末民初的历史舞台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享誉海内外的法律人物，他们努力撕开封建专制的帷幕，放进民主主义的法治之光，伍廷芳就是这样一个人。

❖ 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

1845年，远赴南洋谋生多年的伍社常在儿子伍廷芳3岁之际，携家眷返回祖籍广州芳村。他高价请来私塾先生，让伍廷芳习四书、练八股、备战科举，为孩子铺设了旧式读书人的常规升达之路。可新加坡出生的伍廷芳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个引领时代潮流的新人。

少时的伍廷芳，对科举“兴趣索然”，喜读“子书、史鉴、小说”，经常在热乎乎的天气里上演热乎乎的“逼学”与“逃学”的戏码。在他13岁时，一伙强盗为索钱财，在夜里闯入他家绑架了他。伍廷芳面对悍匪表面上装懦弱乖顺，暗地里

却细心观察寻找逃跑机会。他发现土匪窝的伙夫一副老实胆小的模样，又和他说着同样的家乡话，便和这个同乡套近乎。一来二去，他知道这个伙夫是6年前被土匪掳来的，便诱之以利，动之以情，劝说伙夫趁大帮土匪外出作案，利用酒肉灌醉留下的2名看守，一起逃离匪窟。

这场绑票案后，伍社常眼看伍廷芳经规劝责骂都不好好走苦读经书、金榜题名的科举之路，又为防止太平天国运动战乱局势里伍廷芳再生不测，决定把14岁的伍廷芳送到香港圣保罗学院求学。当然，这也因为曾经飘洋过海的伍社常，看到了“天朝上国”的科举之路在列强入侵、运动四起的社会巨变下已近断绝，师夷长技或许才是曲线发展之道。从此，这个名叫伍廷芳的男儿，与中国近代史上诸多人物一样，开始了他一生不断“南下”与“北上”的人生轨迹，揭开了他接近政治权力核心、倡导西方法治文明以强国富民的历史序幕。

1856年，伍廷芳在亲戚陈言陪伴下来到香港，进入圣保罗书院学习。圣保罗书院由英国圣公会创办，提供纯粹的西式教育。伍廷芳在这所学校，“治英文、算学、格致诸科，试辄冠侪辈”。

1862年伍廷芳以优异成绩毕业，被选拔为香港高等审判庭译员，成为港英政府机构中的一员。年少志高一心想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真理的伍廷芳，一边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为港英政府服务；一边留心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实务。但他人微言轻，在1867年上书港督要求收回港英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等等港府公共事务中发出的声音屡被湮没。1874年，伍廷芳“以为欲救国危，非赴欧美精研法学，举吾国典章制度之不违者，改弦更张之不可”，“奋发走英伦，入林肯法律学院，习法律，开游学之先河”。

林肯法律学院当时位居英国四大法学院之首，校规严格，向来被视为培养贵族的摇篮。已过而立之年的伍廷芳，以顽强的毅力，系统学习了合同法、刑法、宪法、行政法、民事诉讼法和国际

法等课程。还按该校校规规定，积极参加学院晚餐，进行学识积累和学术交流，并结识对其事业大有帮助的伦敦上流社会人物。他还经常到议院去旁听，实地考察英国的宪政。1877年1月，经过3年的潜心苦读，伍廷芳从林肯法律学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取得英国大律师资格，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资格。

留学英国，研习法律，是伍廷芳人生的重要转折。他精通西律，尤为擅长刑律、国际法，这为他日后成为蜚声中外的外交家奠定了良好的学识基础。

❖ 首位华人大律师

1877年3月，伍廷芳父亲病逝，他也学成归港。因林肯法律学院的名气，当年5月18日，港英政府律政司经过认真审核，决定准许伍廷芳在香港法庭执行律师业务，伍廷芳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准在香港担任律师的中国人。

从英国回港途中，伍廷芳巧遇前往香港上任的第八届总督轩尼诗。轩尼诗从伍廷芳口中了解不少香港的风土人情，对伍廷芳颇为赏识。轩尼诗本人思想开明，到任不久就宣布废除针对中国人的公开笞刑。未料在港英国居民强烈反对此令，要求轩尼诗下台。伍廷芳认为笞刑有违平等与人权原则，旗帜鲜明地支持港督，发动多位华人名流和民众署名请求英女皇留任轩尼诗和废除香港笞刑。这两封请愿书皆由伍廷芳等人交给港督，此后不久均获英女皇批准。留任港督的轩尼诗，顺应香港社会的发展趋势，主张给华人较合理的待遇，打破了不准华人参政的传统。在他的“光明政策”下，1878年12月，伍廷芳成为港府委任的40名太平绅士之一，成为香港第一个华人“太平绅士”。1880年2月，伍廷芳成为“香港立法局”非官方议员，成为香港第一个华人议员，开启华人进入香港殖民政府参政、议政的先河。此后，

伍廷芳在工作内外，都“俨然为华人之代言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香港的城市建设、商业发展、社会福利等事业中，并且贡献良多。他杰出之能、为公之心，利民之行，为他赢得了香港社会的广泛赞誉，华人皆尊称其为“伍叔”。

在伍廷芳以大律师身份参与的案件中，他总以渊博的法律知识、雄辩的口才为维护华人权益竭尽全力。但“福州中美诉讼案”和“争免华人死后剖尸案”等案无由败诉的执业经历，让他强烈地意识到，国家弱则华人律师无用武之地。后来，轩尼诗因其开明政策，和“重用”华人伍廷芳，引起英国国内猛烈抨击，被远调毛里求斯。1882年10月，更加感觉无用武之地的“伍叔”，终于在他不惑之年，接受李鸿章邀请，带着强国富民的梦想，北上天津，出任李鸿章北洋幕府的法律顾问，襄办洋务，走上仕服满清、救亡图存的求索之路。

❖ 洋务法律顾问

早在1877年，李鸿章已不遗余力试图将伍廷芳招至麾下。凭借镇压太平军、捻军所立下的赫赫战功成为满清新贵的李鸿章，正为推动顺应近代历史潮流的洋务运动不断招罗各色人才。在得知“前出使英美之郭侍郎、陈太常争欲罗致”伍廷芳时，横刀夺爱，力邀伍廷芳北上天津面晤深谈，并上奏清廷斡旋解决伍廷芳官职派充和年薪至少六千两的问题以留为己用。但最终伍廷芳自称“嗣以母病，请假回籍”拒绝李鸿章的邀请，回港开展大律师业务。5年之后，才毅然离港，入李幕府为官。

据说伍廷芳在1881年香港地产投机狂潮猛跌中损失惨重，是伍廷芳离港北上的缘由。他在伦敦求学之时，“为西洋装，而蓄发约长丈许，云为回家后尚可结辫也”，通达权变，已可见一斑。在郭嵩焘、李鸿章竞相罗致时，直言不愿为二三等参赞、年薪非六千两不可，务实理性，也鲜明可见。经济之量或许是伍廷芳愿为达官显要幕僚

的原因之一，但“公自幼时，已怀经世之志，中国积弱，发愤以匡救自任”恐是更深层的原因。

伍廷芳在香港的大律师生涯中，在“福州中美诉讼案”中，深感治外法权的“强权即公理”。在“争免华人死后剖尸案”中，又深感英国人对中国人深层的种族歧视。特别是1881年冬至，在香港欢迎英国皇孙阿拔域陀一行的活动上，担任“欢迎委员会”烟花爆竹分局副主席的伍廷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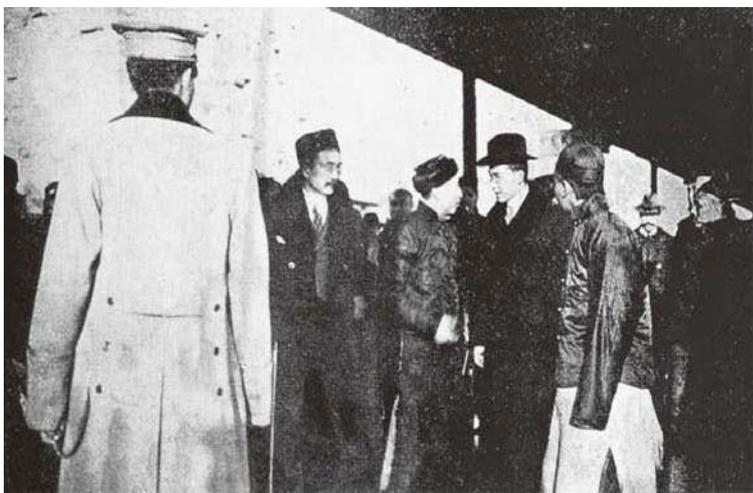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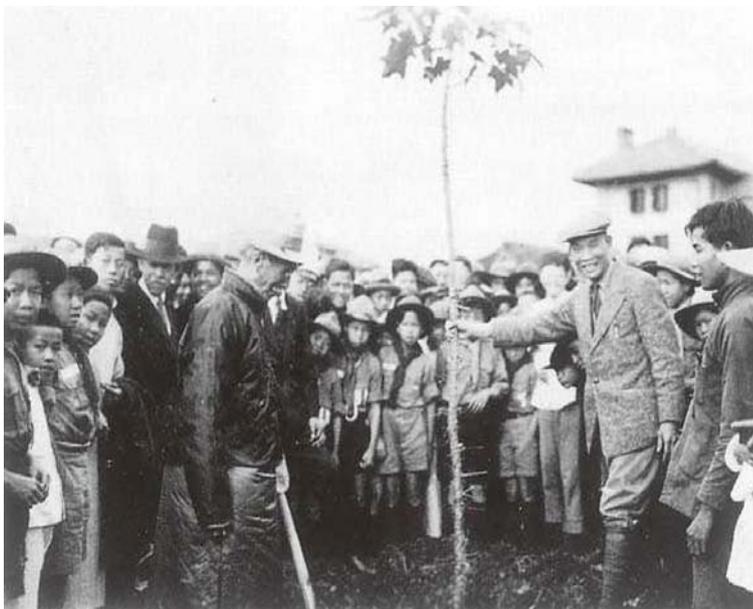


伍廷芳浸润西方文明多年，了解和熟悉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理念和模式。1886年8月，他出任开平铁路公司经理后，第一件事，就是试行股份制改革，招商集股，扩大公司的运营资产实力。



兴高采烈地介绍各色烟花时，被英国皇孙坐船“白甘的”号军舰舰长大声嘲笑只会用你们老祖宗的发明玩烟花爆竹。种种弱国臣民的屈辱经历，唤醒了他的民族自觉，骨子里的经世之志，从此不顾身前险，不计身后名，一步一步迈入中国近代权力中心，去开拓强国富民的现实之道。

伍廷芳初入李鸿章幕府，主要被聘为法律顾问，赞襄洋务。他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协助李鸿章进行中外交涉。1885年中法谈判，《中越边界通商章程》的订立；1885年中日天津交涉；1886年“长崎事件”交涉；1895年中日议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换约；由李鸿章主导的诸多中外交涉中，都有伍廷芳的深度参与和大力协助。在“长崎事件”



01
—
02

01

1922年植树节，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兼广东省省长伍廷芳在广州岭南大学校园内植树，小树左方为伍廷芳。图/FOTOE

02

1912年南北议和，清廷代表唐绍仪（右四）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右二）在上海车站见面。图/FOTOE

中，伍廷芳协李鸿章草拟交涉方案，从法学的角度，认为应将长崎事件视为一起普通刑事案件，提议依据法律程序，勘明各情，“执此与日人理论”，并提出具体谈判方式的三种方案。整个“长崎事件”的实际谈判处置基本上是按照伍廷芳草拟的交涉方案进行的。尽管协助李鸿章办理的系列外交事件中，伍廷芳竭尽全力在国际法律层面辨析明理，锱铢必较，然而在武力说话的列强争霸时代，国际交涉更多的是综合国力直接较量，与虎谋皮，终无成效。面对列强淫威，伍廷芳也只得慨然长叹，“我将卒苟能奋勇于疆场，不容其猖披，何致就彼而受其欺慢，欲消此恨，其任将与兵焉，和局易成与否，亦在战争之胜负判也。”

◆ 近代铁路总管家

襄助对外交涉的伍廷芳，比常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弱国屈辱。深谙中西文明差异的伍廷芳，比时人更期望中国这头睡狮猛醒，学习和赶超西方文明。他不囿专业之限，满怀一腔热血，用心投入到更广泛的洋务兴国活动中。19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李鸿章、刘铭传、奕譞为首的铁路修建赞成派在和反对派的政治斗争中获胜，开启了中国铁路运输兴起发展的新篇章。然而，当时中国放眼望去无一铁路经营专家，谁能担起实现中国铁路建设蓝图的重任？中国近代铁路的最大倡办者李鸿章和时任总理海军衙门大臣的醇亲王奕譞反复思量，最终圈定伍廷芳作为中国自建的首条铁路——唐胥铁路延长线开平铁路运营公司的负责人。

伍廷芳浸润西方文明多年，了解和熟悉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理念和模式。1886年8月，他出任开平铁路公司经理后，第一件事，就是试行股份制改革，招商集股，扩大公司的运营资产实力。他制定了严格章程，确保股东权益，他注重发挥唐廷枢等商人的企业运营才干，实行“商督商办”，克服了“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端。在具体的经营

举措上，伍廷芳除加大工程力度扩展运营铁路里数外，也不断拓展煤运之外的客运、其他货物运输等业务范围，广开财源。“与我一起建造这条铁路的人几乎都没有想过能获利，但却获利百分之五十”。伍廷芳主持运营开平铁路，为中国近代铁路经营管理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借鉴范例。

伍廷芳出任开平铁路公司经理之后，在甲午战争之前，先后担任中国铁路公司经理、北洋官铁局总办、副总督办，参与主持了唐胥铁路、津沽铁路、关东铁路的筹建、运营和管理。期间，伍廷芳突破多方制肘，向洋行借款使用外资；聘请詹天佑作为铁路建设工程师，通过驻美使馆聘请铁路建设熟练华工；巧借筑桥合同解决铁路经过法国租借时的干预阻挠；不断克服资金、技术、设备、人才上的种种困难，完成了中国铁路从无到有的跨越，部分实现了洋务派的铁路规划蓝图，开创了中国早期铁路建设运营的近代管理模式，被誉为“近代铁路总管家”。

◆ 罗斯福欣赏和提防的外交家

甲午战争之后，中华帝国已成为列强肆意抢夺的一块肥肉。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在国际事务上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局面，亟需外交人才于列强铁蹄虎口之下，挡所能挡，争所能争。伍廷芳凭襄助洋务对外交涉中的突出才干和斐然业绩，成为合适人选。1896年到1902年、1907到1910年期间，伍廷芳先后充任美、日、秘等国出使大臣。

伍廷芳法律知识渊博，又懂闽粤一带的方言，英语精熟又富有外交经验。他到美国上任伊始，就以西方外交官熟悉的方式，对“谭忠瑶案”“二周案”“蒋森被杀案”“谭陵案”“科罗拉多案”等排华反华案进行外交照会，抨击美国政府对华人的野蛮执法。一连串的抗议皆告失败后，伍廷芳明白在“强权即公理”的国际外交局势下，他凭一己之力实不能为全体旅外华人博得平等对待之机会。依照其大律师经验，他开始以美国政府在中美两国已



外交部长伍廷芳与美国华侨。

伍廷芳生平 +

1842年7月30日

生于新加坡，后随父回国。

1856年

来到香港，进入圣保罗书院学习。

1862年

以优异成绩毕业，被选拔为香港高等审判庭译员。

1874年

自费前往英国，入读林肯法律学院。

1877年1月

从林肯法律学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

1878年12月

成为香港第一个华人“太平绅士”。

1882年

正式进入李鸿章幕府。

1886年8月

出任开平铁路公司经理，试行股份制改革，招商集股，扩大公司的运营资产实力。

1896年

被清政府命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

1907年

再次出任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公使，两年后回国。

1912年1月

出任民国首任司法总长。

1922年6月23日

溘然长逝。

签订的条约中的承诺为突破口，对限制应受豁免一类的人员入境问题和在美华商受到虐待问题进行有理有据地抨击抗议，以求实实在在护得一分是一分。后来成为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当年以学生身份和费起鹤来美求学时，所携护照由直隶总督李鸿章签发，并有美国驻天津领事拉士得勒的盖章签名，手续齐全，证据翔实，但还是被美国税务官员以所携护照不合格为由，拒绝入境。也是伍廷芳接到总领事的求援电，前往美国财政部移民局交涉，提供充分证据，才得美国财政部官员破例相待，准许其登岸入校。

1900年，义和团和清军攻打外国驻京使馆，追杀在京传教士、教徒。一些西方媒体根据一些不足为信的材料别有用心地编造大量外国驻华人员被残杀的故事，以此煽动西方民众复仇情绪，为侵华战争鼓与呼。为有效开展外交斡旋，伍廷芳运用各种外交手段向美国朝野解释，保证使馆人员绝对安全。另一方面，伍廷芳直接奋起反击，猛烈批评混淆西方民众视听的谣言。他通过文章和讲演从中西社会、政治、文明对比思辨的高度，剖析中西对抗冲突的症结，谴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军事侵略、民族文化歧视，宣讲中国文明的伟大与价值。伍廷芳从追求人类和平、公平、正义的“文明观”出发，强调应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国际交往的“黄金准则”，驳斥欧美列强所宣扬的种族优越论，并指出在内在价值上，东方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具有永存性的意义，他声称“当今世界逐渐缓慢地通向儒学”，希望“中国得到别的国家的公平和公正的对待”。伍廷芳的期望在当时无异于与虎谋皮，但这些著述也充分地体现了他这一时期对东西文明的系统反思。作为一个亲近西方文明的新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西方文明固有弊端之前，他非常难得地清晰地看到东西方文明各自的优劣，并坚信儒家文明有优越于西方文明之处，中国文明也应“善循时势”汲取西方文明的先进之处。

伍廷芳深知美国崇尚民主，民众舆论常常能影响政府，为赢得外交上的主动，他平常就经常有意出席有名流要员参加的聚会，主动发表演讲积极交流。他的演讲幽默诙谐又颇有见地，得到一些美国社会名流的认可，并与他结为好友，其中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弱国无外交，大多排华提案和具体案件，伍廷芳多方抗议百般争取还是以失败告终。但他为维护华人利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成败利钝，虽不能料，但期竭尽愚忱，稍宽一分，即华人受一分之益”，他机敏的外交手段和为国为民争所当争的精神，也在国际政坛上赢得了尊重获得了赞誉。西奥多·罗斯福就曾说过，千万不要惹怒伍公使，“一旦让他得手，我们一定都不得好死，就是不死，日子也不会好过”。

❖ 中国近代长图法治第一人

“练习洋务、西律专家”的伍廷芳，作为清末修律大臣之一，协同“久在秋曹、刑名精熟”清末著名法律学家沈家本，在1902到1907年的5年间，参照西方近代法学原理，打破沿袭几千年的重刑轻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中华法系法律传统，实现了民刑分隔、实体程序分离、新立商法等历史性突破，推动了以严刑酷律为特征的古老封建法系的瓦解和终结，推动了中国近代国家社会整体发展法治蓝图的勾绘和构建，在中国近代法律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醒目的丰碑。

1910年从出使大臣卸任的伍廷芳闲居沪上。但正如他自己所言，“身老江湖，心悬廊庙，著书立说，犹思整顿中原”。1910年9月，伍廷芳上书《奏请剪发不易服折》，大声疾呼清廷下旨剪辮，实施形式与精神一致的真正变法革新。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带头剪去辮子，发誓将革命进行到底。此后，剪辮与否，成为一种是否与清王朝决裂的政治抉择。伍廷芳的上书，其实是篇羞羞答答的反清宣言。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前，伍廷芳在上海召集同仁召开

剪发大会，成为辜鸿铭骂的“没有辮子的食肉兽”，则是明明白白地宣告脱离清廷阵营了。1911年11月，沪上革命党人拟定“沪军都督府”外交总长人选时，“伟才硕望，中外咸钦”的伍廷芳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1912年1月3日，根据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提名，伍廷芳出任民国首任司法总长。

任民国司法总长期间，伍廷芳倡率以法治国，



伍廷芳机敏的外交手段和为国为民争所当争的精神，也在国际政坛上赢得了尊重获得了赞誉。西奥多·罗斯福就曾说过，千万不要惹怒伍公使，“一旦让他得手，我们一定都不得好死，就是不死，日子也不会好过”。



配合拟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系列体现民国施政大纲的制度规章。伍廷芳强调司法独立，呼吁“文明审判”，为此主持制定颁行了《宪纲大旨》七条、《律师法草案》等改良司法的法令法规。

法贵于立，也贵于行；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受数千年封建法制余毒浸淫，又迫于乱世挤压革命发展所需，南京临时政府时有有法不依、以权凌法的违法事例。矢志追求法律至上的伍廷芳，在实践中“不顾情面”，全力维护司法独立。其中，伍廷芳在“姚荣泽案”“宋汉章案”上同沪军都督陈其美展开的“权”“法”争辩最典型。

“姚荣泽案”系前清山阴县令姚荣泽在淮安宣布独立响应武昌起义时匿不到会，被同盟会会员周实和阮式斥责，后伺机报复。在1911年11月，将二人残害至死。在姚案中，陈其美单方面委任沪军都督府军法司总长蔡寅为临时庭长，提议开庭审理日期后又因欲图多增陪审员而拖延改期，又以非华洋交涉案件强烈反对姚荣泽聘请的外国律师出庭。伍廷芳不满陈其美越权行事，根据裁判支配权坚持由司法部负责另行委派审判员，又一一驳斥陈其美反对外国律师出庭的理由。伍廷芳直言不讳，指出“执三权鼎立之说，凡关于裁判之事，本不敢烦执事（陈其美）过虑。”“宋汉章案”系前清户部银行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拒绝沪军都督陈其美多次提出的商借银行武昌起义后冻结的库存资金，被陈其美派人拦截拘捕，并以“捏造吞匿，以图中饱”之口实银铛入狱。此案中，伍廷芳称逮捕宋汉章是在《临时约法》之后，理由由司法部会同财政部、银行监督依法清查，陈其美擅自行事，已越司法权。陈其美方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单凭告发，没有实证便任用权柄对宋汉章逮捕关押，“迹近蹂躏民权，又失法律之原则”，违背民国宪法宗旨，违背了近代司法审判原则，纯属“强盗之行为”。

民国初兴，陈其美沿袭千年官僚之传统，以法律制度尚未健全，匡济民国大业为重，恣意干预司法审判。而伍廷芳坚持既然已按三权分立原则建国，就应法律至上，遑论其他。虽然“姚案”“宋案”经伍廷芳据理力争，最终基本上遵循司法独立原则，开创了依照近代西方审判方式判案的历史先河。但在此过程中，伍廷芳也遭受陈其美等革命党人讽刺、诋毁，甚至被辱骂为“持素食之老嫗”“信阴鹭之腐儒”。伍廷芳悲叹民国“刻下权力不及”，觉得革命党人与自己以法强国平生志愿并不相合，故于1912年3月底，辞去司法总长一职，“退居安闲，藉以养晦”。

伍廷芳出任民国司法总长时间短，经他亲历的立法和司法活动并不很多，但他作为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法律改革先驱，在南北和谈中纵横捭阖，

推动南北双方以法律形式奠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宪政根基；他清末修律中留下的大量体现近代资产阶级法治精神的法律草案，是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高潮时代的蓝本；他坚持原则，不畏权贵，勇于推进近代西方审判制度，可谓民国法制元老，为整个民国树立起三权分立制衡、政治司法文明的法律风骨。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袁世凯看重伍廷芳在海内外的盛誉，先“委为顾问”，又仅次于孙中山、黎元洪的“勋一位”，多次邀请伍廷芳加盟。但伍廷芳对袁世凯南北和谈期间翻云覆雨的政客伎俩深恶痛恨，坚决辞谢。

1921年4月，在第二次护法军政府在广州设立正式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总机关。已近80高寿的伍廷芳以老迈之躯，为第二次护法事业辛苦奔波，直至重病不起，与世长辞。

纵观伍廷芳一生，几乎可以串联起大半部中国近代法律史。他少年志学，敢发新声；他青年别家，留洋习律；他壮年北上，襄办洋务；他老年革命，奠基共和；他暮年护法，长图法治。他精通西律，学贯中西，创造了无数个中国近代法律史上的“第一”，他促使了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封建法制的瓦解，促成了中国法律体系的近代化的开启。他以法学家的雄辩，外交家的机变，交涉纵横折冲樽俎，获得海内外交口称赞。他以法学家的理性，政治家的通达，仕服三代宦海沉浮，屡受当权者竞相罗致。他体察中华大地实情，参酌欧美国家富强之道，选择改良主义道路，不负历史角色奠定国民民主共和宪政法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开拓者。他又不管时事艰难多方制肘，坚持三权分立，推崇司法独立，追求文明审判，是中国近代依法治国精神的倡导者和捍卫者，可谓中国近代长图法治第一人。他一生审时度势追随当政权贵，不计临阵易帜之骂名，立志坚毅，全为变法图强。他是中国近代法制史上一座丰碑，他是民国法制元老，他是时至今日仍值得回望、值得倾听的一个法治人物。^①

西路军余部在新疆

文 | 潘前芝



1937年，突围后到达新疆的部分西路军指战员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合影。

在 1936年11月，由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西渡黄河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由于寡不敌众，在马步芳、马步青等西北军阀的围追“兜剿”下失败，余部进入新疆。这帮人在此学习了各种现代化军事技术，阴差阳错地成为我军首支系统学习机械化和航空知识的部队。

1937年5月初，西路军400余名指战员在陈云、滕代远、李先念等人的带领下，抵达新疆迪化市。当时主政新疆的盛世才将正在修建的位于市区西河坝的一家纺织厂作为指战员们的临时营房。盛虽然表示愿意与我党合作抗日，但他害怕红军的影响，不愿意红军在新疆公开身份，因此要求西路军将士换服装、改称号。陈云从团结抗日的全局出发，同意了盛的要求，规定指战员们不许外出，换上了没有领章帽徽的盛世才军队的服装，对外称是盛世才的“新兵营”。月底，“新兵营”搬到了迪化东门外一座有四五个相邻院子和一个大操场的营房。为便于领导，他们对部队进行了调整，在总队部下设一个支队和一个干部队。支队辖4个大队，每个大

队辖3个排，每排3个班，每班10人左右。

❖ 学习机械化

除了集中半年时间突击学习文化知识，1937年秋，“新兵营”总队部召开各队领导干部会，研究学习军事技术问题。会上，陈云向大家讲述了学习机械化的意义。他说：“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不能光靠步枪、刺刀，也需要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来对付侵略者……我们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培养会驾驶飞机、汽车、装甲车的人才。”不久，陈云即向盛世才和苏联顾问提出，请迪化的军官学校和苏联的教官帮助“新兵营”学习军事技术，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这一提议，得到盛世才和苏联总顾问巴宁中将的赞同。根据安排，一、二大队学习汽车；三大队学装甲车、坦克；四大队学习火炮，时间初定为一年半。

学习驾驶的同志，要学习电工、发动机原理、驾驶规程等课程。刚开始，好多人听不懂，特别是对“电”感到很神秘，就问教员。教员拿起牛

角梳子，在头上梳了几下，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教员说，这就叫摩擦生电，大家这才对电有了一点感性认识。理论学了一个多月后，学员们开始学习拆装发动机、判断和排除各种故障。然后就开始学习驾驶。学习一段时间后，就开始了长途训练，有时向西开到乌苏、伊宁，有时越过天山，开到吐鲁番盆地。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训练，绝大多数人都能单独开车了，考试成绩都在60分以上，80到90分的甚至占到半数。

学习装甲车的三大队，让其他队的人很是羡慕。学习内容从发动机构造到战术技术无所不包，苏联教官要求也很严格，一个小动作不规范都要重做。练习装甲车射击前，要先练习手枪打靶，要求必须打中十环。装甲车射击，用的是机枪，先打静止靶后打移动靶。四大队学火炮，编有3个排，教员也是苏联教官。一个班只有一本俄文教材，授课也是用俄语。一些会说俄语的干部担任课堂翻译。下课后，各班请懂俄语的同志把教材中当天学习的内容翻译出来，记在笔记本上。为方便教学，还专门配备了苏制75毫米口径野炮、75毫米口径山炮各一门。此外还添加了一些如方向盘、炮队镜等特殊器材。1938年8月，毛泽东特意发电报给“新兵营”，要求大家好好学习，尽快学会，早日上前线。1939年9月，周恩来借邓颖超还有王稼祥、陈昌浩等去苏联治病，专程来“新兵营”看望指战员们。

❖ 向航空进军

在学习机械知识的同时，陈云得知盛世才的航空队准备开办第三期飞行班和第二期机械班，他马上想到，在新疆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利用盛世才的航空队装备和苏联教官任教，可以建立我党自己的航空干部队伍。

盛世才对于让共产党人使用他的飞机、设备培养共产党的航空人才，并不情愿。但他考虑到他的装备器材是苏联人援助，于是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让苏联再援助一些飞机；二是共产党的飞行员、机械员毕业后，要帮他树立起航空队的

军威。经过综合考虑，陈云答应了盛的要求。随后开始着手物色学习人选。考虑到这是我党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队，他在“新兵营”选了30多名年纪轻、身体好、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干部。1937年底，陈云回到延安，把这一想法向党中央汇报，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于是从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又选了19人到新疆学习航空。

1938年3月3日，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第三期飞行班开学典礼在航空队的操场上隆重举行。来自延安的18人（1人在到达新疆后因身体不符合条件被淘汰）与“新兵营”里经体检合格挑选出来的25人一起进入航空队学习，其中飞行班25人，机械班18人。这就是人民解放军最早的航空队伍，原西路军的吕黎平为飞行班班长，延安来的严振刚为机械班班长。

经过一个多月的苦练，飞行班的25人顺利完成了Y-2型双翼初级教练机的全部单飞科目。同年10月，转入P-5型双座侦察机训练。1941年夏，航空班吕黎平、方槐等10名同志首批进行改装训练，依—15双翼歼击机、依—16单翼歼击机两种机型。这两种机型在当时都是比较先进的机种。1942年，经过4年人均300小时的飞行训练，飞行班毕业。毕业后，这些学员继续留在航空队，巩固提高飞行技术。期间，1939年11月，机械班毕业，18名学员被分配到机务中队当机械员。

1939年12月，因抗日战争需要，党中央决定除航空队学员继续留下学习和部分干部坚持工作外，其余人员撤回延安。次年2月7日，“新兵营”其余300多名指战员乘坐40辆汽车，经兰州、西安，回到延安。

1942年9月，盛世才接受了蒋介石的谈判条件，与我党和苏联彻底决裂。航空队被投入监狱，后在党中央的营救下，于1946年7月回到延安。43人中，彭仁发、汪德祥2人因飞行事故牺牲；病故2人，脱离革命8人，回到延安的共31人。是年9月，这31人奉命奔赴东北，参加人民解放军首个航空学校的筹建。他们在人民空军中先后当过飞行教员、机械教员以及各级领导，为空军培养了很多人才。①

美猎杀日军最大航母

文 | 匡济

在 1944年6月19日的清晨，海风潮热，小泽治三郎的心情，更加潮热。

身为旧日本帝国最后的航母舰队指挥官，他正站在旗舰“大凤”号航母的舰桥上，目送着自己麾下数百架战机迎着朝阳杀向“可恶的美国佬”，并为预想中即将到来的胜利激动不已。

然而，突然传来一声闷响，来自水下——鱼雷攻击，有潜艇！

❖ 日军王牌“大凤”

1944年6月6日，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将纳粹德国驱入末日之途。意大利早已投降。亚太地区的旧日本帝国也进入了处处挨打、步步败退的境地。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上，面对美军铺天盖地杀来的飞机军舰，连连惨败的日军手里已经

没有多少家当还能拿出来“玉碎”了。

日军此时却还幻想用一场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决战来扭转败局。为此他们将手中残存的九艘航母集中到一起，编成第一机动舰队，作为决战主力，希望能发挥出巨大威力，重创美军，稳住太平洋上所谓的“绝对国防线”。

其指挥官正是小泽治三郎。这位和山本五十六同辈的日军将领，在航母作战方面颇有天赋，是日军当时不可多得的将才。其命运却很很惨淡，由于派系争斗等原因，他坐冷板凳一直坐到山本五十六战死，才有机会出来指挥日军航母舰队。

虽然经历了中途岛等战役的巨大失利后，日军损失惨重，尤其是航母部队元气大伤，但这个



1944年5月，再度踏上战场的“大青花鱼”号潜艇。

小小的岛国依靠掠夺来的资源，使尽了力气，好歹又造出了几艘航母。其中之王牌，便是刚刚服役的“大风”号航母。这是吸取了中途岛战役的经验建造出来的大型装甲航母，排水量3万多吨，飞行甲板能抗500公斤炸弹，弹药库更是能抗1000公斤炸弹，水下防御则是能抗300公斤鱼雷轰击。此外还有大小上百门高炮，以及日本最新型的雷达系统。至于舰载机，则最高可装75架，且清一色的都是最新型战机。

当时日本各条航线都被美军潜艇封锁的近乎于瘫痪，能运回本土的物资数量大减，许多舰艇都已经停工，如此窘迫之下重金打造出来的“大风”，真可谓一个宝贝。小泽治三郎便拿这宝贝当旗舰。不仅当旗舰，还要当作决战的主力。

鉴于当时美军实力太强，大型航母就有十几艘，而且飞行员数量庞大，飞机性能强悍，要是正面对决，日军只有继续惨败。但小泽治三郎依靠他航空战的天赋，发明出来了一个名为“穿梭轰炸”的战法。

此战法的要点是利用日军飞机的大航程优势，在美军飞机航程外发动攻击，然后不飞回航母，而是继续前飞，到后方那些残存的日军岛屿机场上，加油装弹后再起飞攻击，完毕后再回到航母。简单说，就是利用航母和岛屿进行来回轰炸。

而美军航母因为航程的缘故，只能白白挨打，打不到日军航母，甚至连对方在哪儿可能都搞不清楚。如此自然可以实现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了！

唯一值得担忧的地方在于，那些被放飞出去的日军战机，上面的新兵飞行员是否有这个技术突破美军严密的防空火网进行攻击，以及是否有体力飞过去又飞回来。为此，小泽治三郎指挥麾下的航母舰队，开向新加坡附近的林加湾，在赤道标准的高温酷暑下，进行高强度训练，目的就是尽快打造出一支能实施“穿梭轰炸”的精锐航母舰载机部队。

还没练上一月，就接到急令。美军要大举进攻“绝对国防线”，小泽治三郎舰队，出击！



**“大风”号
航母是吸取
了中途岛战
役的经验建
造出来的大
型装甲航
母，排水量
3万多吨，
飞行甲板能
抗500公斤
炸弹，弹药
库更是能抗
1000公斤炸
弹，水下防
御则是能抗
300公斤鱼
雷轰击。**



❖ “穿梭轰炸”发动

匆匆从新加坡海域转到前进基地塔威塔威岛的小泽治三郎舰队，进港没多久便被一艘美军潜艇盯上了。这艘潜艇当时还升起潜望镜，对这支正在苦练“杀敌本领”的日军舰队进行了近一分钟的“观摩”，就潜艇作战而言，这是极度危险的自我暴露行为，在大西洋的德军潜艇绝不敢这样做，由此可见小泽治三郎舰队在反潜防御方面的松懈，竟让这艘美军潜艇得以如此大胆。

得知日军在此地集中如此多的航母，配以如此差劲的反潜防御，美军西南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洛克伍德将军立即调来四艘潜艇，蹲在这个塔威塔威岛旁边，守株待兔。虽然这四艘潜艇并未猎到一艘日军航母，但击沉了几艘日军运输舰，并对其造成巨大恐慌，严重干扰了小泽治三郎的训练计划，对即将到来的决战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美军散布各处的潜艇分别传来发现日军舰队正在集结的情报。美军高层通过这些情报，判定日军为了保住“绝对国防线”，有同美军展开一场大规模会战的企图。当时美军主攻方向为马里亚纳群岛，这大概也当是会战地点。

但美军主力舰队指挥官斯普鲁恩斯对日军的企图还是判断有误，他认为以日军此时的实力，怎么可能同自己麾下庞大的舰队进行正面对决？自己仅航母就有十五艘！故而他认为日军想用调虎离山的诡计，先用这些拼凑起来的航母引开美军主力，然后让其他军舰趁虚而入，去屠杀正在攻打塞班岛的美军登陆部队。不料被他视作“诱饵”的小泽治三郎舰队却是真正的攻击主力，而且还有“穿梭轰炸”的技术。

1944年6月18日，依照自己的图谋，小心翼翼出港之后，小泽治三郎派出40余架侦察机去搜索美军舰队。依靠大航程优势在成功捕获美军舰队踪迹后，小泽治三郎便蓄意将自己的航母舰队移到距离美军舰队700多公里开外。当时美军战机最大作战半径在500公里左右，日军战机则能达到近700公里，只要自己到临时阵稍微前进那

么一点点，不就能大肆运用“穿梭轰炸”了吗？

6月19日，凌晨。害怕美军趁夜摸了过来的小泽治三郎，再度派出40多架侦察机，再次确定美军舰队特别是航母的方位后，开始提高航速，进入攻击阵位。旗舰“大风”上升起了一面Z字旗。这本来是西方近代航海家用来祈福求好运的旗子，当年哥伦布就挂的这旗。传到日本后却变成了战争之旗，意为“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全体奋发努力”，每遇大战，都要挂出来，希望以此催发出士兵们拼死卖命的勇气。

此时的小泽治三郎，勇气十足。虽然他已得知对手是拥有十五艘航母的庞大阵容，但他却有信心靠自己的“穿梭轰炸”痛击美军，至少要吃掉对方一半的航母！而他寄予厚望的那些坐在机舱里的新兵飞行员，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送死，就不得而知了。

7点30分，第一波，129架战机出击！一时间小泽治三郎舰队忙着放飞飞机，甚至有些慌乱。若是当年袭击珍珠港的精锐还在，他们绝不会是如此水准，这样还袭击什么珍珠港？如此磨磨蹭蹭、慌慌忙忙弄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完成起飞出击，那些新兵的作战素质可想而知。

日军将领却普遍沉浸在“穿梭轰炸”的幻想之中，纷纷前去给面色潮红的小泽道喜：“这次定能报中途岛之仇！”而远在后方的那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更是乐开了花，都有些等不及要开酒庆贺了。

就在这一群日军将领沉浸梦幻中难以自拔时，却有一艘美军潜艇悄悄地浮了上来，编号SS-218，绰号“大青花鱼”。

❖ 美军潜艇猎杀

在日军偷袭珍珠港时，“大青花鱼”还躺在造船厂中，尚未竣工，但它赶上了这场战争最剧烈的一段时间，1942年6月1日正式服役。自服役开始，“大青花鱼”就多次独自出航，猎杀日

军舰船。在遇到“大风”号之前，它的战绩是击沉9艘，其中包括两艘驱逐舰、一艘轻型巡洋舰。

当时驱逐舰是专门用于反潜的舰种，通常情况下，潜艇遇到这个对头，都是掉头溜之大吉，或者深潜入海躲藏。但太平洋上的美军潜艇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遇到日军潜艇，不仅不会逃走，还要硬碰硬地展开对攻。

“大青花鱼”现任艇长布兰查德，虽然刚刚到岗半年多，却已用实战表现证明了自己是勇将中的勇将。在其指挥下的第一次出航中，就大胆对一支日军护航船队进行攻击，而且还是攻击的驱逐舰。在击沉一艘“涟”号驱逐舰后，它遭到其他日军驱逐舰多达60枚深水炸弹的围攻，带伤逃脱之后，还在海上游弋了两周，耗尽补给方才悻悻而归。

1944年5月，布兰查德艇长带着他麾下50多名艇员，再度驾着“大青花鱼”踏上战场。不久便接到来自洛克伍德司令的急令，前去塔威塔威岛附近狩猎日军航母。

在多日毫无发现的狩猎之后，6月19日夜， “大青花鱼”的声呐侦测到密集水声信号，这表明有一只强大的日军舰队就在附近。

当时“大青花鱼”的附近还有一艘美军潜艇，编号SS-244，“棘鳍”号。艇长科斯勒，虽然比布兰查德年轻许多，却是一个勇猛不输这位前辈的可畏后生。联手干一场？根本不可能！

因为当时潜艇之间通信极其的不发达，实际上处于作战状态的它们，彼此之间是根本谈不上真正的通信，只有偶尔浮出水面接收一下来自地面指挥站的信号，发出信号也不是不可以，但那意味着自行暴露，也就是主动送死。

故而，此时“大青花鱼”根本就不知道附近有几个同伴，更遑论要联手。单靠自己这艘潜艇，要去袭击如此大的一支日军舰队，可谓十分危险，弄不好就是艇毁人亡。潜艇与水面舰艇不同，一旦沉没，就是集体葬入深海，逃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即便自己临阵逃走，回去也不会有军法伺候，



二战中的日军航母舰队指挥官小泽治三郎。

因为潜艇艇长有权根据实际战况决定进退，美国海军更不会强求一艘潜艇去挑战一支舰队。布兰查德的抉择是？前进！

在他高超的指挥下，“大青花鱼”潜航于水中，朝着日军舰队的信号来源区摸去。待到6月19日8点左右，感觉已经到达了理想的攻击阵位后，布兰查德将潜艇上浮到距水面10米左右处，升起潜望镜，进行目视侦查。

由于潜望镜这个伸出水面的小东西，会随着潜艇移动而在水面上拉出一道颇为可观的浪花来，因此但凡以此侦查，都是快升快降，艇长要在十几秒甚至几秒钟内就判断清楚敌情。

结果在布兰查德的那一瞥之间，他惊呆了。“大青花鱼”居然钻到了日军舰队中间！也就是说，此时这艘美军潜艇的位置，就在那些狂欢的日军将领旁边不远处的水下。

现在想退也退不了了。布兰查德很快又第二次升起潜望镜，因为他已决定展开攻击，哪怕由此招来一支日军舰队的围攻。只需确定先打哪一个。一个庞大的身躯出现在他的潜望镜中，显然那是一艘航母，根据舰船识

别手册判断，应该是日军仅存的三艘大型航母之一——“祥鹤”号。

绝好的目标。但很可惜，由于“大青花鱼”钻得太深入，距离“祥鹤”号太近，角度也不是太好，发射鱼雷攻击难度很大。在降下潜望镜前，布兰查德发现紧随“祥鹤”号之后，还有一艘更加庞大的航母，正在高速迎风转向。距离稍远，但角度极好！

就是它了！布兰查德立即指挥潜艇向最佳攻击阵位潜航过去。摸到大约五千米左右后，布兰查德下令攻击。艇首六发鱼雷齐射！“大青花鱼”艇首一共就6具鱼雷发射管，通常情况下是齐射两发，如果是打商船，还只是用一发，因为潜艇空间有限，也就能带二十来发鱼雷，一次就来个火力全开，用掉6发，实在奢侈。不过若是打航母的话，这点本钱还是要花的。

而此时刚刚升空的一名日军飞行员，突然发现海面上出现了6条白色轨迹，正在高速向自己的母舰“大凤”号奔去。鱼雷！大约此人乃日军飞行员中残存的精锐，发现如此险情，电光火石间便按下机头，向其中威胁最大的一条鱼雷扎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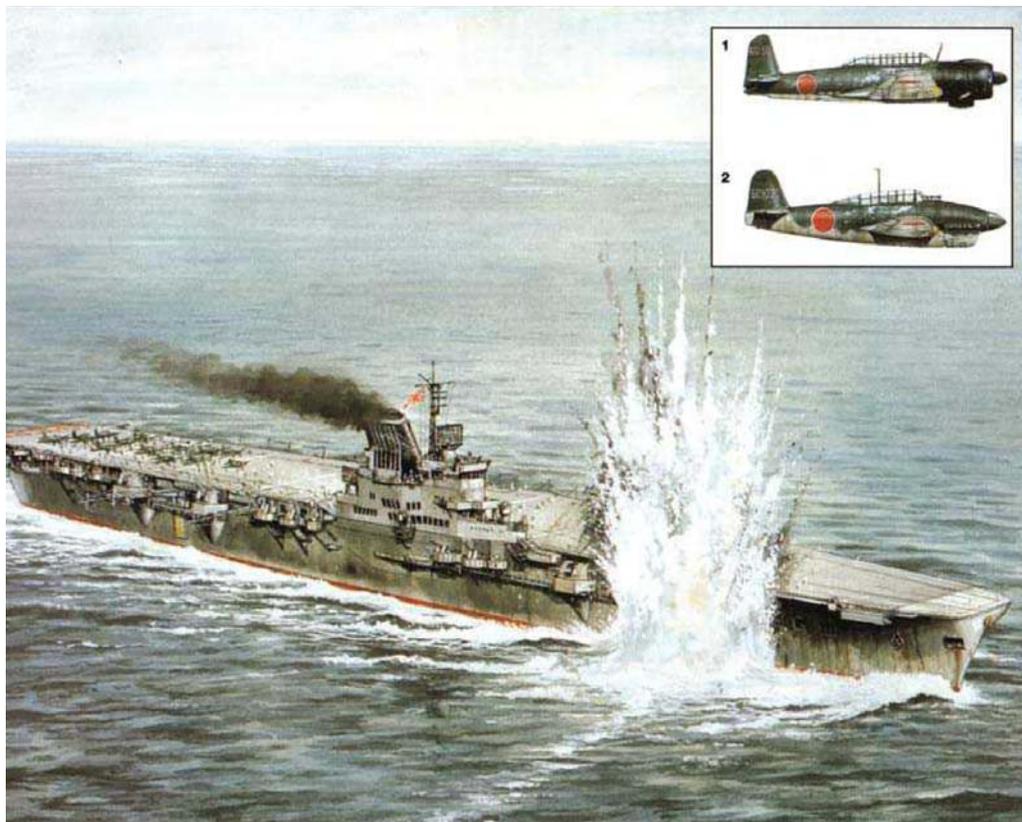
他想将其撞毁。以美军鱼雷每小时80多公里的高速和四、五米的个头，混于浪花之中，想用飞机将其撞毁，这种高难度动作是否成功，各种资料说法不一。但有一点统一，那就是在此人扎下飞机的同时，附近保护航母的日军驱逐舰也终于反应了过来，立马就有三艘围了上来。

布兰查德是勇将，不是莽将，若能逃，何不逃？他下令紧急下潜100米，到最大潜深。数十枚深水炸弹在“大青花鱼”头上炸开，海面顿时沸腾起来。在深水炸弹爆炸前，从潜艇声响中听到一声闷响。

击中？击伤？击沉？

❖ 赔了夫人又折兵

“大凤”号舰长菊池朝三是一位资深的航母



舰船画家笔下关于“大风”号航母被鱼雷击中的情景。

舰长，在发现那架“坠海”的飞机后，便立即察觉到这是极度危险的信号，在瞭望哨惊呼鱼雷来袭之后，他倒也有冷静而沉着的反应，立即指挥航母以高速继续转向，企图将鱼雷闪避过去。

依靠“大风”的强大性能，多枚鱼雷都扑了个空。但还是有一枚咬上了“大风”的舰首附近。

美军鱼雷的战斗部装药量不到 300 公斤，但并非纯炸药，而是一种混合高爆炸药，威力大大高于 300 公斤炸药，因此“大风”那号称能抗 300 公斤炸药的水下防御力，根本就顶不住。

这枚鱼雷爆炸造成的破坏，使得“大风”的一部升降机卡住不能动。更大的忧患在于，击中部位靠近舰首油舱，如果处理不及时，有造成二

次油气爆炸的危险。

当时正在“大风”上信心百倍看着攻击机群出发的小泽治三郎等人，遭此变故，却依然是兴致不减分毫。因为从水面上来看，“大风”只是冒了一股青烟，既没有轰然爆炸，也没有舰体倾斜，损管部门传来的消息也是：“并无大碍！”

只是由于那部正在降下的升降机卡住，导致前甲板出现了一个空洞，不补上的话后续飞机如何起飞？小泽治三郎下令想方设法填平，于是“大风”上的水兵一阵忙乱，连食堂的椅子都搬了出来，草草将那空洞填平，让几架飞机试着起飞成功后，小泽治三郎便继续信心百倍地发出了第二、第三、第四攻击波。随后他就伫立于舰桥上，等待着

放出的四波战机带回来的捷报。结果，先从脚下传来了噩耗！

“大风”作为一艘装甲航母，采用了全封闭舰体设计，以提高防御力。但此种设计有一大弊端，那就是一旦受创，爆炸形成的油烟、热气等等就会被封在舰体内，不及时疏散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日军当时不仅不疏散，还给堵上了。

甲板下的损管人员发现情况越来越糟。尤其是油舱开始在高温高热下破裂后，油气混入空气中，形成有毒气体，许多损管人员纷纷昏厥。情急之下，军官们才想起要通风散气。一时间所有损管人员拼了命地想办法通风。忙中出错，不知什么原因，竟然弄出火花来。瞬间引爆！

下午2点30分左右，“大风”发生剧烈爆炸，化为“火凤”。在它之前，那艘被“大青花鱼”放过去的“祥鹤”号，已在“棘鳍”号潜艇的勇猛攻击下，被命中四枚鱼雷，沉入海中。

而小泽治三郎寄予厚望的四波攻击队之第一波，也刚刚返航不久，一百多架飞机只有四架生还。不过据飞行员报告称，战果巨大，至少击沉了五艘美军航母。“穿梭轰炸”成功了！虽然牺牲巨大，但只要能击沉美军航母，就是胜利。

故而在大爆炸后宣告死亡的“大风”，并未引起小泽治三郎的伤感，“祥鹤”也是一样。抱着天皇画像从“大风”转到“羽黑”号重型巡洋舰上的他，估算着美军15艘航母在自己的四波攻击下，大约只有两三艘残存，自己手里还有7艘！因此他的计划是入夜后继续攻击，要美军航母全军覆没！

真实的情况是如何呢？真实的情况是这四道几乎全由新兵发动的攻击波，撞上了美军数百架老练飞行员驾驶的战斗机，外加无数高炮组成的铜墙铁壁，大多都被打得凌空爆炸，偶有侥幸突破火网者，采取自杀攻击战术，也只能给美军舰船造成轻微损伤。由于空战完全是一面倒的打靶游戏，美军飞行员戏称此战为“马里亚纳打火鸡比赛”。

可叹小泽治三郎对此浑然不知，还想凭借手中残存不到百架飞机的兵力，“追杀”美军。结果是他被追杀。

第二天下午3点40分左右，美军侦察机终于发现日军舰队位置，顿时便有大批战机杀了过去。此时小泽治三郎已经得知真实的情况，美军航母毫发无损！沮丧至极的他，只有下令高速逃离。

大战结束。在付出包括“大风”在内的3艘航母沉没、600多架飞机损失之巨大代价后，小泽的“穿梭轰炸”带来的战果是几艘美舰轻伤、100多架飞机损失，注意，这100多架中有大半还是美军自己夜间降落航母时的事故所造成。

赔了夫人又折兵。“绝对国防线”被攻破。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后，立即抢修出能起降B-29重型轰炸机的机场，以此为基地，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

而在此战中建立奇功的“大青花鱼”，在当时忙着下潜躲避日舰攻击，根本没有机会确认战果，唯一的一声闷响不能说明什么，布兰查德艇长还认为自己“失去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20多天后，“大青花鱼”回航基地，受到热烈欢迎，原因是他们击伤了一艘日军航母。因为美军情报人员从截获的日军电报中，发现“大风”的呼叫代码在此战后消失，保守估计是被击伤，回厂修理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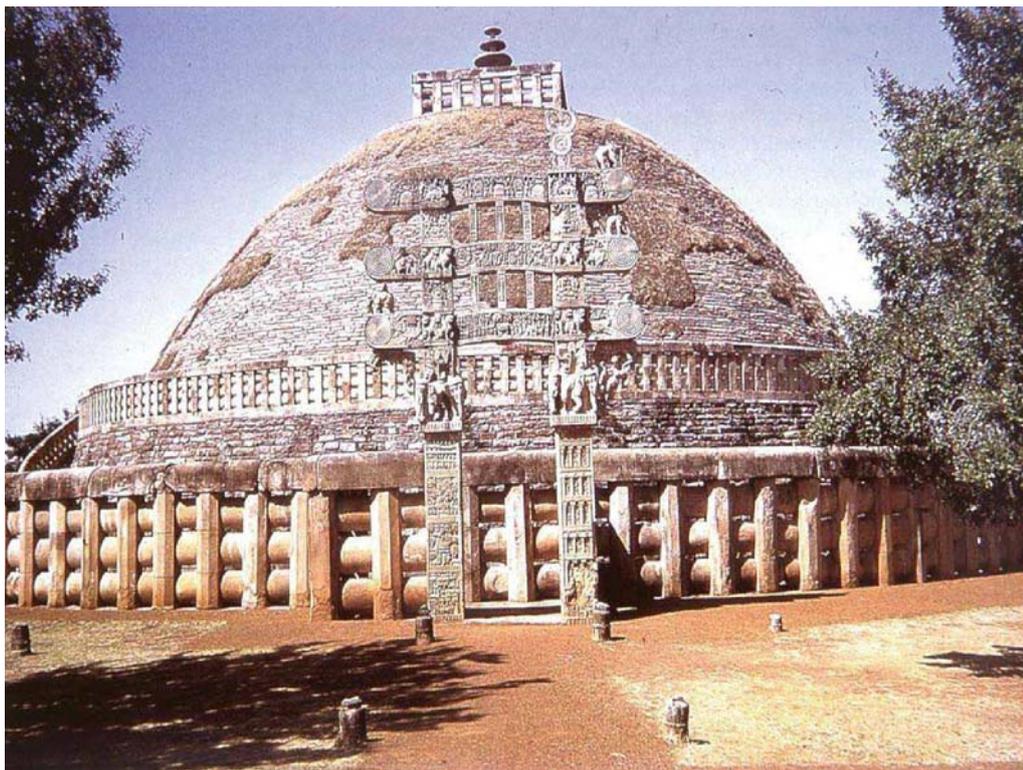
直到数月后，从一个被俘的日军水兵那里，美军才得知这艘航母早已在当时沉没于大海之中了。

从严格意义上讲，“大风”的猎杀者并非“大青花鱼”，而是“大风”自身，因为全封闭的设计，加上损管人员的“帮助”，“大风”——这艘号称日军最强装甲航母的3万多吨巨舰，才能在挨了一枚鱼雷的情况下就沉没大海。

1944年11月7日，“大青花鱼”在日本北海道附近进行巡航时，不慎碰上水雷（极有可能是美军B-29轰炸机所布设），受创沉没。^①

桑奇大塔：西方佛国的世俗情怀

文、图 | 陈仲丹



桑奇大塔。

桑奇大塔是重要的佛教圣迹，印度早期佛教三大遗址之一，但现在人们对其知之甚少。即使在古代，去印度取经的中国人也很少去那里巡礼。唐代高僧玄奘在印度居住十余年，回国后写下《大唐西域记》，书中提到三大遗址中的阿旃陀石窟，对桑奇大塔却只字未提，因而有必要对这一有着重要地位却又为人们陌生的重要宗教遗迹有所介绍。

❖ 佛塔溯源

佛塔最早出现在印度，在古印度的梵文中称为 Stupa，意思是“坟”，中文译为窣堵波、塔、

浮屠等。窣堵波最初是佛家弟子为存放佛陀释迦牟尼的舍利（残余的骨烬）而造的建筑。据史书记载，释迦牟尼圆寂后，他的弟子阿难等人将其遗体火化，形成了五色晶莹的舍利。这些舍利被分作八份，置于瓶中，在各地建了八座塔庙供奉。

这时印度的佛塔数量还不多，后来古印度兴起的大修佛塔之风与阿育王有很大关系。阿育王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即位后就致力于征讨南印度的羯陵伽国。在激烈的争战中羯陵伽国有10万人死于沙场，还有15万人被俘。据说阿育王在征讨羯陵伽战争获胜后不久受高僧感化皈依佛门，对发动战争深感悔悟，于是转而大力宣扬佛教，并派人去国内外弘扬佛法，

比如派他的儿子去锡兰传教。他传布佛教的一种方式是在各地建造佛塔。阿育王开掘了存放有佛陀舍利的七座塔庙，将舍利分成许多份，在全国建塔 84000 座，分置这些舍利。这一数目肯定有夸大，但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印度的建塔风气之盛。锡兰国王在阿育王之子来传教后就在国内修建了一座佛塔，以供奉佛陀的锁骨舍利。在中国浙江宁波现在也有一座阿育王寺塔，建于西晋年间，也是用来供奉佛舍利的。塔中的舍利后来不再限于佛骨，也包括佛教圣人或著名僧人的遗骨。

印度佛塔的外形如同坟丘，是半球形的，状如覆钵，又名“覆钵塔”。其顶部略平，供奉的舍利就埋在塔顶。这种半球形的建筑式样是从印度恒河平原土著居民在坟上建塔和庙的习俗发展而来的。对印度佛塔样式的来源还有一种比较玄妙的说法，认为古印度人相信天地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球形，而这种半球形正是他们这种天宇观的物质体现。塔顶以伞盖形圆盘串连而成的相轮就是天宇的中轴，信徒以此与天地宇宙沟通。玄奘在印度游历时曾见到 121 座佛塔，其中高的有 300 尺，最低的也有 50 尺。这些佛塔虽然大小各异，但形制大体相同。佛塔从下至上由基座、钵体、平台和相轮四部分组成，塔身是呈半球形的钵体，由砖石砌成，周围绕以石栏杆，在四方开门，门栏上刻有与佛教相关的石雕。

❖ 桑奇建塔

桑奇大塔是印度最大的一座佛塔，位于今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城东北一个叫桑奇的村子。佛塔建在一座小山上，山上共有三座塔，桑奇大塔最大，其余两座分别名为桑奇二塔、桑奇三塔。这个地方释迦牟尼生前没有来过，其与佛教的因缘主要与阿育王有关。大约在公元前 250 年，阿育王亲自选定桑奇为隐修地，从波斯召来匠人在高处建造波斯式样的纪念柱，也就是阿育王石柱，从此这里便成了圣地。后来阿育王在此造塔，他最初建的是砖塔，比现在人们见到的桑奇大塔要小得多。砖塔呈覆钵状，建在圆形的基座上，内藏舍利。



印度佛塔的外形如同坟丘，是半球形的。其顶部略平，供奉的舍利就埋在塔顶。这种半球形的建筑式样是从印度恒河平原土著居民在坟上建塔和庙的习俗发展而来的。



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后，当地有个富商资助的僧团在原有砖塔的基础上扩建这座塔。他们保留原有的砖塔，只是在外用石块垒起一个新的大穹隆，直径增加了一倍，再在外面包上一层砂石，涂上银灰色和金黄色灰泥。塔身仍是半球形，高 16.5 米，直径大约是高度的两倍，这样的比例关系使半球体显得更为标准，看起来更富有神秘感。整个大塔的造型单纯、浑朴，具有明显的稳定感和重量感。建造者还在塔的南侧增修了楼梯和上下两层围栏，围栏也用砂石建造。塔的钵体顶部立有伞盖状的三个相轮，这三个相轮也有寓意，代表着佛教的三宝——佛、法、僧。塔的底座周围有宽约四米的环道，道边有仿木结构的石栏杆。朝拜的香客由东门进入，然后按顺时针方向绕塔三周敬拜，使大塔始终处于自己右侧。香客巡礼的路线与太阳运行的轨迹在方向上一致，以表示他们与天地宇宙融为一体，从混沌世界上升到了圣灵境界。除桑奇大塔外，在它周围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僧院建筑群，建造了庙宇、僧舍、经堂等建筑。

公元前 1 世纪，在大塔围栏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造了一座石门。这四座门形如牌坊，高约 10 米。每座门是在两根方形门柱上横架三根门梁而成。门梁两端呈圆形，刻以旋纹，类似卷轴。四周的栏杆和门柱、门梁轮廓精巧玲珑，把半球形的塔体烘托得更加宏大、庄严。后来佛教在印度的重要地位逐渐被印度教取代，这座大塔遂被人遗弃，无人问津，到 1818 年它被英国人发现时已相当残破，尤其是塔顶的相轮已不存。接踵而来了各种人，有学者，也有寻宝人。1822 年英国人约翰逊上校从一侧破开大塔，想从中寻得珍宝，发现它是实心的才作罢。直到 1881 年桑奇大塔才得到保护。1912—1919 年，在考古学家马歇尔的支持下桑奇大塔得到修复，形成现在的样子。

❖ 佛陀故事

桑奇大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将建筑与雕刻糅合为一体。在大塔的门柱、门梁上通体都有表

现佛教内容的石刻。这些石刻是由虔诚的信徒（供养人）出资雕成的，出自擅长精雕细刻的印度牙雕工匠之手。雕刻的构图饱满，笔触精致，仿佛是放大的象牙雕刻，有一种特别的形式美。它们体现了早期佛教雕刻的风格，其中不少浮雕描绘的是佛陀故事，通过长幅的画面来展现连续的情节，讲述释迦牟尼的生平，但却从不出现他的形象，而是代以菩提树、王座等相关的象征物。以后的佛教造像就不是这样，而是热衷于雕造佛陀巨像，如在阿富汗依山开凿的巴米扬大佛（后被塔利班毁掉）。对早期不出现佛像的造型传统专业术语称为“不设像”。著名佛学家吕澄对此解释道：“由当时雕刻之技术云，雕刻人像并非难事，而故意避开，别取象征法代之者，或许出于对佛之崇敬，以为佛之形象圆满无可比拟也，是亦一种理想主义之表现。”桑奇大塔雕刻的人物以世俗形象为主，多是王者、贵族、武士、侍从，是用世俗的表现方式讲述佛国故事。

桑奇大塔塔门浮雕的题材多出自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前者表现佛陀在世的生活，后者表现佛陀前世的生活。“白象入胎”是佛传故事的开篇，说的是佛陀的母亲摩耶夫人结婚后，多年没有生养，直到30多岁，一天夜里，她梦见一只六牙白象扑向怀中，就此得孕。紧接着的故事是“诞生”，摩耶夫人诞育太子。据佛经记载，摩耶夫人是在回娘家的路上生产的。“天竺礼俗，妇人临月，归父母国。”她途经蓝毗尼园在树下“生菩萨”，而且太子是从右肋（腋下）出生。桑奇大塔的诞生图不描绘树下出生场景，更不能让太子在画面中“腋下出生”，而是重点表现佛母。画面中央有一大朵莲花，花瓣下覆，花心里坐着一手持莲一手抚腿的佛母。两侧各有一支仰莲，莲心里结出的莲蓬上站着高举水罐向下灌顶的大象。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上摩耶夫人的形象，是一个丰满、圆润、柔美的女性造型。这种审美意趣与印度河流域考古发掘出的4000年前生殖女神的雕像极为相似。这正是印度艺术中理想的女性形象，与其

说是宗教图绘，不如说是极致的世俗审美感受更为适当。

桑奇大塔的浮雕中也有佛本生故事。据说佛陀前世曾是白象、猕猴、孔雀等动物，或是某个国王。本生故事的素材不少是直接取自印度原有的寓言故事。佛本生故事雕刻在桑奇大塔数量不多，但在艺术上也很有特点，仅举其中的六牙象王故事为例。这个故事说的是佛陀的前世曾是有六根牙的象王。象王有一妻一妾，因宠爱正妻，为妾所恨，妾发誓报复，气绝而死。妾死后魂灵变为美女，被一国王娶为夫人，很受宠爱。一天，由妾变的夫人对国王说，她梦见有一头六牙之象，想用这头象的牙做首饰，如得不到就会活不成。对夫人言听计从的国王派出射手，找到六牙象王，坦言要他的牙，象王舍牙，很快殒命。夫人得到象牙，注目视之，突然雷电大作，夫人当场吐血而死，死后入地狱。其故事情节曲折，又有因果报应的宿怨，内容很动人。对这个本生故事，在桑奇大塔上并不正面表现故事情节，用一棵大树将画面分割为二，以长鼻卷起一束莲花的六牙象王分别出现在大树两边，下方是映在水波中的莲叶、莲花和莲蕾，甚至在水中还有一只被大象戏弄的鳄鱼。

❖ 世俗情怀

除了佛教故事外，桑奇大塔石雕中的象、狮、异兽、药叉女神等也都很传神，尤其是东门斗拱边的一尊树神药叉女圆雕，更是活灵活现。药叉女双臂攀援芒果树枝，纵身向外倾斜，宛若悬挂着凌空飘荡，在横梁和立柱间形成了完美的支撑。她头部内倾，上身向外突出，构成了优美的体形曲线，属于三屈式印度标准人体美的范式。按照印度传说，药叉女是花树精灵、生殖女神。据说花被她的左脚轻轻一碰，立刻就会开放。有她在植物就开花，生命就繁荣。药叉女的形象体现了印度标准的女性美：丰乳、细腰、肥臀，还有附

01

02 | 03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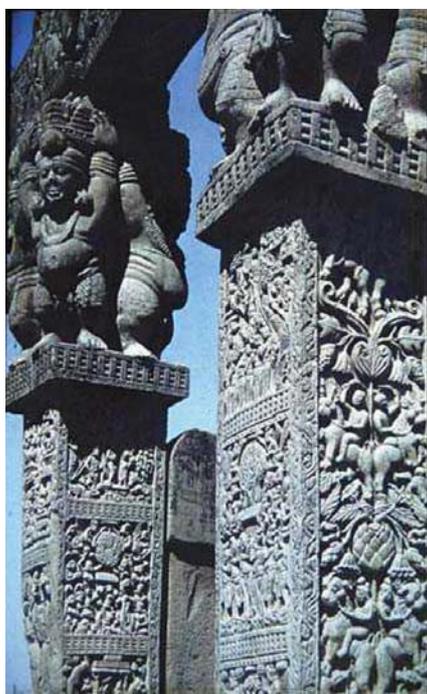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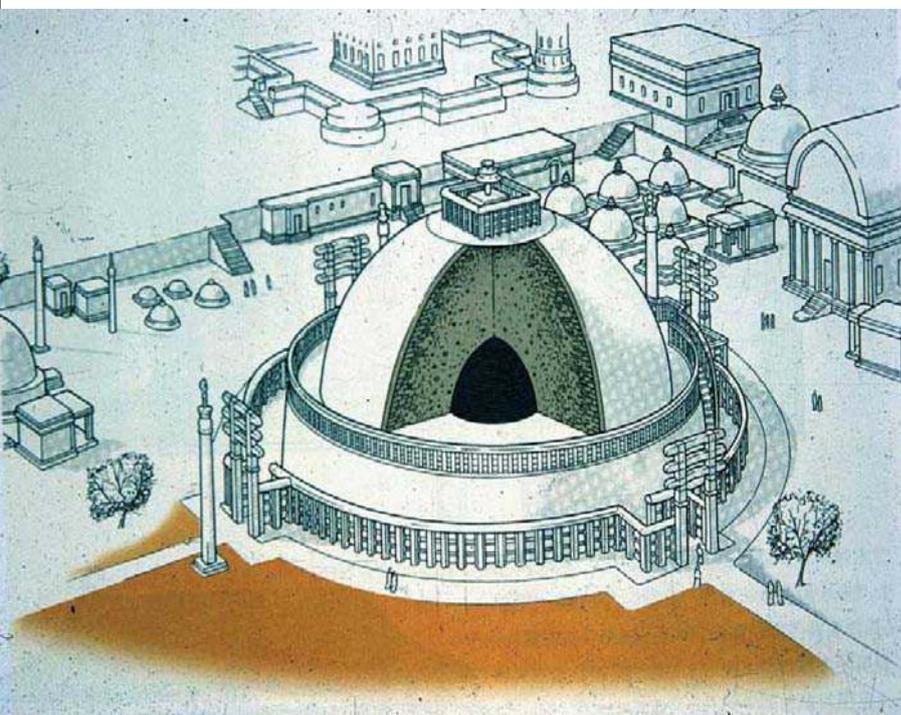
桑奇大塔剖面图，可见里面原先的砖塔部分。

02

桑奇大塔南门。

03

桑奇大塔西门柱头的侏儒像。



着于身体烘托其美的饰品，沉甸甸的珠宝项饰，重叠的手钏脚镯，松松系在肚脐下边的联珠腰带。在中国的佛教艺术中见不到药叉女的形象，她是印度文化的产物，在佛教东传来中土的路途却佚失了。

在桑奇大塔的雕刻中还明显反映出外来文化的影响。门的柱头上有四个一组的侏儒群像。他们背对而立，举臂挺腹，形如金刚力士，模样奇特，这显然是受波斯工艺的影响。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曾被波斯人统辖，自然会留下一些异域痕迹。

在叙事性图绘之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桑奇大塔雕刻中的装饰纹样，尤其是植物类的花卉藤萝。首先是莲花，它是佛教的重要象征物，很早就被梵文典籍提到，有精灵的肚脐或是口中吐出莲花的传说，后来融入佛典，在图绘中多作佛教故事的配景，也用于边框和立柱的纹样装饰。作为装饰，在桑奇大塔中更有特色的是“缠枝卷草”，又称“如意蔓”“如意树”“天意树”。其名来自佛经，“人种众果树，不如一人种一如意树，能随人愿，如意皆得”。“天意树，诸天有树，随天意转，所求皆遂，如意皆得。”这种卷曲的藤萝在大塔的各门上都能见到，伸展铺排，环绕勾连，以填充画面。如意蔓传到中国，甚而超出了宗教范围，运用到日常生活的装饰需求，进而衍变为“连枝”图案，成为两心相系的情爱象征。还有一些特殊的装饰纹样，比如动物，常见的有瘤牛，项上有肉隆起；髦马，头顶有高耸的鬃毛。

桑奇大塔的浮雕构图饱满，不留空白，与佛经中常出现的重重叠叠、密不透风的文字风格契合。其布局极尽富丽纷繁，个体又显朴拙、真率之气，这种凑集与疏离的合调，使其在艺术上卓然而成瑰宝。佛教是出世的，而作为佛教艺术典范的桑奇大塔却是入世的，即使在讲述佛经故事时也多展现世俗景象，以细腻的细节刻画蓬勃、峥嵘的生命样态，充溢着对世俗生活的热情向往。这或许就是人间佛教的真意。①



酷历史 Cool History

影像记趣

“真实”的童话 ——迪士尼乐园60岁

酷历史版块编辑：黄弋
邮箱：klsbjhy@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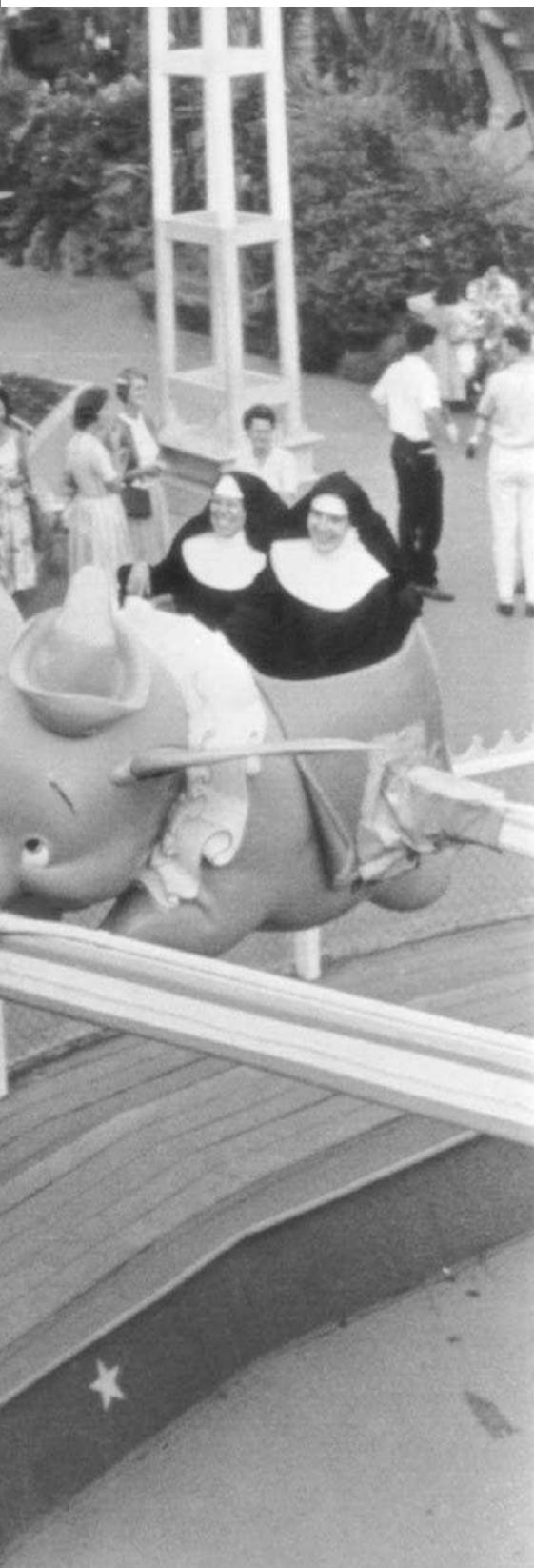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美国动画大师华特·迪士尼已经在电影和电视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创立的米老鼠、唐老鸭等动画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随后，迪士尼决定扩大经营范围，并且将游乐场作为自己的新目标。

作为一名父亲，迪士尼经常带领自己的两个女儿去动物园、嘉年华之类的游乐场所。但是当女儿在各种游乐设施上玩耍时，迪士尼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他设想，应该有这样一种游乐园，可以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这便是迪士尼乐园创办的初衷。经过了几年的规划和建设，坐落在加州的迪士尼乐园于1955年7月17日开园，荧幕中的卡通形象成为了乐园中的主角，童话就这样被搬到了现实世界中。

从开园那天起，迪士尼乐园便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即便如此，乐园内仍然定期添加新的景点。华特·迪士尼说，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想象力，迪士尼乐园便永远不会完成。华特·迪士尼在1966年去世。为了纪念他，在1971年开园的奥兰多的迪士尼主题乐园改名为“华特·迪士尼世界”。此后，迪士尼主题乐园开始走向全球，分别在日本东京（1983年）、法国巴黎（1992年）以及中国香港（2005年）建设了迪士尼乐园。世界第六座迪士尼乐园选址上海，预计将于2016年春季对外开放。

迪士尼乐园是现实世界中“真实”“落地”的童话，无数的梦幻和神奇在这里一一实现。

1962年11月1日，迪斯尼乐园的“天主教学校日”，修女们正在“小飞象旋转世界”游玩。
图/东方IC





01 | 03 | 06
04
02 | 05

01

1956年，迪士尼乐园的空中俯瞰图。

02

1955年，一个小女孩站在迪士尼乐园的睡美人城堡前。拍摄这幅照片时，迪士尼乐园还没有正式开放。

03

1955年，迪士尼开幕当天，主持人给穿着银色制服的“太空人”一瓶饮料。

04

1955年，华特·迪士尼和他的妻子及女儿正在乘坐旋转茶杯，此处被称为“疯狂的茶会”，设计灵感来自于迪士尼的经典动画片《爱丽丝梦游仙境》。

05

1957年，华特·迪士尼与米老鼠一起庆祝迪士尼乐园成立两周年。

06

1955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迪士尼乐园游玩。



1965年，为了庆祝迪士尼乐园成立十周年，华特·迪士尼与迪士尼乐园的首任迪士尼大使 Julie Reihm 共同切开蛋糕。





01	02
	03
	04

01 1954年，华特·迪士尼公布了自己筹划的迪士尼乐园项目的设计图。

02 1963年，迪士尼单轨列车停在明日世界主题乐园。单轨列车可以带游客最快地游览迪士尼乐园。

03 1981年，华特·迪士尼世界的员工共同庆祝园区成立十周年。

04 1955年，迪士尼乐园，游客们坐在遮阳棚中休息，旁边是“明日世界”中的火箭，可以带领游客们完成虚拟的月球旅行。

一战的时尚遗产：风衣

文 | 周可

在战争需求中催生出的“战壕风衣”，从风靡军营到走向民间，成为独行侠、硬汉、社会精英的必备衣着，一步一步从时尚走向经典。



的产物，也是战争时代的标志。它是科学创新、技术进步以及大规模生产的结果，它的历史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故事。

❖ 风衣前史

早期的风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便已经出现了。早在1823年，橡胶棉被用于制作雨衣，供军用和民用。这种“橡胶雨衣”以它的发明者查尔斯·麦金托什(Charles Macintosh)命名。然而，雨衣虽然有着很好的防雨效果，但同时也让人的汗液无法挥发出去，并且还有一种难闻的气味。这种优缺点都很明显的雨衣在整个19世纪主要为英国的军官和士兵所使用。

随着雨衣市场需求的增长，为了克服织物原始使用缺陷，服装制造商开始研发更好、更透气的防水织品。1853年，伦敦梅菲尔区高档时装店的男裁缝约翰·埃玛裔(John Emary)发明了一种全新的防水纺织材料，并且为这种材料申请了专利。随后，他将自己的服装店改名为“雅格狮丹”(Aquascutum)。Aquascutum一词来自拉丁语，“aqua”的意思是“水”，“scutum”的意思是“防御”，合起来便是防水的意思，这家公司专注于为贵族设计在雨天穿着的衣服。约翰·埃玛裔推出的新款雨衣很快便成为了那些穿着考究的伦敦绅士们在雨天的必备服装。

1856年，21岁的裁缝师托马斯·博柏利(Thomas Burberry)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服装品牌。

如今，人们几乎不会将风衣与战壕联系在一起，但风衣确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留给世界的时尚遗产。在一战时，风衣是英国军官衣橱里的必备物品。风衣既是战争时期

一战中，身着风衣的英国军官。

1879年，博柏利从汉普顿郡牧羊人的穿着上获取灵感，发明了一种防水透气的斜纹布料“华达呢”（gabardine）。与雅格狮丹的防水服装一样，华达呢外套很快便在上层阶级中流行起来。质地厚重的华达呢外套也受到探险家的欢迎，当英国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在1907年前往南极大陆探险时，他和他的船员们穿的就是博柏利的华达呢外套。他们使用的帐篷也是由华达呢这种材料制成的，具有十分良好的防风御寒效果。

轻型防水纺织物的出现带来了服装制作技术上的革新。随着材质问题的解决以及像雅格狮丹、博柏利这样主要的制造商逐步到位，风衣的出现已呼之欲出。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正是这个“呼唤者”。

19世纪的战争中，颜色鲜艳的制服一度十分流行。在两军对垒并且进行面对面的肉搏战时，鲜艳的制服可以帮助指挥官在弥漫的战火硝烟中分辨出自己的军队。然而，随着战争技术的发展，远程武器开始成为战争的主导，此时花哨的军队制服只能更容易变成对方攻击的目标。

军事战术需要适应这种新的现实，所以合适的制服被制造出来。英国军队制服首先迎来的是卡其布时代。卡其布是由棉、毛与合成纤维混纺制成的浅土灰色织物。“卡其”在印度语中的意思是“灰尘”。卡其布军服是H.B.拉姆斯登为英国驻印度殖民军队设计的制服，在野外执勤和作战中特别适用。在1857年印度兵变期间，几个英国军团都将士兵的制服染成了这种单调的、接近于大地的颜色。

19世纪90年代，卡其色和迷彩色推广到其他的英军部队中。在1899年的布尔战争中，卡其布军服在战争中的作用得到了证明。身穿卡其布军服的士兵可以有效地与环境融为一体，从而更好地进行游击战。

❖ 战壕与制服革命

战壕战也被称为堑壕战，是敌对双方的部队依托地面挖掘的较持久性的战壕体系组织进攻、

反攻和防御的一种战争形式。战壕战的鼎盛时期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当时战壕从比利时海岸经法国北部一直延伸到瑞士，交战双方数百万人在战壕中对峙。战壕体系由互相平行的三四道或更多战壕组成，弯曲的战壕让敌人在战壕的一端无法向远处战壕内的目标射击。主战壕与其他战壕之间由交通战壕相连，交通战壕的作用是运输装备、传递信息等。密布的战壕网中设有指挥所、隐蔽所、补给站、急救站、厨房和厕所。

战壕又窄又深，由于里面充斥着没办法洗澡的士兵和就近掩埋的尸体，这里的气味通常很难闻。遇到下雨天，这里通常会变得泥泞且肮脏。同时，战壕里经常积满了无法排出的雨水，有时甚至还有那些从厕所中溢出来的秽物。大量老鼠在战壕中出没，士兵身上寄生着虱子。通常士兵都会在战壕里一呆就是几天，并且无法通过睡觉来消磨长时间的无聊等待，因为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随时都有可能迅速展开，并且有可能一击致命。

为了要应付这些战争中的不利条件，战壕风衣才顺理成章地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并由此催生了军队制服的现代化革命。

在过去的战争中，英国军官与士兵都穿着厚重的羊毛大衣或哔叽（用精梳毛纱织制的一种素色斜纹毛织物）大衣。尽管保暖性较好，但是比较笨重。在战壕中，这种厚大衣并不适用。过长的衣摆经常沾满泥土，从而让大衣的重量加重。即使士兵没有携带战争装备，穿着这种大衣也很难在战壕中保持灵活的机动性。士兵在战壕中需要的是那种更加短小轻便的衣服。同时，这种衣服也应该具备保暖、通风、防雨等功能。战壕风衣完全符合这种需求。

但在当时，绝大多数的普通士兵只能分配到卡其布军服，而不是战壕风衣。他们不得不凑合着穿厚大衣。有时士兵们会将下摆剪掉，让自己在战壕里移动更灵活一些。粗糙的布料、不合身的裁剪、低廉的工艺和无处不在的虱子，这些都是让士兵在战壕中难受的原因。

对于那些等级较高的军官来说，军中制服则



在当时，绝大多数普通士兵分配不到战壕风衣，为了让自己在战壕里移动更灵活一些，只能把厚大衣的下摆剪掉。粗糙的布料、不合身的裁剪、无处不在的虱子，这些都是让士兵在战壕中难受的原因。



是一个更美好的名词。1914年，正规军队里的军官开始自己采购制服，并且能够得到50英镑的补贴用于制服开支。毋庸置疑，对于想要穿着体面的英国军官来说，用在制服上的开销一点儿也不便宜。

军队制服的优劣与区别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军队中的等级差别。在英国军队中，士兵们大多是从工薪阶层中应征而来，而军官们则是从上层阶层中选拔出来的。着装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指标。

❖ 最好的战时外套

博柏利与雅格狮丹都从战壕风衣的制造上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并且今天我们也很难说清楚到底哪家公司最先涉足这一行业。两家公司都与英国军队联系紧密，并且也都生产了类似战壕风衣的防水外套。在1853年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雅格狮丹的雨衣就曾经帮助英军抵御俄国的严冬和其他恶劣天气。而博柏利则在1895年就为英国军官设计了一款名叫“Tielocken”的风衣，这种风衣被认为是战壕风衣的早期雏形。

什么样的大衣可以被称为“战壕风衣”？

首先，它是军官在战壕中穿着的风衣。风衣的每个部分都有其特定的功能。战壕风衣采用符合军官制服样式的双排扣设计，一直延伸至锁骨附近。风衣的下摆长及膝盖，这样的长度覆盖了身体的主要部分，而且能够让穿着的人保持足够的灵活度。而且，如果遇到雨天，较短的下摆也不会被拖拽到淤泥中而让风衣变得更重。风衣腰间安装了D形环，可以用来悬挂望远镜、地图盒、匕首或手枪。

一块能够通风的风雨挡也是战壕风衣正面肩部的必备材料。风衣配置了大而深的口袋，这对于装地图和其他装备很有用。袖口的带子可以扎紧，以便在恶劣的天气下起到保护作用。防毒面具可以塞进衣领，从而使其保持更好的密闭性。许多风衣还配备了可拆卸的保暖内胆，其中一些

甚至可以在需要时作为应急床上用品使用。肩膀上的肩章则表明了佩带者的等级。

然而，军官的独特衣着却带来了一个悲剧性的意外后果，那就是在战场上他们更容易成为狙击手的目标，尤其是当他们在战壕上方指挥的时候。到1914年圣诞节，军官的战死率要高于士兵，这导致了英国军队的组成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战前的征募新兵运动中，军队一改传统，对于军官的应征要求有所放宽，允许从士兵阶层与中产阶级之中选拔军官。在此后的战争中，一半以上的军官都是来自普通阶层。这些新晋的军官们得到了一个让人十分不舒服的绰号“临时绅士”，潜台词是说，军官理应由绅士担任，而这些新晋的军官并非绅士。

为了弥补这一差距，新晋军官们希望至少在制服方面可以让他们看起来与从前的军官别无二致。如果一身制服可以让他们看起来有气派，毫无疑问会让这些“新人”大受鼓舞。不断增长的平民军官对于着装的需求，让风衣在这场商战中脱颖而出。似乎军事装备可以解决这些士官所有的问题。看到商机的英国服装商会说：“没问题，我们一个星期就可以帮你做出一件上等制服。”军官们或许这样回答：“这些套装我全都要了。”于是，一项难以置信的商业比赛出现了，那就是提供最好的套装。

有趣的是，这一时期的广告表明，即使是军官阶层的实际内部人员组成改变了，但军队中对于“理想军官”的想象仍然是略带贵族气质的绅士形象：他们在战场上身着舒适的定制服装，气定神闲地指挥战斗。报纸的插图甚至描绘出这样的场景：在前线的军官们闲暇时会喝红茶，并且听着留声机里的管弦乐进行放松，尽管这种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与血腥的战壕之间其实大相径庭，甚至毫无关联。

在战争中期，这种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是战壕风衣带来的。战壕风衣象征着理想军官的派头与品位，同时也表现出它是中产阶级身份特征与审美需求。新晋士官经常花费3或4



01	02
----	----

01

博柏利设计的一款名为“Tielocken”的防雨风衣，它成为了战壕风衣的前身，风靡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军官之间广泛流行。

02

1916年，博柏利风衣的广告。

KEN

Will be sorry
on against
net. —H.S.

Officers'
Complete
Kits in
2 to 4 Days
or Ready
for Use

NAVAL & MILITARY
WEATHERPROOFS
During the War
BURBERRYS
CLEAN AND
RE-PROOF
Doubly covers every
vulnerable part of the
body, providing the most
efficient and comfortable
safeguard yet invented.
Fastens without buttons.

Burberry
est
olving exposure
the under such

SERVICE SAFEGUARDS

**"That Defy the
Wildest Weather"**

Designed by Burberrys and made in exclusive Weave-Proof materials, they Provide a dry and comfortable defence against driving rain, sleet or snow. Give effective security without the aid of any heat-condensing agent—such as rubber or oiled-silk—that would make them injurious to health and comfort. Exclude biting wind and are luxuriously warming. Strong and durable, withstand the roughest usage.



The Tielocken

Doubly covers every vulnerable part of the body, providing the most efficient and comfortable safeguard yet invented. Fastens without buttons.

The Burberry

Thousands of Officers prefer world-famous weather-proof to all other coats, because "The Burberry ensures comfort and security in every kind of weather."

**Officers' Complete
Kits in 2 to 4 Days
or Ready for Use.**



Illustrated
Naval or
Military
Catalogues
Post Free.

Burberry Trench-Warm

Combines the services of three coats in one garment. A WEATHERPROOF that keeps out any rain that an oilskin will; a smart Camel Fleece BRITISH WARM; and a staunch TRENCH-WARM that provides warmth and comfort on the bitterest day.

MOUFFLON

The fleece of the Corsican mountain sheep, famed for its warm-keeping, light-weight properties. A perfect pelt for Military use.

TRENCH AND BRITISH-WARMS, Lined Moufflon Fleece.

Burberrys hold an immense stock of Fur Coats for Motoring, Aviation, Military and Civilian wear.

英镑来购买一件做工精良的风衣，这无疑是一笔相当大的花销。要知道，当时普通士兵每天才挣一个先令，而20先令才等于1英镑。

战壕风衣很快风靡欧洲其他国家，并传播到美国。美国军方的《星条旗报》不仅刊登了有关战壕风衣的广告，而且将其形容为“最好的战时外套”。到1917年8月，人们在《纽约时报》上可以读到战壕风衣的消息。报道称，即便在美国，这些从英国进口的风衣不仅在现役士官中销路很好，而且有望成为前线士兵正规装备的一部分。

然而，战壕风衣并不只是盟军军官的专属，在战争中期，普通民众也开始购买战壕风衣。从某种程度上说，平民身穿军用风衣成为一种爱国主义行为，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展示战时团结的一种方式。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展开，精明的商家几乎把所有的商品都贴上了“战壕”的标签，无论是厨房用品，还是珠宝首饰。如果某件商品贴上“战壕”的标签，顾客在购买时会产生一种爱国的感觉。

❖ 一战之后，走向经典

一战结束后，战斗的伤口开始结痂，并且硬化为伤疤，但是已经普及的战壕风衣却依旧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风衣对于那些退役的军官是一种光荣的凭证。军官们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再有过去的地位，并且不得不开始从事新的岗位。无论如何，他们临时绅士的身份即将失效，但是通过身着风衣，可以唤起他们对于那种身份的回忆。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里，战壕风衣仍然留存于公共意识之中。二战爆发后，战壕风衣又一次成为军队的标配。此外，战壕风衣继续风靡的原因在于它不断地出现在好莱坞的电影里。当电影中那些冷静精明的侦探与充满魅力的硬汉身穿风衣出场的时候，风衣俨然是他们最好的装束，甚至是整体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莱坞男星亨弗莱·鲍嘉在电影《马耳他之鹰》与《卡萨布兰卡》中身穿战壕风衣的硬汉形象深入人心，以至于在此之后，风衣成为了黑色电影男主角的必备着装。

如今，风衣成为独行侠的首选外套，但仍然是社会精英衣橱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也正是风衣让人着迷的地方，它既可以合适地穿在英国王储、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的身上，也可以让好莱坞明星哈里森·福特在电影《银翼杀手》中扮演的赏金猎人更加有型。风衣是怀旧的，也渐渐蜕变成成为时尚的经典。就像蓝色的牛仔裤一样，风衣已经成为人类服装史的一部分。①

古代那些与官场风波有关的“离婚”

文 | 李晓巧

现代的“离婚”多数是因为婚姻双方性格不和、家庭矛盾或婚外情等所致，而中国古代，男女婚姻更多地体现着双方家族的利益，政坛风波、官场变动时常会导致棒打鸳鸯，使一些婚姻瞬间破裂。

❖ 皇权力量强令夫妇“离婚”

《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三记载，永元元年（公元499年），权臣徐孝嗣被昏庸的齐帝萧宝卷赐酒毒死，政坛发生变端。原先，“南徐、兖二州刺史江夏王（萧）宝玄娶徐孝嗣女为妃”，当齐帝铲除徐孝嗣后，同时下旨给江夏王萧宝玄：“诏令离婚”。本来江夏王夫妇关系挺好的，但是，皇权大于天，虽然“宝玄恨望”，江夏王还是不得不同王妃“离婚”。然而，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年，永元二年（公元500年），崔慧景反叛朝廷，被皇帝逼令离婚的萧宝玄挟恨于京口“开门纳（崔）慧景”，并随叛军进攻京城。后来，叛军兵败，萧宝玄也被处死。1500多年前的这场因政治风波而起的离婚案例，于家于国于个人都是悲剧。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与堂兄杨瓌关系一直不好，杨瓌的老婆是前朝北周高祖的妹妹顺阳公主，她与隋文帝的老婆独孤皇后更是针锋相对。于是，史上泼辣有名的独孤皇后就撺掇自己老公下行政命令叫杨瓌把老婆给休掉。但是，杨瓌这个人挺拗的，不肯同妻子离婚。结果，在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秋，八月，（杨）瓌从帝幸栗园，暴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本来很强壮的一个人，跟皇帝去出个差，眨眼间就病死了，所以，“时人疑其遇鸩”，怀疑他是被毒死的。可见，

封建时代王公大臣娶什么样的老婆，婚姻能不能延续，那都必须得听皇帝的。

再说，公元604年隋炀帝即皇帝位，将大臣柳述、元严撤职流放。柳述的老婆是隋炀帝的妹妹兰陵公主杨阿五，于是，“帝令兰陵公主与述离绝，欲改嫁之”。兰陵公主对老公一往情深，“公主以死自誓，不复朝谒，上表请与述同徙。”隋炀帝大怒。公主在忧愤中去世，时年32岁，“临终，（兰陵公主）上表请葬于柳氏。帝愈怒，竟不哭，葬送甚薄。”（《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

❖ 一方势力衰败，另一方主动提出断绝婚姻关系

历史上，因为婚姻一方势力衰败，另一方主动提出断绝婚姻关系的例子不在少数。如，晋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皇后贾南风陷害太子司马遹谋反，昏庸的晋惠帝听信贾皇后的话，“废太子为庶人”，将太子和太子妃王氏，以及太子的三个儿子一起“幽于金镛城”。太子妃的老爸极具政治敏感性，立即向皇帝上疏，请求同意自己女儿与太子离婚。碰到如此识相的大臣，贾皇后当然同意，“（太子）妃恸哭而归。”这个上疏奏请女儿离婚的老爸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清谈家、西晋末年的重臣王衍，为人滑头、势利。几个月后，太子写信给前妻王氏告诉贾皇后陷害他的实情，“自陈诬枉，妃（王氏）父（王）衍不敢以闻。”作为朝中重臣、太子岳父双重身份的王衍明知太子被诬陷，竟然熟视无睹，可谓冷酷至极。不过，如果当时太子妃王氏没同太子离婚的话，其性命恐怕的确难保。不久，太子的母亲以及太子的侧室、

Tips

古代礼法规定，当妻子符合“七出”中的任何一种条件时，丈夫及其家族便可以要求休妻（即离婚）。“七出”包括：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盗窃。

长子连同太子本人先后都被谋害了。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在少数。譬如，三国时曹魏的大将军、权臣曹爽的堂弟媳妇夏侯令女，当公元249年曹爽被司马懿诛杀后，很多原本依附曹爽的人纷纷转向，夏侯令女的父亲也决定同曹家断绝婚姻关系，“强迎以归”。又如，公元710年，唐睿宗父子与太平公主一起推翻了韦后、安乐公主的政治势力。秘书监下王李邕的老婆崇国夫人是韦后妹妹，为了向新统治者表忠心，“（李）邕杀其妻，送首於朝，议者鄙之。”对于李邕为讨好新主子而杀老婆的行为，时人以及后世都极其鄙夷。

无独有偶，当时杀老婆表忠心的还有一个高官，名叫窦怀贞，“御史大夫窦从一（窦怀贞）各手斩其妻首以献。”（《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因为，窦怀贞曾依附皇后韦氏，娶了皇后的乳母为妻，当韦皇后势力消亡后，他也毫不犹豫地像李邕一样把老婆的头斩下来献给了新权贵。在当时政治风波之下，窦怀贞与李邕的老婆连“离婚”的机会都没有，就做了冤魂。而杀妻媚主的窦怀贞后来与太平公主结为朋党，官至宰相。公元713年，唐玄宗在太平公主图谋政变前先发制人，诛杀太平公主党羽，窦怀贞畏罪自杀，唐玄宗下令戮其尸，改其姓为“毒氏”。

❖ 面对变局，也有坚定的婚姻捍卫者



公元710年，韦后、安乐公主的政治势力倒台。秘书监下王李邕的老婆崇国夫人是韦后妹妹，为了向新统治者表忠心，“（李）邕杀其妻，送首於朝”，时人以及后世都极其鄙夷。



尽管封建时代政坛变幻莫测，影响了很多的家庭婚姻，但是，历史上也有一些让人敬佩的婚姻捍卫者。

王莽的女儿是汉平帝的皇后，当14岁的汉平帝被王莽毒死后，没多久，王莽篡位建立新朝，于是，汉平帝皇后就成了定安公太后。那时“太后”的年龄还不到二十岁，到底是自己的女儿，王莽不忍心下毒手，想让其彻底与汉朝皇室断绝关系，“乃更号曰黄皇室主”，还为她物色了新女婿，让其改嫁。但是，王莽的女儿坚决不肯，“后（王莽的女儿）大怒，鞭笞其旁伺御，因发病，不肯起。”王莽只好作罢。

隋文帝的大女儿杨丽华是后周天元皇帝的皇后，在隋文帝夺取后周江山后，改封为乐平公主，隋文帝“欲夺其志”，让其改嫁，但是，“公主誓不许”，心有愧疚的皇帝父亲没有再多干涉。

宋代钱易的《南部新书》记载：唐朝书生郑致雍曾向官员崔相远的女儿求婚，崔家见小郑年轻有为，便答应了。天有不测风云。后来，崔家被朝廷抄家，“女则填官”，意即崔小姐被送进官廷当仕女。后来，崔小姐因生病正好借机出宫，郑书生得知崔小姐出宫的消息后，也不嫌弃她，立即“复续旧好，亲迎之礼，亦无所阙。”郑书生不因女方家族沦落而毁除婚约，依然明媒正娶了崔氏。崔小姐遭难之后，毕竟也算有福。对于坚定婚姻立场的郑致雍，此后“士林以此多之。场中翘首，一举状头。”正所谓“好人有好报”，后来，郑致雍科举夺魁。这样的事例算是十分圆满了。

上文所述的夏侯令女的父亲想同败落的曹家断绝婚姻关系，但是，夏侯令女硬是不肯，甚至“引刀自断其鼻”来表心志，说：“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况今衰亡，何忍弃之！此禽兽之行，吾岂为乎！”弱女子口中说出的这一番话连曹家政敌司马懿听了都十分敬佩。

历史是面镜子。封建时代，在家族政治地位发生变化时，其成员的婚姻也随之变化，但是，那些“不以盛衰改节”“不以存亡易心”的坚定的婚姻捍卫者常常被人夸赞，甚至百世流芳。①

01

《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价：2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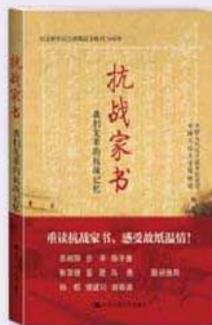
《抗战家书》收录了左权、吉鸿昌、张自忠、戴安澜、蔡炳炎、谢晋元等抗战先辈近 100 封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图文并茂，鲜活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民长达 14 年的抗战心灵史。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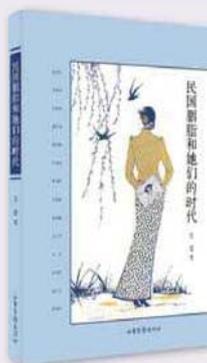
《丁玲传》

李向东 王增如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定价：128.00 元

本书引用了大量书信、文件、讲话等第一手资料，生动记述了丁玲以“飞蛾扑火”般的执著追求理想，虽历尽坎坷大起大落，但矢志不移的人生。深入探索了丁玲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是作者十余年来研究丁玲的总结性著作，代表了当前国内丁玲研究的最新成果。



01.



02.



03.



04.

02

《民国胭脂和她们的时代》

庄莹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定价：28.00

本书讲述了盛爱颐、吴弱男、张爱玲等 14 位开风气之先的现代女性，没有八卦，没有随意的褒贬，叙述人与事、生平与历史，还原到她们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环境中，传达出丰富、复杂的信息，试图以此为线，折射人世浮沉。

04

《留住乡愁：阮仪三护城之路口述实录》

阮仪三 口述 居平 编撰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38.00 元

阮仪三先生被誉为“都市文脉的守护者”“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古城的守望者”。本书通过阮仪三先生口述的方式，介绍了他保护古城建筑的历程和反思，并对当下我国古城保护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05

《红色影像》

司苏实 编著
后浪出版公司·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定价：29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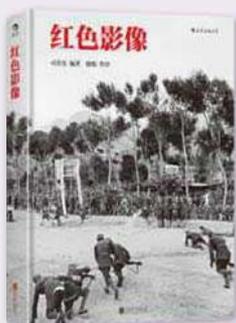
本书选录了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反映红色军队的数百幅影像作品，这些珍贵的历史画面，展现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有无数平凡的中国人，为了国家的兴亡、民族的自强，默默地倾尽所有，甚至是牺牲生命。这些作品是构成中国历史、中国摄影史的重要部分。

07

《总统俱乐部》

(美)南希·吉伯斯 迈克尔·达菲 著
重庆出版社
定价：68.00元

本书讲述了由美国现总统及在世的前总统所组成的“总统俱乐部”运作的秘辛，披露了那些在任以及卸任的美国总统们是如何相互制衡的。既可以满足读者对白宫运作内幕的好奇，又可获得关于美国政治运作制度的知识。



01.



02.



03.



04.

06

《宁波帮》

王千马 著
现代出版社
定价：59.80元

本书将宁波帮置于近代中国艰难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对其成长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记述和解读。从中可以发现，宁波帮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商帮，而且作为一个姿态鲜明的政治符号，它全程参与和推进了中国近代史的演进。

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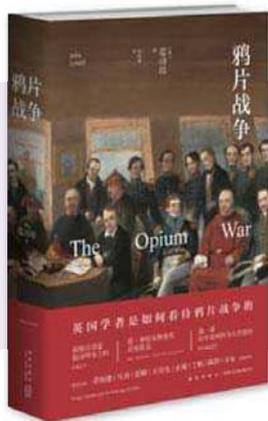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著
华夏出版社
定价：78.00元

十年生死、十年沉浮，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本书公开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真实再现了政坛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结局，既是一本政坛风云人物传记，又是一部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始末的纪实文集。

破除英国人关于鸦片战争的自我催眠

文 | 裴士锋 (Stephen R. Platt)



《鸦片战争》

[英] 蓝诗玲 著 刘悦斌 译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5年7月
定价: 78.00元

在鸦片战争开始之际(1840年),伦敦的一本宣传手册开篇中这样追问:“与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吗?”那位作者答复道:是的。不过,在过去170多年中战争双方所发出的更大回响却是否定的。

在1839年,中国制裁了在广州的非法鸦片贸易。这些其实是由从印度走私大量毒品的英国独立商人操控。一位帝国的钦差大臣没收并销毁了英国所拥有的价值数百万的毒品。为了反击,伦敦派出现代军舰,以使未有防备的中国屈服,还在1842年战争结束之际,通过一系列条约,包括迫使中国赔偿销毁的鸦片,并放弃香港的主权。

蓝诗玲,一位来自伦敦大学的历史学家,她以其生动易读的《鸦片战争》带我们回到那个年代。蓝诗玲女士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密切观察者,同时追踪了这次大战的后来景象,探讨了自19世纪到近当代对其产生的不同记忆。其实,这场战争对于英国方面始终是充满道德的忧虑。当时,英国政治家将此作为国家荣誉和自由贸易的名义来推进,但是他们的虚伪是明显的。有贬斥意味的英语名称“opium war”并非此后的建构,却早在100多年前、战争发生的当下就被一些评论家使用,比如《伦敦时报》(1840年,该报否定了在中国的鸦片贸易,称其为“非法的、当收到诅咒的贸易,并受到邪恶的、残忍的战争的鼓舞”)。

然而,随着鸦片进入中国,中国国内的鸦片生产量竟渐渐比肩、最终超过从印度进口而来的鸦片总量。这使得曾经对强迫

中国进行贸易而感到愧疚的英国,寻找到一个可以很好自我催眠的理由,即:中国人是自发地渴求或需要鸦片。被英国强行销入中国的鸦片反而成为了英国人头脑中关于中国人种带有的核心标签。这就好像是说,正是中国人自己创造了这类毒品,甚至可能是通过中国城的私密之处进口到伦敦。

顺此直下,便生发出“黄祸”的恐慌以及在20世纪围绕傅满洲博士出现在文艺上的某类高潮。傅在书籍、电影中被描绘成吸收鸦片的邪恶天才,他急于以通过战争来报复英国。

蓝诗玲女士的叙述中的基本道德结构是为人熟知的(即英国一方从未站得住脚),而侵略者积累的罪恶和反抗者无私的美德在她的考察之下都变得更加复杂。如今的中国爱国者也许难以理解当时的情况:满汉对立,腐败官员互相倾轧,商人向侵略者销售货物,官兵的野蛮让其老百姓对他们产生出更多恐惧。

蓝诗玲认为,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和中国各有其内部的政治乱局。在英国,登基不久的维多利亚女王倾心于辉格党首相梅尔本子爵,并因坚持任命辉格妇女为贴身侍从,而在议会引发“寝宫质询”,一度导致梅尔本辞职;在中国,清朝亦苦于廷员不和,高官以夷务经验处理现代外交。一俟中英危机出现,双方本有许多机会避免事态升级,却各有掣肘,一再做出错误决定,终令炮火往还,人民涂炭。破除帝国主义者关于战争正义与否的自我催眠和迷思,留下的便是让人悲伤的战争故事,这是一场当时的清朝政府不可能战胜而英国人绝不该发起的战争。①

将将之才

文 | 薛仁明

一般有能力、有学识的人，可以成为将才，却很难成为“将将之才”。因为，他们在意自己的能力与学识。一旦在意，就会受其所执；一执，就会成为如实领略别人长处的阻碍。

刘邦打垮项羽、底定天下之后，一回置酒洛阳南宫（刘邦一开始定都于洛阳），说道：各位诸侯、将领，你们甭瞞我，大家老实说说，“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问：凭什么，最后是我打下了天下？“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明明天下已然到手，最后，项羽为什么又得而复失呢？

大哉问。

为了这问题，后世已整整讨论了两千多年，想来，当年刘邦这一班人，显然也时不时就拿来聊聊。经刘邦这么一问，高起、王陵首先答道：“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简单地讲，就做人的礼貌而言，刘邦显然是糟糕透了。若用现在的话来说，刘邦实在是没啥“教养”。他的“慢而侮人”，是当时所有人的共识。大家都清楚，刘老三永远都随随便便，喜欢闹人，喜欢玩弄人，从来不把一般的客套、规矩当回事。至于项羽，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项羽贵族出身，显然有“教养”多了：他对人客气，很有礼貌，也很有爱心。部属受伤生病时，还会亲自照顾，甚至照顾到自己都掉下了眼泪，全然不似刘邦那样地没心没肺、无血无泪。这是两人极大的对比。

有意思的是，等到真正开打，任何人有了功劳，刘邦很干脆，该给就给，该赏就赏，没啥可犹豫。刘邦光棍出身，什么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就给；没，再说，没什么好纠结的。可项羽就不一样了。属下有功劳，该论功行赏，项羽便会考虑再三：他真的有此能耐吗？配得上这赏赐吗？项羽自己很行，总觉得别人不够行。韩信就曾说过，项羽明明已经答应封人为侯，印都刻好了，却会犹豫再三，边考虑，边摩娑，结果把印章都磨得缺角了，还舍不得给人家。项羽的性格就是这样。一方面仁而爱人，一方面又啥都舍不得；打仗时爆发力何等强大，可优柔寡断

起来却又无与伦比。

高起、王陵这样的说法，算是常识，当时大家都这么看。可是，刘邦觉得不仅仅只是如此，他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饩，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这是刘邦的自我判断，他认为最后之所以能赢项羽，关键在于：会用人。换句话说，刘邦自认为是个“将将之才”。无论就计谋、后勤、征战等等能力而言，刘邦都比不上张良、萧何、韩信等人，可是，刘邦却有能耐用得他们。这种“将将之才”，其实极难。因为，愈是将才，愈难用。假使领导者自认为很有能耐，一旦用人，就很容易用自己的能力与标准去评断，这嫌一下，那嫌一会儿。问题是，真正的将才，又岂能忍受如此东嫌西嫌？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将才一个个离去，留下一群庸碌之才，以及一个永远慨叹人才难觅的领导者。

真正的“将将之才”，固然要有领袖气质（看起来就像个“老大”，别人愿为所用），但更重要的，则是要有“虚心”的能耐。这“虚心”，与一般人所说的“谦虚”并不相同。说白了，就是自己即使真有本事，也能完全不当回事。他甚至能连自己的“虚心”也不当回事。这样的生命特质，就比儒者所强调的“谦虚”更豁达，更大气，也更能一眼可以看出谁有能力，更能真心地欣赏别人的好处。

一般有能力、有学识的人，可以成为将才，却很难成为“将将之才”。因为，他们在意自己的能力与学识。一旦在意，就会受其所执；一执，就会成为如实领略别人长处的阻碍。面对刘邦这种能抛开一切的厉害角色时，这些有本领的人，有办法观照到不把自己当回事其实才是最大的本领吗？①

诸葛亮为何不用考试

文 | 方北辰

暑

假刚过完，再回顾下六月的高考。

邻家小老弟，一位经常与我切磋三国的好学少年，成为今年考生大海的一滴水珠。他早出晚归，行色匆匆，特大号书包塞满应考的“葵花宝典”。考试结束那天，碰到一身轻松的他。他套用诸葛亮《出师表》的文句，拿腔拿调地说：“临卷涕零，不知所云也！”等我笑够了，他又抛过来一个问题：“为何不能学习刘备三顾草庐，不考试就敢录取孔明呢？”说完挥手走了，口中念念有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古灵精怪的小老弟，严肃深刻的大问题——人才选拔能否抛开考试？

现如今，赞成抛开者肯定不少，特别是卷入“全民高考运动”的当事人。但是，翻开古史典籍冷静观照一番，就会发觉这赞成票还真的不好投下呢。

古代中国选拔人才，与选拔官员是一回事。表面上名目繁多，实质上不外三种模式：凭借血缘、凭借推荐、凭借考试。

凭借血缘，就是看你是谁子孙。父辈、祖辈如果掌控政治权力，你就天然具有当官的资格，先秦贵族制大体是如此。如西周武王、成王时，周公能够辅佐朝政，就因为他是武王的老弟。

凭借推荐，又分两种。一是自我推荐。孔子周游列国，弄得如同丧家之犬，却堪称是自我推荐先驱。战国策士苏秦、张仪，都因游说诸侯，自我推荐而受重用。二是他人推荐。蔺相如得以谱写完璧归赵的精彩篇章，就是因为宦者令缪贤的鼎力推荐。后来两汉的孝廉和秀才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都是以推荐为主的模式。上面提到的三顾草庐，则是两种推荐的综合：先是徐庶、司马徽向刘备美言，然后孔明先生对策隆中，再自我推荐一番，这云龙风虎、君臣际会的好事儿就成了。

考试模式，出现在后。东汉顺帝阳嘉年间下诏，每年从地方各郡推荐的孝廉，要集中到京城洛阳考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即来自学生者要考各派的儒经解释，来自文职吏员者

要考各类的公文写作。以国家名义集中进行的每年分科考试，这是早期萌芽。经过南北朝的酝酿，隋唐时形成较完善的分科考试制度，简称科举。从此成为历代选拔人才的主流模式，一直沿用到清代末期。

三种模式中，出现时间最晚，参与人数最多，社会影响也最大者，显然非科举考试莫属。玄机何在？因为时间越往后，全国的经济、文化和教育就越是普遍发展，涌现的人才也就越多。面对日益庞大的成才群体，选拔模式必须具备三项基本条件：一是门槛公平。不能搞出身歧视，要让大量寒门子弟也有同样的机会和出路。二是评价客观。具有事实依据，降低人情请托走后门，避免影响社会安定。三是容易操作。能在短时间内完成选拔并公布结果。能够满足这三条者，显然也非科举考试莫属。

想当初，孔明先生不用考试而被录取，除了因为推荐者的公正无私，本人的自我推荐也很给力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刘备面临的人才群体，数量级还很小。据文献记载，当时聚集在荆州的四方才俊，总数才三百多人。刘备在荆州蹉跎七年，当然有充裕时间去扮演三顾草庐的好戏。可是咱们当下的严峻现实是，今年的高考人数，已经逼近千万的数量级。如果抛弃考试而采用推荐，能否做到公正客观先姑且不论，单单是处理近千万考生的各种推荐材料，就将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工作量，建档汇总、组织阅读、评选高下、排定名次，一年半载也未必能够搞定，到时候真是黄花菜都凉了。笔者当年参加过多次高考阅卷。为了完成每天定量，一进阅卷场就埋头挥笔片刻不停，好比上阵打仗一般，身体差的根本扛不住。统一的标准试题，统一的标准答案，都还如此紧张。换成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的推荐材料，将会怎样？实在不堪设想！

考试选才，确实有局限性，但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现今的外国，依然在搞“拖父”和“压死”（托福和雅思）。邻家小老弟呀，看来你的大问题，起码在当下，还真是投不下这张赞成票啊！①